

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才起飞



冉云飞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枭声文丛

通往比傻帝国

冉云飞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比傻帝国
冉云飞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
（枭声文丛）
ISBN 978-7-5360-5173-7

Ⅰ.通… Ⅱ.冉…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312 号

丛书策划：邹峙华
责任编辑：丁放鸣
平面设计：荼 蘼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阳江市教育印务公司 （广东阳江市东风三路 45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写作是使我获得幸福与快乐的重要方式，同理，我也希望朋友们能在我的文字里，感受到自由的可贵与美好，以及宽容和悲悯的恒久力量。

我不敢说自己是多么智慧多么聪明，但我知道不能和那些愚昧之徒一起搞比像表演，来成就他们深闭高筑的比像帝国，因为那里散发出万古已有的尸臭。

我们为什么活着？西哲罗素的答案是：对爱的渴求、对苦难有着不可忍受的同情心、对知识的纯然热爱，是他人生的三大支柱。我也不可能说得比他更好，故抄录以示尊敬，并以传布这样的人生理念引为骄傲。

——冉云飞

自序：器官整治运动

小时读书，老师常说我童言无忌，就巴望着快点长大；进了大学，师长时训我言多必失，弄得我好像管不住自己，仿佛言语失禁；到了社会，领导的教训是祸从口出，意思是我开了一家专门生产祸事的工厂。一切对我的指陈与教育，似乎都缘于自己有个不听话的嘴巴。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从围堵我的嘴巴开始的。但我这人毛病不周正，遇事又喜欢捣腾个为什么，这当然是一点仅有的智商在作怪，似乎不相信嘴巴除了吃饭之外，就没有其他功能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嘴巴有个主要的功能叫口头表达。口头表达乃至演讲，在国外似乎是初高中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在他们看来，要不让别人忽悠自己的权益，学会与人交流沟通，没有相应的口头表达是不成的。至于说你谈锋甚健、舌灿莲花，让别人近乎艺术享受就更是一种高境界的追求了。我们这里时兴围堵嘴巴的功能，所以许多人的嘴巴难免尸臭，甚至除了说些唯唯诺诺、服从他人的意见外，退化到只能咀嚼食物，这大抵算是我们中国的饮食在世界上特别发达的一个原因吧。

要让人彻底废掉，光围堵嘴巴还不管用，因为嘴巴喜欢说话，其“罪魁祸首”来源于每个人都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头脑。有颗头脑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的头脑只是别人的垃圾桶，他人的思想跑马场，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可使人忧虑的。让一些人不爽的是，你不仅有头脑，而

且你还自以为是，里面不仅有屈原的“天问”，还有“十万个为什么”，这就让那些想占你便宜的人头疼。摆布人是能给人带来快感的，而且可以巧取豪夺他人的利益，所以有些人才装得天生就像是你的老师。那些大言欺世，故意将你绕糊涂的东西，一般都是他们替你量身订做的。虽然他最终只是为了把你套住，但他说的却是为了你好。大脑一废除，嘴当然堵住了，手也不听使唤了，那么你写出来的文章，除了正确得如同你不敢犯错误的胯下以外，没有什么地方再敢出彩。

作为一个明白人的快乐，有很多人是不曾享受过的。有人说，明白有什么用啊，难得糊涂。明白不是世故，不是耍小聪明，明白是谙悉世故而不世故，是知道作为人的局限，知道人生的大限，因此才更加珍惜作为人某些不可让度的权利，如尊严与幸福。我认为做一个明白人，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我认为人活着是为了比谁更聪明。聪明不只是一种活命技巧，只拿聪明当活命技巧，无异于豹子善假奔跑猎物，鱼鹰善于抓鱼，是本能，不是聪明。聪明是在本能之外，还得有一种思考的深邃、创造的激情与从容的优雅。如果我们硬要把上天给我们每个人的特殊性丢弃不用，自废武功，暴殄天物不说，真对不住父母们那一夜不经意的辛劳。

在我居住的院子里常看到有老年人为了锻炼身体，偶尔倒着走路；如果他天天这样走并且认可只有这样走，才能长命百岁，恐怕不仅要把自己弄垮，而且也会把家人弄出神经病，因为家人会考虑他不会与时俱进了，走路不会与时俱进恐怕也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可以偶尔做个游戏，看谁更有水平表演得比对方更傻，但如果我们把这样

偶尔的游戏，看成是人生无可更改的必然规则，在位高权重的人面前，假装自己不聪明而装傻，进而长于比傻表演，硬说脑袋的功能不是拿来思考的，而是拿来当做自来水厂的实验品的，那我也没办法，我尊重你脑袋上安个水龙头的权利。

冉云飞

2007年10月14—15日于成都

目录
contents

第二辑　不穿裤子的书生

第三辑　可怜的中国教育

第四辑　散布可能的风景

第一辑

追捕生病的制度

沙俄时代书刊检查制度中的告密

书刊检查与书刊之被禁毁，有着深切的关联，其有案可稽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中国来看，早在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时就颁布过焚毁《诗》、《书》的简明法令，比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早了百多年；而西方禁书史的发轫，大抵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前481—约前411年）被逐出雅典，其书《论诸神》及《论真理》被当众销毁，可视作书报刊检查史的滥觞。翻检一些与书有关的词典，大多不载“书报检查制度”（censorship）的条目，只是在《图书情报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里才有：“政府对书报内容实行审查的制度。凡对内容淫秽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不宜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检查人员有权禁止其生产、发行、流通或销售。一般采取的措施有禁止入关与邮寄及诉诸法律等。”但是，由于人类自身认识事物的局限或者出于书刊审查者的短期和局部利益，多数时候，那些被禁毁的书刊作为葳蕤的文明之花之所以能够历经劫火而流传下来，除了证明禁毁者的短视与血腥外，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愚蠢。

按上述“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容，历史上遭禁毁的部分书刊固然与淫秽以及与政治、宗教有关，但事实上，遭禁的多半与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有瓜葛。统治者一般并没有闲心雅量用法律来衡评

该作品是否违法，只是书刊检查者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尤其在专制社会就更是如此，毋庸置喙，哪有自由申论之余地，因而所谓的“诉诸法律”，只是书生们在专制社会里将一种依法而治的假相巧妙地装点进辞典里罢了。俄罗斯的书刊检查与禁毁自然也是不落人后的，至少从16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已着手对宗教方面的书刊进行例行的检查。1798年，诗人、剧作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普尼斯特创作了一部喜剧《毁谤》，后因一些大官僚在剧作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控告作者的告密信纷纷来到保罗一世的案头，保罗处事草率，当即下令停止演出，查封已经印好的剧本，并立即把作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索科尔斯基《书的故事》P159，书海出版社）而沙皇统治时代的残暴更是有目共睹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出版就要接受沙皇的亲自审查。当然，沙皇对于思想的钳制，不能像审读普希金的作品一样事必躬亲，而且像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样大的剧变都没能防患于未然，因而沙皇尼古拉一世鉴于谍报组织的预侦无力，所以便采取了侍从官亚·本肯多夫关于《建立最高警察机构草案》，于是一个很能捕获猎物的鹰犬机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简称第三局），就在十二月党人的无尽流放与鲜血白骨之上诞生了。第三局虽然人不多却势很众，在沙俄时代的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屡掀大浪，陷人于死地。诚如赫尔岑所说，它“置身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这样的机构一设置，文化悲苦的厄运就已然可知。他们通过宪兵团来实现其监视、刺探、侦察、搜查、拘捕、审讯、押解、流放等任务，因为第三局

的局长历来兼任宪兵团的团统。比如他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采取了盯梢监视、收买女仆以告密、抄家拘捕、流放等方式，直至其死去。第三局在收买告密人以钳制思想、欺压百姓的过程中，当然远不止收买思想家的女仆，如《北方蜜蜂》的发行人法·布尔加林就曾遵照本肯多夫的示意，以密信向第三局告发彼时的先进作家。告密组织所延揽的人才，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靡不网罗，因而街谈巷议、民间隐私成了他们栽诬缉捕、深文周纳、陷人于不利的根据，在他们看来，捕风捉影正逢其时。

与文化沾点边而与第三局合作甚洽的远不止法·布尔加林，诗人杰尔维格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个平庸的诗人、剧作家、儿童文学家、报刊工作者博里斯·费多罗夫："博里斯·费多罗夫呀——/他的情诗太辛辣，/他的讽刺如蜜甜，/他的告密太肮脏……"费多罗夫写了一首名为《公猫的寓言》的诗，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正如苏联藏书家尼古拉·斯米尔诺夫一索科尔斯基所说："在第三厅（亦指第三局——引者），博里斯·费多罗夫被看作是自己人。"（《书的故事》P349）第三局在书刊检查制度里既可以直接利用作家中的一些败类，对另外一些具有良知的作家进行大量的诽谤和告密，而且还采取派人打入这些作家所参加的组织内部——如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一彼特拉舍夫斯基为首的，包括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在内的"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小组"——的办法来达到逮捕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目的，其起因是因为《俄语外来语

袖珍词典》里对“反语”一条的解释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密探局派奸细安托内利打入小组，由于他的告密，使当局能够在1849年4月对小组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尼古拉一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我要让他们尝尝反语的滋味！’”（《书的故事》P328）自然，彼特拉舍夫斯基和其他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且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17个年头，最终惨死在那里。

一般读者或许会疑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书刊检查里会频繁发生告密事件？对此其实不难回答。因为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在颁布俄国第一份审查条例时就明确规定，凡是“反对正教和专制政体”的作品一律查禁。既是“专制政体”，那么必然与人类的进步愿望水火不容，因而凡是进步作品里都暗藏着对它的批判就是势所必然。专制社会既无言论亦无出版之自由，而它又不是法治社会，要剪除所谓的异己和违碍之言，一方面建立庞大的特务网络，到处捕风捉影，栽诬缉拿；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广泛号召人人告密的“群众路线”，发人隐私，互相攻讦，才可能尽快地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即便偶有像亚·尼基坚科（俄国文学教授、科学院院士）这样稍微在法规容许范围里照顾作家利益的人，也会遭到《北方蜜蜂》发行人布尔加林的告发：“尼基坚科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成了布尔加林告密的对象，有一次布尔加林竟指控他是‘危及国家秩序的一枚地雷’。”（蒋路《俄国文史漫笔》P210—211，东方出版社）如果有人称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是文化的敌人，恐怕也绝不是过激之辞。

自然，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不仅以告发文化人为能事，而且绝不是绝无仅有，因为“当审查官是投身仕途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俄国文史漫笔》P212) 因此像冈察洛夫、彼·维亚泽母斯基等人都或长或短地当过彼时的书刊新闻检查官。前者一向检查苛酷，比如1865年，他曾向内务部出版事业管理总局举报《俄国言论》第11期上的三篇文章，其中包括皮萨列夫的《奥古斯特·孔德的历史观》，并要求对其进行起诉，遭到尼基坚科的反对，出版总局亦未采纳其意见，可见同类相斗的惨烈残酷，以至于主子都不能接受；而后者由于审查手段之恶劣以及对进步文学的压制，被别林斯基蔑称为“贵族社会的公爵和文坛上的奴才”。的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方面那些好发人隐私者，从中得到实惠，因而群起效尤，队伍庞大；另一方面，确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或者干脆是领导带头告密，以便给属下做示范，正如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蒋路先生所说：“1865年的书刊审查制改革，是60年代诸多新政中最浮皮潦草的一项。内务大臣彼·瓦卢耶夫仍然用一个警官的眼光看待思想和出版问题，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实权人物维·富克斯则以进谗告密为能事，寥寥可数的改革成果不久便逐渐化为乌有。”(《俄国文史漫笔》P214)

面对书刊检查苛酷以及各色人等的告密，别林斯基指出：“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事实上，在专制社会里，任何文化的演进，倘使需保持其旺盛勃发的生命力，都必须“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才有可能对人

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稍许可资告慰的成果。再者，如果我们要对俄国文学及文化思想发展的难度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么像藏书家索科尔斯基在《书的故事》里所提到的《俄国书刊检查历史资料》这样的书，应将其及早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并泽惠研究思想文化发展史的专家。

1998年3月23—25日于成都

曼德尔施塔姆的“告密者们”

近几年来，除了上班、读书和其它写作任务之外，我蜗居家中，每天均以廿四史作为日课。但我并不像有些自诩儒家文化将拯救世界的人那样做白日梦，相反，我的用心就是从中钩稽出同胞们何以喜欢打小报告（告密），用漫长的时日撰写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告密史》，以疗民心，以匡风俗，以不负一个文人的一点良知。现今虽只读到《梁书》，然钩稽出的告密史料，却得十数万计，打小报告之风在吾国的兴盛，于斯可见。就在我注意国人打小报告的同时，常常也读到彼邦他国亦不乏此类人士，且还有许多人系文化史上的巨擘，如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便是其中一位。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分子，其排犹劣行，不仅伸向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而且还不饶过他的老师胡塞尔。《阿连特和海德格尔》一书里就曾揭露过，大学者韦伯的妻子曾给雅斯贝尔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见康正果《哲人的是非与私情》），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海德格尔为人极不光彩的一面。而作为苏联“白银时代”杰出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堪称是被告密陷害的典型代表。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生活的时代，与他交好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皮里阳秋地说，“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而曼德尔施塔姆却要激愤和直露得多，他不仅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

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猎人的世纪”。其实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合时宜是一种真正的宿命，并非仅仅出自他这些过火的、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辞，而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命运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个性的多重矛盾——易怒与胆小、冲动与谨慎、敏感与率直甚至多疑等——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更为理性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诗人追求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不可怕，甚至应该是诗人终身修炼的不传之秘；但可怕的是，太独特的声音，却响彻在一个只需要一种统一声音的时代，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剧。所以布罗茨基说得对，在政治收拾曼德尔施塔姆之前，他“早就向自己的诗艺美学缴械投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对彼时的专制保持沉默，却无法把自己信奉的诗艺美学的方向改弦易辙，否则就将什么都不是，如以长诗《春草国》歌颂苏联农业集体化、粉饰饥饿现实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即是如此。而曼德尔施塔姆正是秉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写了一首“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的诗，来讽刺大清洗前夕的斯大林。但不幸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孩子气经常发作，他把这首诗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于是曼氏在坐过两次牢后，再度被捕。不过，特氏后来还是对写粉饰饥饿现实的诗做了反省与忏悔，但在我们这里，除了《顾准日记》里对三年不太那么自然的灾害有过反思外，还没有看到“歌德派”诗人们的认真反思。如果说目下我们

诗歌的处境较为尴尬，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斗胆地说，与诗人们都不善于或者不想（包括诗艺上的）深刻地反省有极大的关联。

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日的黑夜！"而他最后一次流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惨死在该地，实在与作家圈内的败类有很大的关系。天真的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斯氏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了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此人还将曼氏的言行向上秘密禀报）的评审意见，诋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于是曼氏在劫难逃了。曼氏自然别无长策，只好写诗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他在具有某种自画像性质的《无名战士之诗》里写道："这些告密的星星有何用！他们需打量一切，为了什么？""这些世界在威胁我们，像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事实上，曼氏的诗简明其外，复沓其内，用语艰辛，比喻奇绝。他的悲剧，与其说是与专制制度对抗的必然结果，不如说"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难以被兼并"，其"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布罗茨基《文明之子》）。

"文明之子"就这样陨落了。尽管曼氏死于1938年12月（一说11月）27日，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

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更加让人铭记的是，告密者巴甫科夫却于当天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1997年12月12—13日于成都

亲爱的告密

朋友张国功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史，遂将1997年第5期《天涯》上转载的摩罗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复印寄我，拜读之下，怆然何似！摩罗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的民族与社会、人文思想成长的环境与中国作了极有功力之比较，这正是我从社会制度、历史、心理、民族、哲学、法律（法律条文、监狱、监察包括检举箱的设置等）、道德伦理诸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喜欢告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人文品质的伤害，以致今日不堪收拾之局面的一个微缩。我服膺于摩罗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绝望地死去。中国要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自然，"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所指甚多，但其中一条，无疑与我们历来主张告密的传统有关。而且告密之发展与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登峰造极地告自己的密（即所谓的"交心"）和亲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秋瑾的遇害是由于其叔父的告密，李九莲的惨遭杀戮，是源于男朋友的出卖。而此等事件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可谓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这种出卖亲友、告密

攻讦的事，口头流传者甚多，而有案可稽者相对较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近日所读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里便有记载。起因如次：由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与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少数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是近邻，因此常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且当时谭其骧被借到北京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在多事的1955年，满以为在北京能轻松过关，哪知在“上海却祸起萧墙，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到了党委，揭发他与胡厚宣、马长寿三人结成小集团，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P233) 在全国上下批胡风反党集团时，这一告发所具有的重要的暗示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原则，历史系对所谓‘三人小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P234) 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不了了之。“不过，谭其骧至死也不会想到，写匿名信揭发‘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李永藩。”(P236) 生前谭先生还曾说：“不知谁干出这样的事来，真是笑话。”他哪里知道，当时所谓的“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风气，已经把他自己亲人的告密潜能都激发起来了，说彼时人们的生活险象环生，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按葛剑雄先生书中所示，李永藩告发“三人小集团”，主要是因为“李永藩说话随便，马长寿一天对谭其骧说：‘老谭，你要管管你老婆，别让她在外面胡说八道。’恰巧李在隔壁听到，由此怀恨在心，等运动一来就写了一封匿名信。”另外，彼时李永藩一度欲与谭其骧离婚（并不是真的想离，只是谭经常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李想让谭陪着她，便采取如此急切之策），因而干这种告密之事不

止一次，后来单位得知系她所为，便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葛剑雄在谈到李永藩告发谭先生时说，“李永藩的行为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他最后还是认为“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P236—237）对于李永藩这种告发自己丈夫的事，我不敢说“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的确是时代悲剧和制度给予的某种暗示和号召。

而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里也记录了几起他的大弟为表积极，与其划清界限，对其进行子虚乌有的告发的事。“文革”开始前一个月，流沙河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家乡劳动监督改造，大弟余勋鉴觉得他这个“大右派”哥哥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抬不起头，并且为了洗刷作为地主家庭的罪过，不惜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幺弟对流沙河很好，常从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他讲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余勋鉴便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而且出手打幺弟，后余勋鉴被居委会臭骂一顿并写了检讨，但他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见《流沙河随笔》P62）做告密这种事自然是不容易收手的，而且有时还颇能上瘾。有一次，流沙河看《高尔基论文集》，被他大弟看到后告发为在看“苏修的书”，流沙河辩解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而那个监督他的白脸鸡却说：“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见上书P73）弄得流沙河瞠目结舌，百口莫辩。

还有一次，流沙河戴高帽子游街后，造反派让他把高帽子保管好，以便下次批斗时再用，于是他将其悬系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见上书P111）不特如此，余勋鉴觉得告密并未把流沙河完全整垮，于是就动手打他，兼骂他的妻子为“滥货”，总之是百般刁难。他哪里知道，由于余家被定为地主，有天然的不能脱干系之处，即便你把右派哥哥整垮弄死，你也摆脱不了挨整的厄运。随着余勋鉴可利用价值的丧失，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斗，此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见上书P140）我要说，除了个人的品质外（当然我们没必要为其恶劣的个人品质袒护），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亲友之间的告密行为均是与某种号召与环境的暗示密不可分的，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必然后果，更是法制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铁定结局。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全国出现，乃至影响到父母兄弟，人人自危，互相攻讦，其波及面之广，实古今中外之未有，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专制集权下的必然产物。就像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回顾对其父不理解而造成的悲剧时所说的一样，“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见《顾准日记》P422）

1998年2月21—22日晨于成都

魏特夫的招数

我一直比较注意人在异常岁月里的表现，因为非常时期，特别容易窥见一个人的内在真相和矛盾痛苦。可列举的非常岁月，像国祚鼎革、改朝换代的翻天覆地自不必说，如钱谦益、吴梅村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便是；即令是平常岁月里所掀起的风波，只要它干扰了人们生活的一般秩序，搅乱了大家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也当以"非常"视之。譬如50年代初期美国所发生的麦卡锡主义，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的"忠诚调查"和道德围剿，既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思想进一步升级的需要，也是美国朝野政治和利益较量的必然结果。虽然它的泛滥较为短暂，但的确是一段非常的岁月。而中国学家魏特夫便是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有非常举动的人之一。

魏特夫，亦名魏复光，全名卡尔·奥古斯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美国中国学手册》和《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二书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但199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却失载）均有简略的介绍。他原系德国犹太人，早年在大学攻读中国学和经济学，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年被纳粹关入集中营后脱党，1935年来华与胡适、陶希圣、欧文·拉铁摩尔夫妇相识，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

与历史，1939年经美国朋友帮助（《费正清自传》里说魏是得到拉铁摩尔的帮助而进入美国的，而《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里拉氏却说他并没有帮助魏移居美国，本文所引费氏和拉氏的话，均出自此二书），以难民的身份取得美国籍，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任教并从事中国研究，也是后来麦卡锡主义时代备受关照和指控的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但到了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泛滥的时代，魏特夫却成功地逃脱了自己是这一学会的会员所必然遭受的指控。加之他害怕再次遭受类似德国集中营的折磨，闪电般地实施了漂亮的金蝉脱壳之计，而这一计策的核心部分便是攻击甚至是告发自己的学术同行和朋友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

拉铁摩尔由于是一位研究苏联及中国问题的专家，不仅是麦卡锡主义的主要猎捕目标，而且被认为是“可以轻而易举击倒的牺牲品”。拉氏回忆彼时的情景时曾说：“一些曾以为是朋友的人，都完全销声匿迹，还有一些人提供了对我不利的证词。”在写回忆录时，拉氏已进入晚年之境，对许多人事保持了应有的宽容态度，所以才可能把那些揭发告密仅仅说成是“不利的证词”。因为“在这些回忆录中，我不想怀恨什么人，也不想为任何人辩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但这样的宽容是不可能施及于魏特夫身上的，可见魏特夫的攻击对拉铁摩尔留下了多么难以弥合的创伤，“如果要我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的，因为他企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我来促进他自己

的发迹。”事实上，魏特夫在与拉铁摩尔夫妇认识之初，就怂恿拉氏多引证他作品中的观点，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拉氏夫人埃莉诺就曾警告过拉铁摩尔：“此人正拍你的马屁，以便在美国发迹。他是这样一种人，要么舔你的靴子，要么用他的靴子踩你。”拉铁摩尔还对魏特夫为什么在麦卡锡时期非常激烈攻击他作了非常入骨的心理剖析：“有各种各样实际上的脱党人士，或曾经与共产党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竭力谴责他人，以显示或证明自己是多么深刻地反对共产党。”20世纪50年代在我们这里，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被指控是潜藏特务，而不惜挖空心思地去诬告他人为国民党特务的例子屡见不鲜。

另外，费正清由于也遭受来自麦卡锡的指控，因此他天真地请自己的连襟小施莱格尔给魏特夫写信，要求魏特夫写一封证明他清白的证词。但魏氏却说，他并不清楚费正清的立场，而且还说对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不仅在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其关键还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一贯支持。事实上，正是魏特夫出自内心恐惧这种变态心理，使得他去举报像拉铁摩尔、费正清这样无辜的人，以换取某种安全感。诚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

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麦卡锡主义时代的来临，虽然不能说是美国的改朝换代，但非常时期的价值标准和社会风气必然有所紊乱，是自不待言的，这正是各色人等如魏特夫们适应环境变化的新招。麦卡锡主义时代之所以告密诬陷成风，不仅在于审查机构可以采用谴责、恐吓、诬蔑等手段，而且还在于他们对那些提供诬陷之词的人予以保护。可以断言，任何社会制度，一旦使某种人得到免于制约的权力，就将贻害于整个社会。但统治者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大肆鼓励告密，以损害人类的整体品质。如果说魏特夫告密的目的还算是损人利己的话，而我发现50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告密材料，其结果是，既损了人又害了己，在人治之下，“唇亡齿寒”的道理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我为他们不能洞察一个常识而感到遗憾。

作为中国学家，魏特夫成就卓著，他不仅写有《觉醒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及当前的概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分期》、《中国社会新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查》、《农业——理解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的钥匙》、《毛泽东，中国农民的解放者还是摧残者？》等颇富深度的著述，而且还著有他研究专制主义制度的名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仍被海内外研究中国学的人广泛征引。

我们暂且不管他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所用的方法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站不站得住脚，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出卖自己的朋友拉铁摩尔、费正清所采取的诬告的方式，正是专制主义制度（包括告密者可以获得被质询豁免权的非常阶段的民主社会）乐意采用的整治人的方式，也是它得以维系的不传之秘和遗产。可惜魏特夫并未就这个专制制度的宠儿，给我们以任何启迪性的阐释，大概是贡献了诬告之例证，便没有心气再作诸如“告密在专制社会的演进”之类的题目了吧。

1998年1月2—3日于成都

两个民族都有病

大约10年前，分别看过《丑陋的日本人》和《丑陋的中国人》二书，得出个大致印象是两个民族都有病，在看了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后，依旧是这种难以释怀的感觉。尽管有病的只是这两个民族里的一部分人，而且病因并不相同。出于对日本侵略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关注，以及日本某些人的阴暗险毒和死不认错的司马昭之心，因此凡是关涉中日两国关系的书，我都是愿意找来一看的。读了之后，本来想表达一点献曝之诚，但后来看到那些更加有病的“说不”的书籍，便有些犹豫起来，因为谈到日本时没有一点“感情用事”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那些急于“说不”的、缺乏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乐意利用的（顺便说一句，近代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固有其作用，但如今其负面作用业已浸淫到很多人的思维之中，值得有识之士做深入清理），但看了《我认识的鬼子兵》就更坚定了要说两句的信心。

坦率地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引起我们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日本对中国惨无人道的侵略使我们非常地愤恨；另一方面又为其在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以后迅速崛起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而赞叹。但日本让我们惊叹的经济奇迹却有它的仇家中国的恩赐在里面，这是我们中国人在惊叹的同时应予以反思

的：日本近现代工业迅速地现代化，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见加藤佑三《东亚近代史》），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完全归结于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表现的制度创新及其内部市场统一，或者是得到了一位才能卓著的贤明君主。再者，日本战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也成全了日本的发展。以至于老鬼子松井都说："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日中两国间的历史，应当弄清楚才好，到底是日本不给还是中国不要呢？"（见上书P106）我认为应给出一个比"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更能说服人的解释。如果我们不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它就不跟我们友好，日本的诚意就显然不够。事实上，以后一系列抵赖侵略中国的事件，证明中国高估了日本方面的诚意。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说："日本所持战争责任及对战争的认识，与中国之间有很大距离。不拉平这种距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中友好。"（见《中国的走向》P86）

我觉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死不认错，要想获得真正的所谓日中友好，除非中国人都须知政体意义上的"国家"（state）和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毕竟是不大相同的。不过，要提请国人注意的是，那些把日本战刀、舰船、皇军帽等物当作玩具的"幽默"，还是没有的好，否则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健忘症付出沉重的代价。

1998年1月31日—2月2日新春

饥饿的历史

无论是“饱暖思淫欲”，还是“仓廪实而知礼节”，都算不上什么特深奥的道理，只能算是常识中的一种，但都与饥饿无关，这是不争之事实。不必讳言，我和大家一样，除了在饱暖之后要思点肉（肉而不“淫”嘛）欲外，还格外干点别的事情，负担一点不同的爱好，那就是比较关注饥饿的历史及现状。自然，这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人格高尚或者思想深邃，不，我远没有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那般雄心万丈，我只是有点丧失亲人的切肤之痛（吾家饿死五人）和自己饿饭的切身感受。如果你说我现在正是吃饱了撑的，我也没有什么意见，饱暖思饥饿，居安则思危，只有这么点道理。

大多数国人似乎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里有灿烂的文明，倒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惊叹地发现：中国竟是个“饥荒的国度”（A Land of Famine）。关于“饥荒”，《尔雅·释天》里解释道：“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这说明先人们对饥荒有不浅的认识，只是没有防备它的特效办法。但纵观历史，对饥荒真正有研究和识见者却并不多，只有邓云特（即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陈高傭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暨南大学），乃至冯柳堂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才算得上其中寥寥可数的几种关注天灾人祸和民生大计的冷门著

作。让人颇感遗憾的是，这不多的几本有关天灾人祸的研究性著作都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而解放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以我的眼界之狭隘，只看到过少量的像《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灾荒与饥馑：1840—1919》之类的资料描述性著作（这些著述由李海文、程𣝕、刘仰东、夏明方组成的“中国近代灾荒研究”课题组完成）。在经历1959年至1961年如此大面积的灾祸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却付之阙如。即便偶有涉猎，也多半语焉不详，或者欲言又止，比如楚汉的《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只是稍具资料的价值（这还不包括其间的资料错误），并不具有从思想的深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价值。应该说，我们研究这方面的历史甚至包括研究共和国历史的人，不只有丧失学术良知之嫌，而且似乎还有对自我生命的漠视。

自然，要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所需要的勇气，其难度超过了一个研究者对资料的梳理、钩沉及鉴别，但保持沉默显然并不是个妥善的做法。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尽量多地从公家档案里寻出那些苦难的数据，以及那些苦难的来源，而且应该更多地探及类似私家史乘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发掘出一些极宝贵的资料，来反思何以形成这种惨绝的大饥荒，以使这样的惨剧不再重演。我曾经订过采访从灾难里活过来的100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计划，但因受制于很多因素（不涉及没有勇气的问题），只完成了很少的部分，不过我依然悬系于斯，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完成。近读《顾准日记》，发觉像他这样以思想探索为己任的人，在“困难时期”的日记里所记录

的均是些有关像猪狗一样刨食的情节，不禁令人泫然。而饥饿带来的道德沦丧以及实用主义的蔓延，甚至逼得像顾准这样的人也要去偷，“如有机会转业，一定干炊事员”。（见《顾准日记》P117）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竟把炊事员看作必欲争取得到的神圣而伟大的职业，以至于顾准多次提到他“变得特卑微了”，因而也就不难想见，原始人为什么除了茹毛饮血，就再也不能干出其它伟业。

彼时的大饥饿，除了自然灾害不可抗拒的原因以外，经济和国家建设上的浪漫主义以及毫无节制的浮夸风也成为导致大饥饿的温床。更见恶劣的是，稍微“吃饱的人易于激发宗教热情”（见上书P120），那就是疑神疑鬼，满脑子的阶级斗争，抓住时机与人斗，这哪能不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况？而且，对于1959至1961这几年的大饥荒，实在是不能以“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托辞来掩盖政策上的（甚至包括一些人）过失的。一般说来，天然的曰灾，人为的曰祸，那么大跃进的浮夸虚假，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很有些乱自上作的意思，如此看来，这几年的灾害，大部分实为人祸所致。诚如邓拓所说：“所谓灾荒者，乃以人与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也就是说，灾荒的发生，其原因或许在自然界，但责任却在人类社会，尤其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是作为千千万万身历过那个饥饿时代的人，却很少有人像顾准那样据实以录，“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

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我自己。”（见上书P113）“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给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见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

前几年，美国世界研究所所长、著名粮食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曾发表一份近乎耸人听闻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引起中国及世界的极大关注。布朗的观点固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有的中国人勃发的“爱国热情”除了能够说布朗别有用心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反驳布朗的办法。幸好我们现在多了许多清醒的有识之士如刘志仁、卢迈等，对布朗的观点有了更深刻的反省（参见李希光、聂晓阳著《饥饿会重新叩响中国的大门吗？》，改革出版社出版），我们才不至于在民族主义情绪下丧失对问题的理智判断。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而耕地偏少的国度，实在应该感谢别人随时对我们的提醒，以免我们头脑一发热乃至高烧不退，便犯下重蹈覆辙的错误。倘使我们不反思过去并随时注意粮食问题的重要性，那么饥饿的历史则有可能变成“良知的饥饿”和“历史的饥饿”。而我自己则是因为有饥饿的经验，前不久在二仙庵旧书市场搜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编辑的《中国野菜图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时，拿回家中与老母一起对应家乡野菜的俗名进行学习，重温那些艰难而逝去的岁月，以志不忘，同时还可以收到“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之类的意外功效。

1998年3月11—21日于成都

历史的隐痛

历史仿佛是尘埃落定之事，它们消隐在时光的隧道之中，与现实好像没有了丝毫的瓜葛，非得有好事者的着力梳理，才能见出其大致面貌和应有的真相。但无论是扰及后世的痛楚还是泽被来世的光芒，历史都以其或隐或显的方式参与着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些一往无前的人或许会说：历史干我鸟事，无论是辉煌还是倒霉，那都是别人的勾当。事实上，我也欣赏这种直言不讳的光明放达，但历史之所以被认定为是历史，殆出于它在某一时刻的乔装打扮，借尸还魂。胡平近著《千年沉重》的主体部分是对赣文化的反思，固然不乏精彩之处，但我认为此书最能引发我一定思考的，却是他写给他右派父亲的五封无法收到的信。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痛楚地汇合。

近几年有关地域文化的著作勃兴起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文化研究中，从大而无当的宏观言说走向微观细部研究转变的需要。不过，大部分作品要么脱不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乡愿，要么就只是充溢几个蹩脚比喻和不关痛痒的地域批判的浮华之辞。这种心态在我们的国度并不稀罕，见了别人发明的新东西，便说我们早已有过，岂止阿Q精神大放光芒，实在是无耻之徒的巧取豪夺。西人利玛窦早在几百年前就洞穿了中国人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世

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然赣文化先前也是阔过的，但后来却事出有因，不能阻遏地衰落。还好，胡平是把江西的衰落当作中国衰落的一个缩影来考察的，这正是我们应该对其深加关注的地方。胡平利用了学者方志远曾说的话：“中原兴起科举文化，江西紧紧跟上；中原兴起理学，江西紧紧跟上；中原风靡禅宗，江西也紧紧跟上，而且多有发展。致使中原推翻了皇帝，江西的张勋还要搞复辟……”由此他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当神州大地的政治、文化中心均在中原的皇天后土时，江西成了一块锦缎包裹着的软垫，经济上已经得到深度开发、远比北方繁荣的南方，伏在这块软垫上端恭地叩拜着中原的皇权。”通过对细密的资料的分析，并且能把江西的衰落当作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怪胎来解剖，这样的地域文化解说无疑是有意义的。

胡平在分析“拗相公”王安石以及“率易狂愚，动遭谤毁”的解缙后，他借题发挥，这就“宛如几百年后一个伟人的眼里——知识分子永远不能脱胎换骨，不能得‘道’一样……”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丑行总是能够顽执地延续下来，让人感到历史在现实那里找到了什么样的知音与呼应。由是观之，在我们这个专制体制严酷，人治传统深厚，法治空气稀薄的国度，发生像1957年反右、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绝人寰的事，绝非偶然，而是吃人的历史在这种土壤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延续。胡平在他父亲去世后所写的五封信，反思了解放后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尴尬辛酸的生

存处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接续了他对赣文化的研究，也使本书的“千年”、“不再是兵马俑的脸”、“莫忘沉重”这看似互不相干的三部分得以融洽地串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好是世界出名的，他们总是很能理解社会对他们不公的待遇，胡平也不例外：“历史好像常常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得体谅历史，不能因为历史给了人们部分公道，就向它讨还全部公道；不能因为历史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清醒，就要求它从根本上清醒。”可是残酷的历史与现实却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放过善良的人们。

体谅与宽容固然是必需的，是理性的胜利与进步，但绝对是不够的。柏拉图在《申辩篇》里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古希腊城邦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中国的知识分子善于一笑泯恩仇，实在缺乏反省错误的勇气，即便有了勇气，也上升不到对制度层面的深入剖析，这正是我们教育的残缺所致。隔行如隔山的“功能性文盲”，在我们国度是何其多矣。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错误与其说是哪一个人造成的恶果，不如说是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这正是我们应该反省的“千年沉重”啊！

经济学家的道德眼光

1994年看到作家梁晓声和经济学家樊纲为一些“人生观”(道德)问题所作的争论,直感到梁先生的说法过于激烈而近于空洞,而樊先生的又未免过于冷静而近于学理至上。尽管各执其说,但似乎也不是想像的那么水火不容。从常理上看,经济学家谈道德是免不了的,因为经济学有相对实证经济的规范经济学,它就是研究“应该”或“不应该”问题的,既然如此,经济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伦理学问题。因此经济学家不仅应该谈道德,而且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还写作过《道德情操论》一书,其著名的论点便是:人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过程便是道德的建立过程。何况经济学中所要求的两大要素——平等与效率,与道德伦理有着天然的关系。事实正是如此,时下许多经济学著作都涉及道德问题,如高希均的《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汪丁丁的《我的经济学思考》、厉以宁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张宇燕的《说服自我》等。甚至伦理学界主动与经济学界合作,探讨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伦理问题,如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德经济伦理研讨会”,与会者就有研究经济与伦理问题的德国著名学者科斯洛夫斯基,他所著的《资本主义的伦理学》,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力作。

张宇燕认为经济学家在扮演论辩者角色时,要像樊纲那样坚持

"道德中立"或"价值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崇'价值中立'本身就已经违背了'价值中立原则'。"（《来自经济学的关怀》）那么与其坚持所谓的"道德中立"或"价值中立"，不如将市场经济情况下出现的道德演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透视出来，显然比樊纲先生所说的一些该管道德这件事的人——"伦理学家、政治家（不是政治学家）、文学家以及'牧师'等等一切用各自的方式管理'意识形态'的人们"（《经济学家谈道德？》）——更有别具只眼的观察力，而我认为茅于轼先生的近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正是这类别具只眼的观察力的结果，可以将梁晓声对道德沦丧的批判态度和樊纲观察道德时的理性态度结合起来。茅于轼认为，"历来研究经济的许多人最终被伦理问题所吸引"，因此，"这本书希望从人类利益的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道德的是非问题再作一点可以引起人们思考的探讨。"（P25）我认为他对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道德演变的思索，不仅是鞭辟入里的，而且均从经济生活的实际中来，正是刀锋过处，脓血出焉。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不作空洞的说教，也没有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余毒，而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乃至新闻报道，对"道德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大家都同意的简单逻辑来分析各种道德主张的矛盾性和一致性，……而不是在纯粹的形式逻辑里兜圈子。"（P1）这正是极其难得的、学者朱学勤所倡导的"引进常识"，因为在他看来，"老百姓需要知识界

思想启蒙，而知识界则需要老百姓的常识启蒙。”（《被遗忘与被批评的——朱学勤书话》P139）孔子也曾经说过：“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而茅于轼这本书则正是用睿智而明白的思想来解剖我们经济生活中与道德相关的常识问题，使我们明了过往的一些道德是建立在一种什么逻辑和心理基础上的，从而明了今日一些道德说教者所谓的道德沦丧和堕落，只不过是不明了市场经济给道德带来的必然变化罢了，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糟糕。譬如，我国历来对“自私自利”视若洪水猛兽，还主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按茅先生对《镜花缘》里“君子国”只有“利他”行为的分析，得出结论是“君子国”由于最终被“小人”利用会变成不折不扣的“小人国”。不特如此，“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P4）这就是从经济学的理性态度对道德所作的实在而不空洞的剖析。

茅先生并不认为我们传统道德中的一些东西没有生命力（比如传统道德里“仁”的成分，他认为应该好好地接受），而是说必须明了“它可以推广到何种程度，其界限何在”。今天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行为之虚假可笑，就在于它把有限度的一些道德准则推向了极致。如号召别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却趁机把抄家的物品占为已有；两派革命群众为了自己的主观利益，却打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帜刀兵相见；把损人不利己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奉为圭臬，等等。最为可怕的是，“每一次运动都先由三五个领导议定名单，秘授给积极分子，由他们利用

人类各种卑劣的心灵，挑动在正常情况下最不可告人的龌龊动机，爆发出‘批斗’运动，于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接着一切邪恶的念头被诱发、被培养、被反激、被暗示、被强化，这就是所谓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P162）进而“事物发展逻辑结果是连最初布置整人的领导也逃不过挨整的可悲结局”，因而，“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最后也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民主的精神不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P164）由此不难看出，我们所倡导的道德里有一部分是披着“善”的外衣，在干着“恶”的勾当。

茅先生有的论述不只是有理，而且大出常人意表，比如以前一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训教，我们只是朦胧地感到有些不大对劲，但就是弄不明白不对劲在什么地方，经茅先生的明示，大有醍醐灌顶的功效。在谈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时，茅先生的喻辞妙不可言而又切中事理：“人可能会感到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至于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社会的集体利益。”（P62）当然，他不是说，不需要集体利益，比如公民应纳税或服兵役，要遵守法律和公共秩序，但是不能用集体利益来把个人利益“集体”掉，“不需要斗私批修，不需要动员这部分人去斗那部分人，不需要公开个人隐私，不需要放弃言论自由、……和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虽然这些自由有时候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但取消这些

自由的后果更为悲惨。”(P63) 这与前说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最后也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是互相发明、互为补充的。

我不可能在一篇小文内将茅先生所阐述的观点全部囊括进来，这样的企图由于其论述的博大深广而显得我自不量力。但将一些他所论述的重要结论告诉目前尚未读到该书的读者，应该是先睹为快的人的义务，此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何况对这样的妙文我多半只能做个文抄公了。在论述道德观的萌芽时，论证出的是，“所以有人说：‘私有制是道德之神’”；“征税是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利，它以法律的形式公之于众，任何人逃税都将受到惩罚。但是政府可能滥用各种权利，这就是滥罚款滥收费和滥豁免。这是在制度上允许以各种借口瓜分别人财富的又一表现”；(P155—156) 说到职业道德，“目前微笑服务做得最差的恐怕要数政府官员了，这种微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是缺的”；(P198)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讲究的是信用，在一切关于承包问题的合同上“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面是再三保证承包政策不变，一面是屡屡出现撕毁合同的事件”，这既是商业关系中的信任危机，也是“道德观落后于时代要求的体现”；(P211) 事实上，政府官员经常出来说某某政策几十年不变，其实这是政府缺乏信用度，是信誉危机，就出现了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超前消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所谓“道德堕落”，因此“财产关系的稳定是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稳定的基础”(P212)。

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应作较大的调整才能适应，要做到“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弄钱”，“市场是需要道德的支持”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新道德的建设是当务之急。“当前有少数被宣传的故事中否认个人利益，宣扬人格依附，反对独立思考，提倡盲目信仰，这引起了群众中广泛的议论。从事宣传的干部自以为在为国家做好事，实际适得其反。”（P288）实在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1998年2月3—4日新春于成都

历史岂止供怀旧

有一种人让我搞不懂：一旦他们脱离苦海有日，并取得一点成就，便赞美起那时曾经挣扎其间的苦海来，这真是典型的“审美距离说”的样板；如果成就更大，他们就巴不得苦海无边才好。不特如此，还说苦海是多么的好，没有那时所吃的苦，哪有今日的甜啊，好像吃苦反倒成了他们可堪笑傲的资本。他们发表文章及谈话，包括他们刊出的“知青老照片”，多爱奢谈“青春无悔”，而且将吃苦当成了今日有成的催化剂，让后生如我者认为自己生不逢时。我只能得出这种结论：如果他们吃苦吃得更多，倘使他是搞文学创作的人，就可能立马变成世界大师，一不小心就会获诺贝尔文学奖。按他们的逻辑，世界上那些文学大师均应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经历，否则便不配。可惜不必费心，反证比比皆是。如果能够选择，我相信史铁生宁愿有一个好身体，也决不想去当知青把自己身体弄残疾，进而因苦难（自然他是有天才的）成为一个知名作家。但用“青春无悔”者的逻辑来推理，史铁生只能欣赏现在这种他已无法再度选择的结局。

不用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业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某些亲历者的过分感情用事，大大降低了对它的反省程度，这实在是让人遗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自我清算者，我认为定

宜庄和刘小萌所著的两部《中国知青史》就是目前在资料上较为完备的著述。他们既是亲历者，又以史学博士的身份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将上山下乡运动划为有重叠的“初澜”（1953—1968）和“大潮”（1966—1980）两部分，从政治、经济、人口，包括劳动管理及用工制度等角度多方面对“上山下乡”的大背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知青上山下乡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外乎如下数种：由于不当的政策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调，加之错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造成的巨大人口压力，而且还有1957年反右运动背景下的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整治；追溯得更远一点，或许还有俄国民粹主义倡导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影响。单说“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可能还有一层政治权力间明暗较量的意味在里面，以至于树立的很多知青典型被那个时代利用而被更新的时代遗弃，大有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慨叹。任何一种所谓的“运动”不被意识形态侵入和利用，其戛戛乎难哉！因为它们均是各种利益与目的的产物，而这利益与目的还不能铁定将社会引向昌明的道路，以及给民众带来真正的福泽，尽管主事者都可以拿这个作为宣传号召的筹码。

而据刘小萌的研究，彼时树立的许多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只有后来当了记者的王冬梅才说“痛悔万分”。这实在可以算得上是意味深长。我们的民族缺乏反省与怀疑精神，加之又害了大规模的健忘症，因此要防止那种把人当作泥团来玩的噩梦再现，实在要我们付出相当的努力与反省。众所周知，上山下乡由最初的自愿到强制执行，除了煽动民众的狂热盲从外，还有让民

众来承当政府政策失误的嫌疑。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知青们要给后来人一个怎样的历史反省，1978年即有人对上山下乡造成的后遗症作了一个简短总结，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我相信这有名的四个不满意可能比那些抒情的怀旧来得更令人信服。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太古时代了，应该具备一点反躬自省和怀疑精神，进而具备一种永不妥协的理性批判精神。

苦难是不可能当作纯粹的美来欣赏的，尤其是一个民族自身的苦难。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在等待下面这句话，它被阿城在《闲话闲说》里道出来了："上山下乡这一代容易笼罩在'秀才落难'这种类似一棵草的阴影里。'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如何把苦难变废为宝，我认为不只是知青们反省的问题，应该是我们民族群体自觉的义务。历史往往是疼痛彻骨的，而怀旧并非一剂万能的止痛药。

1998年5月26日凌晨于成都

《费正清评传》杂感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中国史学界并不陌生。但饶有深意的是，作为费正清研究对象所在国的学者们，除了对其著述进行零星阐发和引述，甚至包括心态失衡的批判外，还鲜有开明、理性、务实的力作。这正是邓鹏先生所著的《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8月版），得以作为第一本海外华裔评论费正清学术生涯的专著而出笼的因由。这个因由，对邓鹏先生个人的学术活动来讲，倒未必不是件好事，同时也显出了我们国内对海外中国学（包括传统汉学）研究的一点尴尬。尽管有不定期的《外国研究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版，且最近几年译介了不少西人研究中国文化及现实问题的各种著述，尤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富成果，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和《国际汉学漫步》功效甚著。但更为复杂的现实境况是，中国人谈海外的中国学研究，难免会像费正清早年的“冲击——反应”模式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一样，受中国人固有思路的制约。不过，我从《费正清评传》一书里，还是看出有办法避免这种令人气短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因为作者既有作为中国人认识费正清研究中国问题的深度，又有置身国外而不受意识形态干涉的好处，可以从容舒缓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不必像国内某些学者谈及问题时那样隔山绕水，且文笔洗练而又显出充分的理性。

《费正清评传》我是先读"后记"再读正文的，但这"后记"却是理解费正清学术思路的真性情文字。费正清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有为自己国家利益考虑的一面，也有一种本能的对文明进步的服膺，谋求一种人类福祉和理性制衡，具有超越一党一派藩篱的博大胸襟，因而才可能在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与同情。而在共产党执掌权柄后，他又出于国家利益包括对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的需要，主张对中国既遏制又保持接触的双重策略。所以他的学术际遇，就出现了各方面都不讨好的景观，一会儿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学者的批判，一会儿是来自国民党政府意识形态学者的围剿。在自己同胞（含其学生）那里，除了像柯保安那样提倡"中国中心观"对其进行学术层面的批评外，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对他的迫害，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麦卡锡主义对有亲共倾向的知识分子极尽围剿之能事，费正清自然是不能幸免的。在这种研究"中国学"甚或"苏联学"的学者人人自危、压力很大的时候，好像人性恶的通病就显现出来了，一些从前的朋友或同事开始指控费正清亲共，甚至丁丁然说他加入了共产党。更为可恶的是，同是中国学家的魏特夫，不仅不为他从前的朋友费正清和欧文·拉铁摩尔辩白，而且还故意落井下石。但费正清在自身亦备受困扰的压力之下，还极力为拉铁摩尔和谢伟思

辩白和开脱，其间所表现出的良知，是可以为我们彼岸的知识分子起镜鉴作用的。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对费正清这样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心灵创伤，其直接后果是，他也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朋友拉铁摩尔，因为他曾指出拉铁摩尔对苏联扩张的容忍。尽管他后来反省且扪心自问："我是否也想通过攻击拉铁摩尔来为自己解脱？"其远程后果是，当越战使美国政府陷于不利的时候，费正清虽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麦卡锡时代的迫害使其心有余悸，只是到后来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时，才表达了自己对越战的否定以及要求美国与中国和好的呼声。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横行，应算是美国言论自由旗帜上的一个污点。

与此同时，中国1951年正在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此后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其波及范围之广，沦肌浃髓，自然是麦卡锡时代对费正清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迫害（比如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储安平的"不知所终"或自杀）望尘莫及的，尽管麦卡锡主义也使很多人失业或迁居国外。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样的事件，的确应像朱健国先生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记住1951年。（见《方法》1997年第12期）按常识看，许多人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真正迫害应是1957年，其实从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我们不否认一些知识分子是真正想消失自己，服从改造。但应该说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有言不由衷的成分，只不过是表示一种忠诚与臣服而已。而这种自我的迷失，以及批判自我而达到表示忠心的目的，已在陆键东先生的大作《迷失的

一个群体》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收获》1997年第4期) 此种表示忠心的心态，麦卡锡主义时代的费正清亦是深有体会的，尽管他没有屈服于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但他为表忠心，曾试图与自己的朋友拉铁摩尔划清界限。后来他反省道："当我们观察世界局势，体察别人的感觉时，我们对未来都怀着一种隐隐的不安和恐惧，我们害怕被自己赖以获取道德支持的社会所谴责。当受到攻击时，我发现自己更胆怯，偶尔紧张到肺腑深处，最强烈的下意识冲动便是在自己的价值体系范围内躲避这种社会谴责。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迎合周围的人去攻击一个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而跟社会找到共同立场……"(见《费正清自传》P351) 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受到改造的那么多，对这种丧失自我，羊随大群不挨打的心态，却至今尚未有像费正清这样痛彻骨髓的内心自剖，以免后世重蹈前人的覆辙。无论如何，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的兴趣焦点自然是：为什么大抵在同一时代，制度及价值观大相径庭的两个国家，居然都采取了如此的办法 (尽管表忠诚的深度、广度及延续时间的长度不尽相同) 来对付知识分子，并强行要求他们对国家和政党做出有关忠诚的承诺。可以揣度的可能是，新近执掌权柄的政党，需要树立威信，绝对的服从；美国政府可能是出于其冷战政策以及遏制共产主义同盟的需要。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尚未看到有人论述这两方面的表忠心有互相的牵扯，但似乎有一个可能而隐晦的联系，因为对对方的戒备，可能使双方强行要求知识分子表忠心的程度火上浇油。加拿大学者保罗·埃文斯曾

说："对于在中国受培养的美国远东专家，或者在美国受培养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50年代并不是最好的10年。这两部分人受到来自他们国家的政府、公众和他们自己同事的攻击。"（见《费正清看中国》P56）事实上，原在中国主持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面大量刊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的鲍威尔回国后，又被美方怀疑为亲共分子，是典型的两面不讨好；京剧《四郎探母》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是禁止演出的，其用意不言而喻，因为大家都对不同营垒里且有过背叛劣迹的人深有戒心，以至无端怀疑大批与此并不相干的人；胡适在50年代初期既受大陆的批判，亦受到国民党正统人士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50年代中后期停止批判，胡适才从美国返台）。像费正清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他的命运似乎都是前定的，只不过像美国那样的制度可以避免长期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已。在中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都是不妙的，因为他们独立于一党一派的批判精神，在制度尚不健全的社会里，既然失去了某一党派的庇护，其乖蹇的命运就可想而知。比如费正清主张促进中美建交，在台湾受到反共人士的围追堵截，而那些理性且具超越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殷海光、王世杰、李敖等均受到猛烈的攻击。如果更深一层地看，"问题学"家何博传说得好："虽然全世界的政治家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之间一般都缺乏相互理解。而最不幸的是，他们甚至不理解他们之间的不理解。"（《山坳上的中国》P525，贵州人

民出版社出版）但不公平的是，倒霉的弱者始终是知识分子。

我喜欢《费正清评传》公正（自然这是相对的）的写作与评价态度，因为这在我们国内出版的谈及海外中国学的著作或文章中，还是较为少见的。即使像侯且岸先生所著《当代的美国“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这样深刻且极富理论锐气和建树的著作，也免不了在论述“左翼新闻记者的战时中国研究”时倾注了非学术上的偏爱，而对魏特夫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从自己所处的意识形态语境，过分地贬抑其价值。从深层的原因来探看，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有过多的“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学术本身所追寻的公正、良知和理性，对学术的分量有不言而喻的要求和强大的约束力，因此只要是稍具学术良知的人，都不甘心于使学术处于一种屈从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学术的过分干预迫使真正的学术出现萎缩的不良现状，尤其是那些与现实紧密相连（或者是敏感区域）的学科，受到来自非学术的干预颇多。在学术研究或写作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夹击后，我们的学术研究或写作中就出现了许多畸形的“象征主义”，文章里本来就干货不多的观点，无形中为那些隔山绕水、云山雾罩的语言表达所掩盖。即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不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以达皮里阳秋（这并不是作者对写作风格的主动追求，而是一种躲闪之策）之效，形成了列宁所说的“奴隶的语言”。这不仅影响到汉语写作者的语言风格，缺少一种明朗的态度，甚至有着过于卑琐的谨小慎微，等而下之者，在

学术论战时更多的是心理的阴暗与文气的流于霸道。

近读邢小利《龙应台在“长安”》(《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一文，说龙应台去西安参加《美文》刊庆，对大陆文学有“两点突出感受”：“一是读杂文读不懂，杂文本来是要一针见血的，但她读的大陆杂文则是绕来绕去的，三绕两绕，最后才绕到要说的东西，有时让人不耐烦；二是觉得大陆作家的语言受到毛著的影响很深，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中渗满着毛著式的政治性话语，读起来很不习惯。”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身在庐山，而未能看出这种文学或学术写作里根深蒂固的毛病，那么只需在识见上多加修炼，即可以把这种毛病加以根治；但困难的是，恐怕这种毛病不易根除，根子可能在写作的人忌讳过多，写作时就不由自主地要谨慎地添上些保护色，就会出现写作上“绕来绕去”的毛病；绕着弯子说话不耐烦之后，便借用毛著语言那种天然的毋庸置疑的权威感，来代替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并由此在文学写作中丧失了细腻敏锐的审美触觉，在学术研讨中丧失了从容和缓的说理态度。同去参加《美文》刊庆的作家王英琦，因听了龙应台从容的谈吐及精彩的发言后，激动得泣不成声，她自认为自己在性格和为人上与龙应台“有某种相通甚至一致的地方”，而自己却无法像龙应台在为文和为人上显示真我，有时反省“是不是自己太浮躁了，今天才明白了，原来是文化环境的差异”。这就好比谢泳在评价国外的汉学研究时所说：“国外汉学家作中国问题研究，常有新说和创见，但他们的创见多来自于自由的研究心态和毫无框架的思维。”(引自《旧人旧事》P201，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诚哉斯言！

说到底，王英琦这种感受可能是大家都有的，只不过许多人对此加以掩盖而已。事实上，本世纪以来文化激进主义中的偏执成分，除了时代风云变幻，诸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外，也与中国搞写作或研究学问的人缺少一个从容和缓的环境有关。而人是环境的动物，这样的环境对人的心态的影响是微妙而久远的。这一点正可以从《费正清评传》里显示出来。“一些中国学者强调指出，费正清的意见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的确不错。作为美国人，费正清首先关心的当然是美国的利益，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会首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吗？”（P309）就是这样一点浅显得近乎常识的道理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力也没能认识清楚，更不愿意以像邓鹏先生一样的心态来认识它。何况像费正清这样的学者既有超越国界的识见又有敢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勇气。其实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及心态的不正常，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戒备和阴暗心态自然或不自然的流露。与此而来的便是，罗素所创造的思想和恪守的信条，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让中国人为难，即便在今天也得不到真正的认可（参见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因为还有很多白日做梦的人以“中国可以说不”，作为一种无聊的时髦，其实这不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罢了。因为，“那些同意放弃个人自由转而追求政治自由的民族，最终会由于缺失了个人自由而失去其它所有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总好像一把双刃剑，在建立了强大国家的同时损害了个人自由。”

（汪丁丁《哈耶克“扩张秩序”思想初论》，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P138，三联书店出版）尽管我也相信，“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平心静气地、超脱地来回顾20世纪发生的一切，也给费正清的成就以更公正的评价。”（《费正清评传》P311）因为已经有国内学者意识到，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的阐释是西方人为了诊治西方思想弊病而拓宽思维视野的努力的一部分”，（程钢《二十世纪英美汉学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变化趋向》，见《国际汉学著作提要》P393，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但这还远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

不过，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能够比较公正地谈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多是像邓鹏先生这样的海外华裔学者，他们既深知西方文化的脉络，也知晓中国文化的固有理路，同时又没有意识形态的惩罚，故而对研究对象，多是学术上的争论与挑战，而不必满纸意识形态话语和尖刻的言辞，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而在我们的报刊上，常能看到欲置人于死地的所谓争论，文气上流于霸道，恨不得一剑封喉。我认为学者或作家与别人论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争一时之输赢，而是为了阐明事实，求得一个接近于事实的一家之言。王元化先生说他“最不喜欢读‘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和惊听回视的翻案文章’”，（《王元化学术年表》，见《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2月20日）倘使常涉争论的人，能从王元化先生对此的态度上悟出一点什么，并且多懂一点在我们国家的人文环境中唇亡齿寒的道理，恐怕于学术发展及其相应的规范化不无裨益。

自然，邓鹏先生所著的《费正清评传》远非尽善尽美，不过对

筚路蓝缕之作，似乎不宜做过多的苛求。但对费正清的学术背景之一，即欧洲古老的汉学传统应有的介绍，是不该忽略的，因为费正清毕竟是从接受英国汉学家马士的影响，而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尽管美国的汉学（美国人干脆名为“中国研究”）传统一开始就与传统的欧洲汉学颇有不同；再者，对费正清早在1971年8月12日发表的《北京主权下的台湾自治》一文缺少相应的贯穿性的认识，费氏对“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并以此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台北可与北京和平共存”（台湾学者因此激烈围剿费正清，并出版《费正清和毛共》等著作对费正清进行攻击）。这样的观点对中国采取“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甚至台湾问题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回馈。

让思想冲破牢笼

对“思想”的阐释，被许多拥有话语权的人渲染得十分的神秘，但却只有一种简单的说法让我铭记不忘：“说到底，思想就是不断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一个人停止了发问，也就停止了思想。”这是《思想者文摘》（第一辑）在类似于“发刊词”中所说的话。没有问题之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略，确实不可能激起人类逐步克服困难的决心，并借此喷发出思想的火花，所以思想来自于层出不穷的问题和不停地回答问题的来回奔突之中。

文摘与选本固然有所不同，但其相同之处在“选”，有选必有选的标准。如若标准出现偏颇差池，那么重者就难免将“选‘摘’妖孽”的峨冠戴在自己头上，轻者也是自污门墙，误导他人。但真正好的选摘却是使读者事半功倍地获得助益，让读者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让他们在拥有较多的知情权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选择权，然后自己进行思想资源的重组和配置，最终做出不仰人鼻息的判断。而《思想者文摘》编选者的眼光和选择标准正是着眼于此：

“我们是什么眼光呢？说来很有些鄙俗。那就是：看你是坐在象牙塔里提问题，还是站在现实生活中提问题；看你是就理论谈主义，还是想就现实说道理；看你是在玩屠龙术与皇帝的新衣，还是

在述作生存经验中的体会与感悟。我们舍前者而取后者，这也就决定了这本文摘的定位是为大众说法。”

《思想者文摘》里所选的篇章大部分可以说做到了选者所制定的标准，切中世事，尖锐而又有理性。常有些自以为高明的人认为，只要将下岗人员的就业观念转变过来，那么庞大的就业压力就迎刃而解，其实“中国今天的就业危机并不只是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或摩擦性失业，它更是一个总量性问题”，“个人确实可以通过转变就业观念实现再就业，但整个国家不能靠人们转变观念。之所以出现这种‘合成谬误’，是因为有人片面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假如每个人都转变就业观念，我敢说就业形式将更加严峻，因为竞争更加激烈”（赵奉军《我们不能再片面指责下岗职工》）。

作为一个要表达自己见解的人，想对社会上诸多事体做到宽容而不纵容是很难的，不只是因为宽容与纵容的界限并不像黑白分明那样直截了当，而且需要发表见解的人在拥有积极自由的态度外，更要具备有消极自由的胸襟，否则“宽容文化造成的相对主义，反过来最易激起不宽容。那些有自己坚定信仰的人在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社会文化下往往被视为危险的少数，被推向社会的边缘，他们在社会上特别容易感受到威胁和不安”（林志光《宽容是自由社会应追寻的理想吗？》）。

我认为只要是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有坚定信仰的人即便被认为是少数，也不大可能感到威胁或不安。倒是在制度不能保障各种

自由的情形下，倡导宽容，容易成为专制制度下不合法的利益攫取者，以及大权在握的人所利用的情形。换言之，他们会因为自己巨大的利益，联合起来教导被他们盘剥的民众要学会“宽容”，以便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及其所得开脱干系。因此制度漏洞所造就的腐败分子可能会成为“宽容”的最大受惠者，没有比这更“黑色幽默”的了。

这让我想起捷克思想家克里玛在“论诚实”时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将它们（指到处蔓延的不诚实——引者）和我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联系起来。在这个国家，人人都感到自己受到欺骗。以此为自己欺骗他人的做法找出理由。”（《布拉格精神》）

要遍述《思想者文摘》所选全部文章，是不现实的，因而列举一下其中所选的出色篇目，并非多余：龙应台《百年激荡》、冯海沧《警惕制度变迁中的既得利益者》、秦晖《改革的关键在于公平》、何清涟《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黄立《现代制度浪漫主义》、朱学勤《1998年关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等。但另外一些文章的入选就不能使我信服。如李彦《权力腐败的演变公式：红色一灰色一紫色一黑色》、喻权域《俄罗斯剧变六年》、敦白《神视荒芜》。

这三篇文章既无多少新意更无思考的深度，腐败和文学艺术转型期的走向，基本为人所熟知，在这里，比提出问题重要得多的是，在于他独特而切实的回答，但是没有。同样是反省和批评俄罗斯改革，黄立的《现代制度浪漫主义》就要深刻锐利得多，而《俄

罗斯剧变六年》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的浅薄之作。因为这样的文章并没有提出什么实质问题，更谈不上回答什么问题，基本上违背了《思想者文摘》的选择标准。再者，以所选内容为例，还缺少当今生活所急需的法学思想类文章——如探讨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批评司法腐败等；从所选地区来看，应包括港台及海外华文报刊，增加对翻译过来的各国思想家著述的选摘，以便开阔读者视野；从栏目设置来看，分类有待完善，有的选目不精，每篇文章前的引言间或也有不当之虞。要改善上述诸多环节，无疑对编者的知识结构、学养胸襟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我认为帕斯卡尔的话对于我们的生活境遇来说，有近乎"人是万物的灵长"的盲目乐观。在我看来，更多的时候我们卑怯得还不如芦苇，不会思考且更无所谓思想。说得尖刻一点，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只不过是他人思想的应声虫，或者成为缺陷多多的制度的献媚者而已。

龙应台早在《野火集》里说到中国学生"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者教育方式，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残障……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转引自龙应台《百年激荡》）

要改变这一切，我们就不要在自己未思考未表达之前，在自己内心自设一个"思想检察官"，将自己思想的大势去掉，自宫而成

为一个思想上的太监，这是比肉体上的斩根去势更为悲苦的事。因此不妨说，当今中国思想者的任务之一，是按照《国际歌》所明示的“让思想冲破牢笼”，来警醒众多思想上的无产阶级。

1999年10月23—26日于成都

无声的中国

大凡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做过一次演讲名为《无声的中国》。就个人发出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几乎不能受到保护的现实境况来看，鲁迅不愧是一个残酷现实的批评者和悲剧性的预言家，使尚存热血的人悲怆得五内如油煎火焚。他的洞察之细达毫芒，实在无出其右者。尽管高尔基早就说过："因为一个人是他自己的样子就用死亡来威胁他，那是极卑鄙与愚蠢的。"一个中国青年王开岭用"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的"天问"，来作为他《激动的舌头》一书的开篇起首，彰显这个声音的独特而重要，如黄钟大吕。让我们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发出这样的吼声："不能——这不公正！"因为对于人来说，没有比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且能够好好活着更重要的事了。

苏联不少作家尤其是高尔基在很多同行遭受迫害的时候，利用他的影响施以援手。但在中国晦暗的时刻却没有像高尔基一样的人，除了说明我们不习惯和无能喊出"不能——这不公正"外，更厉害的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整人办法大行其道，搞得你不仅没有正常的社交圈，而且抽空你活着的伦理基础，亲人划清界限，朋友同事揭发告密，所谓众叛亲离。总之，人们视你如寇仇，避你若瘟疫。如同对一棵树一样，将你连根拔起，使你丧失空气、阳

光、水分和土壤，你便只有“慷慨赴死”的命。思想家顾准在即将离开人世时，近在咫尺，想见自己的子女和老母而不得，这在苏联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王开岭申说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真正原因，因为摩罗的文章照鉴出了中俄两国精神土壤里的深层区别。发出“不能——这不公正”的声音固然是重要的，但让这个声音使更多的人能够知晓并知道怎样使用，却必须要有“现场直播”式的新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民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在获得知情的基础上，民众才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王开岭进而申述马克思的言论：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只能是虚幻。因此王开岭主张对电视播映权不是官方独揽，“最诚恳的办法是：有官方的，亦有民众的。反正‘遥控器’始终在老百姓手里捏着”。之所以要“向‘现场直播’致敬”，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判断权交给个人，而不是使个人成为被操纵的傀儡。

爱国主义对于很多人都不是什么问题，而在王开岭看来，这里有一个误区。“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所习惯的那种‘爱政府主义’吗）？”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表达国家观念所常用的三个英文词汇，便不难察觉此中奥妙：State侧重政权，Nation侧重民族，Country侧重疆域。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在历史长河中比较频繁，不同的是民主社会利用制度来进行理性更替，专制制度却只有通过武力血洗来推翻，而一个国家的疆域版图也或有变迁，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积淀虽也随时代变化，然必有其深藏若虚的精神背景，确有其不可消灭

的一面。这就是有不少文化大师常说只要文化不亡，国家便不会亡的真正原因，在日寇凌侵吾国，命悬一线时，就有不少文化人极力主张并努力保存文化血脉，如张元济之抢印古代善本，郑振铎萦系于怀的“劫中得书记”。所以真正恒久的爱国心，是爱Nation和Country意义上的国家，而绝非我们平常所特别强调的State意义上的“国家”。如果用State掩盖、混淆乃至代替Country和Nation，这样就会变成“爱政府主义”，一个朝代、一届政府对于民族意义上的漫长之国家来讲，只是匆匆过客而已，民众哪有长期爱它胜过爱民族文化之国的道理。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若只是殉清，我们只有惋惜而已，但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他是感文化之衰颓无振，我们便要纪念和承接其精神内蕴，因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在是我们的至宝。简言之，王国维殉的是Nation，而非State。吾国文化同化或者吸纳他国文化之力，端赖Nation之力而非State，这也就是吾国虽有异族或异国人侵和征服，却能使文化绵延久远而不断裂的真正因由。由此我们便不难明了，State与Nation的真正区别。固然Nation之积淀成形，与State有一定之关联，但它们之间究竟有极大的区别，不可混淆，但教导我们爱国的人却偏偏要这样做。这样的爱国主义就会比托克维尔所批评的“本能的爱国主义”更等而下之，爱国主义成了被一时一地、一朝一代拿来进行短期利用的工具。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里替我的观点作了另一番互相发明的申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请相

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之人。”

鲁迅与胡适的区别近来受到特别的关注，似乎他们冰炭不容，论者也想将他们分出一个高下来。谢泳提出鲁迅为何被专制制度利用，而胡适不被利用的问题（《鲁迅研究之谜》），林贤治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看法（《也谈鲁迅研究之谜》）。王开岭也将鲁迅与胡适进行多方对举，虽也说他们有互补之处，但多是将他们对立而言，崇鲁迅而贬胡适。我认为从思维上讲，他们都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误区，倘使用思想家伯林所阐述的“自由的两种概念”包括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来看，鲁迅代表前者，胡适代表后者，不分轩轻。鲁迅可能过分强调积极自由，有其非常激进的一面，所谓“一个都不宽恕”；而胡适晚年越来越强调消极自由，反复申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而痛遭时人非议。其实真正的自由需要的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融合统一，缺一不可。换言之，我们既不能缺少革命的鲁迅，也不能排斥改良的胡适（王开岭贬胡适为“权力工程的改造乐此不疲”，其实正合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零星社会工程”之理念），我们既需要批判的鲁迅，也需要建设的胡适（将鲁迅与胡适做如此的区分在我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而非真的认为他们的思想没有交汇之处，这是必须特别说明的）。积极自由是重要的，但单单只有这种自由思想，便会引向

法国大革命的暴政，带来革命后的奴役，因积极自由而进入万劫不复的专制深渊，这方面中国人应该有锥心之痛。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引进民主自由思想时，老是不由自主地引进卢梭而非柏克、贡斯当、托克维尔，从而带来的真正的负面后果。激进到没有一定限度，就会出现以“人民”的名义来将某人判为“人民公敌”的荒唐举动，将集体意志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恶行便会频频发生。其实在我看来，鲁迅、胡适都是当今中国不可缺少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将他们的思想资源批评修正并重新配置起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与其像王开岭所说“胡适的前提是鲁迅”，不如说怎么样将鲁迅与胡适共同的思想资源利用起来，从而达致更好的效果，这比争谁被利用，谁不被利用可能更有意义。或者退而言之，我们要解决的是，在努力承接鲁迅思想的同时，用什么桥梁过渡到胡适，也就是从前提过渡到结论，从此岸到彼岸。前提和结论，此岸与彼岸并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要将他们连接起来。我敢肯定地说，中国缺少他们中任何一位所代表的思想和精神，中国的未来都将是不妙的。贬抑或崇奉任何一位而不是同样重视，已造成我们当今思想界的无力。因此不管是“新左派”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都要有容忍对方批评的雅量，因为只有一个开放而非自足、允许试错而非真理在握的理论，才有可能对现实起到应有的诊治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为建立一个更趋合理的制度而贡献自己的思想智慧，而非囿于任何派别和主义上的胜利，它们与我们想要获得的真正的自由民主来说，都显得过于渺小。

王开岭是勇猛的，但也是激动的，所以有不少文章激动有余而理性不足，热情高炽而思路不够清晰，偶尔也有类同于“清洁精神”的泛道主义成分夹杂于篇章之中，宜乎取名“激动的舌头”。他的文章固然伸张了不少常识，语言颇多明白晓畅之处，但过于生造的词汇如“冉升”（可能是冉冉上升之意）、躏害（可能是蹂躏迫害之意）等，不在少数。我认为思想写作（当然哲学研究除外）不能因追求语言的个性而丧失其表达之明白。《激动的舌头》一书分为《声音》、《俄罗斯课本》、《精神之塔》、《自己的夜晚》四辑，我认为前两辑大部分篇什的思想相当锐利深厚，而后两辑中不少篇章则显得轻飘而紊乱。如果出版前能做适当的删汰，那么无疑是一本更令人满意的书。不过，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我为《激动的舌头》喝彩。

1999年11月1—2日于成都

作家的豢养及其解放

在我看来，作家被豢养起来，而成所谓的“专业作家”，是20世纪可笑可悲的精神阉割事件之一。这就像野马被豢养，最终丧失野马自由奔跑的天性，而成为曲意逢迎主人的“矮种马”一样，《庄子》一书中的《马蹄》篇早已洞穿此点。惜乎两千年之后，仍有许多人执迷不悟，相信作家是可以按官方旨意或者个人意愿培养出来的，实在滑天下之大稽。小子不敏，不知托尔斯泰、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世界文学巨匠是哪个机构、哪个人将其培养出来的。如果你执意说他们是某个机构、某个人将他们培养成著名作家的，我想他们贡献给你的无非是世界通用的“比中指拇”。

在如此糟糕的局面下，自然就惹得我的朋友李海洲要在《重庆青年报》拿火药枪来“消灭文学”。其实这真是活天冤枉。文学何错之有！它历几千年而不灭，大抵在于文学反映了人的喜怒哀乐，对现实的不满也好，人类大苦闷之发泄也好，“偶有文章娱小我”也好，说明文学是人们真正历久不灭的一种需要。我们姑且不说真正的文学作品驱遣文字的功夫要如何的高妙，关键在于要说人话。当然说人话，在我们所处的艰难语境之下，是需要勇气的。而被豢养起来的作家，一般说来是没有这种勇气的。因为一旦断炊，他们的生计便没有着落。一方面，因为他们所写的作品，不能

进入市场，实现自由买卖，养家活口极为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被豢养起来的作家，除了作家是他们的“专业”以外，便一无所长。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中，是没有什么“专业作家”一说的，李白、苏东坡等文学大师不是，甚至早期的鲁迅也不是，只是教师或者教育部的公务员（鲁迅晚年靠卖文为生，应属职业作家而非专业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有广大的市场及读者）。换言之，真正的作家，在作家的名号之外，另有职业，譬如教书或者当公务员等。像王小波除了自己的作品有独特的表达、自由之思想以外，他之辞职而独立出来，不受羁绊而专事写作，用市场来检验自己的作品，也是王小波受许多人之好评的一个原因。而当此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许多“专业”作家因为不能或无能我手写我心，他们就只有为一碗活命的馊稀饭而起劲地去做宣传工作。根本谈不上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何来所谓的“创作”。因为是被豢养起来的，故尔也就是终身制，使得像丁玲曾经说的“一本书主义”格外吃香。有的人不只是一本书吃一辈子，甚至是一篇臭不可闻的文章也要吃一辈子，这样就使很多只看现象、不看实质的论者迁怒于文学，而使文学本身成为替罪羊。

至于说将作家评出个一、二、三等，更是滑稽之至。专事思想及灵魂的人，竟然也像可以量化的工匠一样被评出个等级，如果不是承袭苏联做法，真算得上是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因为作家的评级，不可能量化，因此那些只要写过两篇文章、出过一本由于没有人看而锁进抽屉的书的人，便可因为自己的年龄、资

历、官位被评定为一级或二级作家，而且那些越是被评为一级的不少作家，往往是名气不大年龄大，外界越是没听说过的人。书越是卖不动的人，往往越有可能是一级作家。当然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我们这种制度下，常常出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李海洲要“消灭文学”，伊沙要“解散作协”之类过于激愤的言辞和主意。使得“吃皇粮”的专业作家最终只有说他们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才可能借助所谓的“政治上正确”，靠强权之压制来取胜。但无论怎么对此曲为辩护，都不能掩盖作协这种民间官办的团体，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将大批人养起来的现实。而作家之被养，看起来是官方所养，其实是纳税人的钱，而不少作家不替许多是纳税人包括纳税人中的弱势群体说话，做的也是粉饰现实的事。如果说这样的作家应该被养起来，那么对许多失业者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的作家并不比一个下岗工人更重要，我实在看不出养作家的必要。目下文学的不景气，原因固然多，但与作家被豢养起来有关。当然，文学不是白米饭，是天天要吃的；如果说文学不可能获得大白米饭那样的关注，那不是文学的过错。要求文学像大白米饭一样天天被人关注，就像要求太监性功能卓越一样，是不公平的。

李海洲的“消灭文学”，伊沙的“解散作协”，都有些耸人听闻，但他们拯救文学的用心是良苦的。真正可以操作的不是解散作协，而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将作协完全办成民间团体，作家们有个协会是为了便于交流，是为了更好地在宪法之内保护自

己的创作自由不受侵犯，在法律之内保护自己的著作权益不受侵害，不是为了跟谁保持一致，不是为了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因为作家的创作实在只是比智慧比创造的个体劳动，不是比哪个更会说假话，更会取悦于强势群体。作家应该独立而自由，如此一来，真正好而且伟大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诞生。

2000年6月2—3日于成都

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六个注释

1. 标准

一个很古怪的时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仿佛酒神找到了缺口，大家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又如同打了麻醉药一样，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知觉，整个儿抽风得厉害。尤其是古老的中国，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升斗小民，都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穿着同样的衣服；一张说不清喜悦还是忧戚，茫然惶恐还是得意忘形的脸，全国人民都像一个妈生的——在权利的不平等上就不是一个妈生的了——因为那些清醒者被逐出了家门，留下的即便是不那么听话，连一点小动作也不敢乱来的人。

人们包裹着同样的服装款式和色彩，好比任人拿捏的木头人。服装的颜色，像人一样暧昧，无论是灰色还是草绿色，都是一种过渡色。学过色彩的人都知道，过渡色适合表达一种复杂的心情，但要表达大喜大悲就不那么容易。这种色彩是不干脆的。对这种色彩不成条文的统一规定，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你可以有想法，但不可以有清醒的想法，只能有暧昧的表情，否则一旦被人识破异端味道，除了死有余辜，别无选择。

革命在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词汇，哪怕是许多革命者都革掉

了自己的老命，仍然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在中国很吃香，在世界各地也是风起云涌，革命的神圣性仿佛像一纸圣谕一样在世界各地传递，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从苏加诺的印尼革命，到格瓦拉的“帮助”他国打游击战争；从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世界各国无不或多或少地被包围在革命的洪流中。第三世界更是视革命为己任，不特如此，还将自己对革命的喜好，输出到世界各国，不管他国喜不喜欢，总认为自己的革命行为是为了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劳苦大众，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成了一张人人都可以利用的通行证，革命成为被人们怀抱着的护身符，成为一种识别标志，尽管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千差万别。

但世界是个古怪的东西，现实更是残酷得吓人，它不会一劳永逸地听令于革命的差遣。革了反对派的命，民众依然饥饿，故而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60年代的大事件此起彼伏，不分姓氏笔画，联袂演出，肯尼迪被暗杀，玛丽莲·梦露神秘死亡，戴高乐率先与中国建交，四清运动，“文革”大爆发，五月风暴，美越战争，珍宝岛战争，九评苏共，美国反战浪潮，等等，不胜枚举。至于说，小人物的生存就被这些大事件所裹挟，身不由己，成为大事件的牺牲者，没有小人物的牺牲，就不可能成全大人物的辉煌，这道理“正当”得如同“不聚小河，无以成江海；不积细土，无以成高山；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正是这些大得不着边际的人物以及大得不着边际的理想，使得弱小者的牺牲，成为不可置疑的“正常

行为”。这种“正常行为”在60年代频频发生，人们司空见惯，至今余风犹烈。

金斯伯格“嚎叫”后，正在嬉皮，而我们则是在自己不负责任的“嬉皮”后，全民族的“嚎叫”，因为饿得嗷嗷直叫，为了一种虚幻的理想，声嘶力竭，兄弟阋墙，家庭失睦，互相攻讦，人人自危，大家都像中了邪一样，哪像一群叫人的动物呢。如果用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万物的灵长”来形容彼时的中国人，真是抬举了我们，而侮辱了动物。如果我是一个像狼或狮一样的动物，一定要像左拉在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中那样，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控诉”。

2. 影响

我的家乡闭塞，通公路时，自然有狗咬拖拉机的事情。不过，这种事好像许多人都说过了，我还是拣最近的说。1995春节我陪母亲回家省亲，隔了一个月回来，听着人们在议论解决台湾的“江八点”，不知所云，重新回到城市，就像笼中的动物被放生，久别大自然，需要一个生存适应期一样。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星期才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因为家乡彼时不通电话，没有报纸可看，我们家也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即便有电视也看不成新闻，因为家乡那个电很怪，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晚上用电高峰，电压不足，照明尚且成问题，何况电视乎？

这就是我童年身处其间的现实。热烘烘的屋子如果吹进来哪怕一丝微不足道的风，你也会感到凉爽可人；暗无天日的时候，如果射进来一道亮光，会使你确认生机重现；铁屋中的一声呐喊，也会使你增添冲破牢笼的勇气。我家由于祖上留下的房子稍宽，加上妈又算是当地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所以每每有工作组进驻我村，就会在我们家吃住，这使我从小就感到与农村生活很不相同的另一些人事。我第一次接触收音机，大概就是四五岁的时候，住在我家的马指导员（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已忘其名）有一次将他随身带的收音机打开，放了很久，我就很诧异地问马指导员，他们说那么久，难道他们不饿不吃饭吗？我因为很调皮，马指导员就开玩笑说，他们饿了，就要吃不听话的孩子。然后，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句损人的话，居然很押韵，人家说你是指导员，我看你是个麻麻（指导员是个麻子，后面这个“麻”说时应该有点儿化韵，才有味道）。我洗脸总是很马虎，性子又急，而马指导员总是洗得很细致，仿佛要把脸当个艺术品来经营一样，反复擦洗每个角落，做到万无一失，我至今没看到过像他这样将脸洗得这么计较的男人。于是我就很不耐烦，洗快点嘛，你要洗来吃吗？！妈说我人小鬼大，居然这样损人，当然就批评我，马指导员并不计较，却说这个孩子聪明，将来有出息。

我家的堂屋很宽敞，添些桌椅就做了村小的课堂，来了个廖老师太良。廖老师很爱逗小孩，人又和善，我看那些学生学得摇头摆尾的，就觉得有趣，于是也在旁边叽哩呱啦，不知所云地跟着学，

做了一个没有名分的“旁听生”。母亲农活很忙，无力管我，任我放野，又怕我到河里去洗澡淹着，因为有一个八字先生说我命中主水凶。母亲听说我喜欢跟着学生念书，就请廖老师代为监管一下。廖老师下午上完一阵课，他就趁学生自习的时候，将米淘好，用小鼎灌架在三脚上煮了，等着学生放学时，就可以吃饭。小时饿饭，于我是常有的事，因此我就等廖老师还没下课，偷偷溜到他的屋里将还半生不熟的饭舀了就吃，就此落下了肠胃不好的病，经常刚吃完饭就得上茅房，廖老师就说我是个“造粪机”，我就回骂他是“廖太娘”，以示羞辱，这说明刻薄是我的天性。不久我上了五里路之外的完小，村小在廖老师走后还保留了一阵。有一次村小的老师生病，读三年级的我，还回来代过两天的课，教一年级的学生。由于矮小，只能站到桌子上在黑板上板书，下课了便与学生真的打成一片。有一次我把一个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自己脑袋上也被打起个包，等我上台给学生讲课时，台下哄堂大笑，包括那个和我打架的学生。这样几天的“小先生”生活对我自己来说是难忘的经历，它使我自信大胆而无所畏惧，自此以后，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

生活没有多少变化，然而村里多了些重庆市区的人。这些人都很年轻，说是来向农民学习，接受再教育的，人们说这就是知青。这些重庆来的知青，很快就与村民发生摩擦，因为他们不仅不上工，而且偷鸡摸狗，被村民鄙为好吃懒做。只有我们家的东西没被偷过，因为他们的年龄与我家大哥二哥相仿，二哥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股子江湖气，很讨知青喜欢。一个叫

马崽的知青是个天棒，经常打架，而另一个知青张三喜欢收工后拉二胡。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叫音乐的东西，很迷人。有首如泣如诉的曲子，他告诉我那是《二泉映月》；有首比较欢快的，他告诉我是《北京喜讯到边寨》。后来，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位同学杨卫东有点音乐天赋，课余吹笛子、拉二胡都有一手，我跟他学过，终于不成，但一些二胡曲子至今仍很喜欢，闵惠芬、宋飞的演奏，使我陶醉。

我对“文革”没有特别的印象，除了偶尔看到斗争地富反坏右以外，只是偷偷看过一些油印的关于“文革”的文件以及一些口号，似懂非懂，那是二哥带回家藏起来的东西，他将东西藏起来，反而激起了我翻箱倒柜的欲望。因为没有童话可读，没有小人书可看，我看了这些打打杀杀的文件，觉得无趣，唯一的好处是我从中认识了许多字。

3. 饥饿

属蛇的我，贫困像蛇一样纠缠着我。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使得人没有对未来的期望，但求温饱而不得。

我还没出生，中国就发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这的确是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不过它一点也不“自然”。不少气象、水文方面的科学家都指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之所以出现这样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完全是为了不切实际的理

想，为了较量自己主义的优越性而煽起的虚假的浮夸风所导致的。由于大规模的饥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四川省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其它省份。彼时四川的领导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仅不要中央政府从其它省份调拨粮食，而且要勒紧裤腰带将粮食上调中央，本来已经饿殍遍野，至此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从186人锐减到67人。那时还不满10岁的三哥、四哥以及祖父祖母相继饿死。这还不算惨的，有的如同被仇家诅咒了一样全家死绝。剩下的人，不少人逃荒要饭，背井离乡。三哥聪颖异常，母亲给我说起三哥临死时说的一句话，至今每每想起，仍令我潸然泪下。他说，妈呀，娘呀，捆得绑绑紧啊，要过贵州去！所谓捆得绑绑紧，就是那时规定，哪怕是饿死，也不能出去逃荒要饭，那些偷偷逃跑的人，被抓回来，用绳子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如果不因此毙命，已属万幸。到贵州去，已成为当时我们那个村庄的风尚，贵州虽然地贫，但彼时贵州的领导没有四川的领导觉悟高，故尔尚能活下去。

本村有个叫冉井开的堂哥就跑到贵州省沿河县附近的一个村庄生存下来，至今还时常回乡省亲。他的儿子国辉曾于20世纪90年代就学于成都气象学院，常往来我家。彼时饭饿，把人性都丧失殆尽。我家二哥比堂哥小几岁，羸弱的二哥去山上采了一束糯叶（我不知其学名为什么，但糯叶除了涩味以外，根本没任何营养，真的无法下咽），准备在火上稍微一烤，随即吃下，但在河边即被堂兄抢去，这对二哥来说是个惨痛的记忆，尽管二哥早已不计较这些。

我虽然生在大饥饿过后，但我家乡的贫穷，至今也只有少许的改变。小时候，看那些人做忆苦思甜报告，觉得他们虽然吃了苦，但出够了风头，真是羡煞我也。想一想，我也吃了不少苦，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人请我做忆苦思甜报告，心理就很不平衡。我虽然没吃过观音土，但吃过一种野草做的软雀巴。如今许多人喜欢吃的绿色食品、山野之珍如蕨菜等，至今仍是我讨厌的东西，因为在没有肉、没有油，又饿饭的情况下，这种东西我吃得太多，以至于胃口对它们“说不”。1976年农历三月，有一天晚上母亲用一点油和盐给我炒一点春天刚发芽的刺老苞叶（不知学名）来吃，我问妈今天为什么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妈告诉我，儿啊，今天是你11岁生日。当时大哥在冷水河工地上修水库，二哥在师范学校读书，我端着那碗饭，看着妈，泪水在眼眶边转呀转，使劲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来。

自从我大学毕业以后，母亲一直跟随我在成都生活，但她回忆起那些日子，依然不寒而栗，听到“大食堂”三个字就有恐怖的条件反射。那时的人，说着说着就倒下去死了，真是司空见惯的事。家乡旱田、乐园、双池三个生产大队加起来600人，吃大食堂的时候，5斤豆子磨豆浆，伙食团的伙夫先舀起两大桶很稠的豆浆备自己食用后，再掺满水，其透明度，和成都人1949年以前在茶馆喝的白开水（他们称其为“玻璃”）一样，临水一照，真的不亚于镜子。然后舀给每个人一碗，这样的“共产主义伙食”真是塞牙缝都不够。

母亲以她的经验说，庚子年年份都不好。她说上一个庚子年（1900年）也饿饭，这一个庚子年（1960年）饿得更凶，现在隔下

一个庚子年（2020年）还有19年，那时我倒不一定在世上了，真希望你们都平安无事，不再饿饭。我知道这是母亲的经验，不可以用逻辑来衡度，当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饿不饿饭。

4. 无耻

我生在穷僻的山乡，是湘黔川鄂四省交界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名叫旱田坝。我们那里在1949年以前，兵荒马乱的年代，是民皆匪，匪皆民。换言之，白天是民众，晚上是土匪。主业是种田，兼职做土匪。看过《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的人，一定知道我们那里盛产什么。我们那里的人虽然个头矮小，但民风剽悍。不过有一点，百姓淳朴好客，古风翕然。我的童年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由于饿饭，偷鸡摸狗的人和事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生产队储存的粮食，就被我们生产队几个泼辣的妇女偷去。于是生产队的会计来了一句顺口溜："旱田是个好地方，没有饭吃人就光（死完）；今年收成并不少，三个妇女就偷光。"在我的道德观念中，这虽然算不上无耻的事情，但也够出格的了，当然人到了命都保不住的时候，总会做出些非常之举。

我们村庄，有一个书读得多的人，名叫冉茂学，按辈分来讲，我应该叫他四公（四爷）。大饥饿的时候，他正在都江堰搞水利工作。看到饿殍遍野，与家里又难通音问，便舍弃工作，一定要回乡看自己的父母。哪知他回去也没能救得了他们，而自己又身陷贫僻的

山乡。更倒霉的是，他家是富农成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经常被批斗，不仅得参加劳动，而且被罚打扫生产队的牛圈、猪圈。后来，要批刘少奇，于是就请他照着刘少奇的画像，做了一个模子，立在我家门前临河的跃进门（小时误听为“跃鸡门”）旁边。所谓跃进门，是专门的批判专栏，和张贴伟大领袖语录的地方。我记得刘少奇的那个塑像，塑得并不怎么像。倒是那几颗从嘴里露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牙齿，七拱八翘的，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后来学到“青面獠牙”的成语，就一下子回忆起那个塑像，从心底里佩服语言的准确生猛，仿佛“青面獠牙”这个成语就是专门为这个塑像而度身定做的。

像这样一尊不受人待见的塑像，立在临河的大路边，自然少不了人们常降“甘露”。学生路过，就常常于此撒尿，专门从头顶自上而下，尤其喜欢撒在塑像嘴中。到后来，甚至连狗也喜欢到那里撒尿。那时候，我们在河边洗澡后，专门到此一尿，感觉到一点革命小闯将的威风，一点都不觉得可耻。当然现在我认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干下的第一件无耻的事。但请你注意，我并不认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才值得尊重，哪怕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羞辱，这是人类对自己的大不敬。

另外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便是我的老师被游街。可耻的是，我是一个看客。尽管那时我才读小学二年级，许多事情弄不明白。被游街的人名叫陈德亮，那时还不是我老师，等我到丁市小学读初三时，他才是我老师。那时他是被改造的人，在自己的家乡

楼底大队接受"再教育"——中国发明整人的字眼有一整套,"再教育"只不过是庞大的整人语汇中的一个罢了。如果有人编一个"整人词典"的话,说不定还很畅销,因为整人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也就是和农民一起干重活。既然像农民一样生活,他当然就要喂猪来改善一下自己苦役式的生活。那时不成条文的规定,必须要先交一头猪给国家,才能自己吃一头;如果只有一头,一定要交一半给国家,否则视为违法。尽管国家的收购价格低廉得吓人,但当时基本上没有猪肉买卖市场,所以吃亏也只有认了,何况背后还有一个吓人的名字叫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干的哪怕是违法的事,又有哪个市井细民敢惹?

那时候还不是我老师的陈德亮老师犯了一个错误,即"吃大的交小的",这是他被游街时挂在脖子上赫然醒目的字牌。换言之,他将一头大点的猪杀来自己吃了,只将那头小的交给了国家,这就是他的全部罪行。游街选择在宜居乡的赶场天,彼时毒日当头,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学校的学生急急地往乡场中心挤,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往日学生看热闹的劲头不如今天足。等我到街上一看,人群如潮,只听到每阵敲锣打鼓后,便是一声巨吼:"打倒陈德亮,吃大的交小的!"接着便是一群人并不整齐的帮腔。陈德亮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见他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阴丹士林蓝布,腿脚打抖,嘴中不停地说着:"我叫陈德亮,我有罪,吃大的交小的。"学生娃跟着学他:"我叫陈德亮,我有罪,吃大的交小的!"接着便是人群哄笑。所有的人完全都是看稀奇把戏的感觉,好像

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与人不同的另一种动物，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一副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知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权利，我为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震惊，这当然是多年以后的事。

五年后，我当了陈德亮老师的学生，他讲课讲得不错，我对语文很有兴趣。顺便说一句，我做学生的经历中，有四个语文老师维持了我对语文的兴趣或者说种下了热爱文学的根苗。那便是我小学时的陈德厚老师，他的汉语拼音教得棒，人又有耐心，使我受益无穷；初中的陈德亮老师、高中的欧全平老师，他们对字词句抠得特别有趣，评讲作文不拘一格；大学的吴朝义老师，他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所有大学老师中讲课最生动的。陈德亮老师教了我一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还比较满意，唯独有一次学鲁迅《友邦惊诧论》后，写作文，我生搬硬套地写了一篇我至今已无印象的作文，令他大光其火，在全班当面点名批评我，令我难堪。就学习本身而受到批评，在我的学生生涯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因此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声色俱厉的表情。

我一直没把自己小时候看他游街的情形，给陈德亮老师说过，怕揭他过去的伤疤，自然也一直没为此事给他道个歉。因为在此前，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事与我无关，我只不过是看了几眼，我道个什么歉？后来，我读了《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基础》、《乌合之众》等书，才知道群众的盲从以及看客心态，成为了专制制度的温床，甚至帮凶。这时才明白做学生时读鲁迅的《药》是没读懂的。看了近一两年某名人为其“文革”时期的言行曲为辩护的做

法，我真的替他难过，这是何苦呢？一个人不应该将丧失良知的包袱一背到底，直赴黄泉，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是太不值得了。

陈德亮老师，我为曾经围观过你的屈辱，替恶行造势道个歉。

5. 口号

美国是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但有一点它没法超级起来，不能与中国抗衡，虽然我们不能说口号是中国的特产，但在好喊口号上，中国绝对是个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口号为“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正是这些简短的句子帮助和造就了一系列的运动，诸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不一而足。如果说运动像一条长河奔腾汹涌，不舍昼夜，无法抗拒，那么口号，就像每一次洪峰来临一样，排山倒海，每每掀起历史新高，甚至超过社会所能承受的警戒水位，最终像激情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小时候没有真正的儿歌可听，跟着母亲学了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如歌唱亚非拉革命的“地拉那啦，地拉那啦，天空开红花呀……”结尾当然是美帝国主义倒霉。如果我们参照一些当时的口号，更能深刻感受宣传攻势的立体氛围，如滔滔洪水，不可阻遏。“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光明日报》1968年9月27日），接着便是“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

地方滚出去”（《人民日报》1970年6月27日）。只要我们看上一两句口号，就知道口号多了，也互相抵消。既然“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为何又要声嘶力竭地喊“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事实证明，要让“美帝国主义从它侵略的一切地方滚出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亚非拉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就只有鼓动作用，而没有实际意义，自然也就不是个事实判断。为了自己的利益买东西之前，要背一句“狠批私字一闪念”，这种前后矛盾，缺乏逻辑的言行，使得行为与口号之间变得滑稽起来，成为黑色幽默。因此，在我看来，口号除了它的鼓动性外，空洞无物也应算是它的一大特征。口号既是一种没有来头的抽象概括，更像一个无所不装的大口袋，仿佛什么都能装下去，其实仔细一看，什么都没装，只是一个瘪瘪的口袋壳子而已。

口号由于要显示其权威性，自然不可辩驳。从句型来看，多的是祈使句，命令成分居多，偶尔忍不住要咬牙切齿，或者干脆就是不讲道理，就连歌词也成了歌唱的口号，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配合祈使句所用的符号，自然多的是感叹号，一个不够，用两个，两个不够用三个，感叹号如同惊堂木，让你知道权威的分量，谁想反抗，便会被压得粉身碎骨。再者，如不是祈使句，口号大多用的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思维理念，常用套语为“不是……就是”，“凡是……（就）……”复次，口号必然有群众性，成为大家争相发出的声音。一人呼口号而众人跟进，是群众性运动的必备产物，一个人喊口号，固然势单力

薄，更重要的是，不足以展示口号的风靡影从，遍及五洲四海。

6. 核心

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词汇兄弟”汇聚起来，就可以从统计学上看到其“家族”庞大的渊源。整个60年代几乎是围绕这些使用频率很高的核心词运转，将这些核心词串联起来，进行适当的造句工作，就可以把握60年代中国的大要。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这些核心词汇的附庸，不管是人们的心灵满足还是物质需求。兹适当举例如下：

人民、欢呼、胜利、革命、分子、红卫兵、串联、专政、立场、阵地、路线、捣乱、伟大、英明、闯将、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纸老虎、形势、逆流、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走资派、当权派、大字报、四清、指引、统帅、领袖、粉碎、阴谋、敌对势力、你死我活、打倒、整顿、死有余辜……

我们可以用这些词汇写一篇伟大社论，也可以用它来整肃异己分子，更可以用来说明祖国如何欣欣向荣，而豪气干云。这些词汇是伟大的，得宠的，失意的只有活着的小人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双重的饥饿和空白状态。包括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吸吮的乳汁有不可弥补的先天缺陷，这是我们的致命伤。

比傻帝国与中国阴谋

1. 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

一个人没有快乐的童年，固然令人扼腕；但整个民族都缺少或者说没有童年，岂止是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归扼腕，痛心归痛心，但我们不能自抹脖子了事，得面对现实，像我们这个民族，在她该具有童趣时，就是一个缺少童趣的民族。我研读作为中国文化平台的先秦诸子，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固然不少。但在面对现实社会的棘手问题时所采取的规避态度，却是惊人的一致，即回到邈远不可知的至德之世，这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和观察问题的一个路径依赖。换言之，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未来，一个民族的思想精英或者说是思想库里，对未来缺乏理性预期及合理前瞻，自然更没有大胆的想象，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穷根究底的大事件。

马恩论及古希腊艺术时所说的希腊先民们是健康且会游戏的儿童，这个比喻使我至今记忆犹深。面对这个比喻，再看看我自己就生于一个没有童年的民族，内心的悲怆及伤感真是不可名状。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就是我们生存境况的不易，并随之而在精神领域内伴生的活命哲学。生命是重要的，自然活命不会不重要。但问题在于，我们把如何忍辱偷生、匍匐蚁行当成了生活的全部，成了生活

的重要准则。既然如此，为了活命，便会不惜一切代价，也就会达成“对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这样所谓的高尚伦理的绝对信服。于是勾矩之术、长短经、阴谋韬略便十分发达，甚至形成了像鬼谷子那样专门教谋略之术的老师，于是苏秦、张仪学而成战国末期“合纵连横”唱双簧戏的风云人物。从远古的生存讲究孔武有力的尚武时代，到讲究不择手段进行智取的尚智时代，我们实在行进非常快，大有水到渠成之感。

在先秦诸子中，像庄子这样伟大的人物，热爱自由的战士，他谈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时主张逍遥，谈到齐物时，以“丧我”始，而以“物化”终，在这整个儿无我的状态中，无不遭遇着读者对其偷生自保的误读。在他看似狂傲的言行中，实在包含着对生存的绝大忧患，以及一个人生存自保之不易，并且为此不得不付出的高昂成本。这一点在他有着某种精神对应的老师老子身上显得特别明显，并对后世的谋略家和无耻政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去的林语堂先生在研究《老子》后曾说：“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啻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韬晦为人生战争的利器的唯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老子的智慧》）除了不认为“它是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外，我认为林语堂先生的阐述符合我对老子的认识。当然更确切地说来，我们民族的成熟，更多的是在道德尤其是伪道德泛滥的领域，以及人际关系及名

利场争斗的过于早熟，对于制度的创新包括对人的至高无上的尊重上却是至今语焉不详，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是不折不扣地处于鸿蒙无知的状态。

在我们这个注重谋略的国度，一个民族没有童年，自然对儿童的要求也特别不一样。我们对儿童的赞赏不是要他拥有真正的童心童趣，而是要他少年老成，做一些与他身份年龄极不相称的老成之事，才能博得大人和成人社会的欣赏，而对成人中那些遇事说话直爽之人用“童言无忌”来进行批评，由此可观我们对童言的忌讳。看一看我们对甘罗十二为臣相的推许，看一看我们对孔融李贺早慧的赞美，你就知道我们对儿童尽快成熟的热切期盼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程度。你也就不难理解，我们许多人为什么还在青壮年时期就透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未老先衰之气，而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却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窒息不少人的青春豪气。

2. 阴谋与放屁

我们周围善玩阴谋并且乐此不疲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他们的频频演出，就像每天必须固定上演无数个“阴谋剧场”，更像一个爱吃蚕豆的人，成天放屁并以此为乐，似乎在用礼炮来欢迎别人并博取他们的好感一样；如果有屁不放掉，反而容易使身体不适，肚子饱胀。同理，不玩阴谋，就会周身发痒，浑身无力，如同死物，愧对先人。因为我们的先人过早成熟，而过早成熟对我们后世的遗

赠便是以处理人之际遇为核心，从而拿来处理我们生活的一切的最高准则——各种千奇百怪的谋略。

我之所以将阴谋与放屁拿来联袂作比，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中，几乎无处不见谋略包括阴谋的影子。这一点正是西方世界与我们中国的不同之处。一些不知深浅者常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观点断章取义，拿来证明中国谋略的高妙，进而用日本商战和海湾战争中流行《孙子兵法》来证明吾国文化之高明。诚然，西方人在非常时刻对谋略也极其重视，如战场与商场。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遵循既有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及与此相配套的伦理准则，而不是无所不在使用谋略包括阴谋诡计。譬如一个人在生活中要讲信誉，并不是要你做一个道德楷模，而是为了自己生存之必需。如果你丧失了良好的信誉，那么你将自绝于人民，无法在人生之江湖中行走。但我们却不建立这种良好的信誉制度，人人都在其间巧取豪夺，于是坑蒙拐骗才四处泛滥。所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只不过是为了少数德行高尚的人专门预备的赞词而已，对人人都要讲信誉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没有信誉制度的约束，一诺千金便成了一顶道德桂冠，而不是人人必须奉行的实质性要求。在一个不讲信誉的环境里，坑蒙拐骗所花的成本比一诺千金的成本要低廉得多，实际生活中不讲信誉，而我们在道德上又大讲特讲，以至于这种道德要求最终变成了矫饰虚夸，将自己不义的行为披上一层大义的外衣，以蒙骗他人的信任。如此一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充满阴谋的名义场。

各种近乎奇技淫巧的谋略泛化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毒害了我们的生活，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产生了大量的假道学、伪道德，而我们的实际权益却得不到保障。在人人自危的情势下，只得以“防人之心不可无”作为生存的信条。

3. 全体人民装孙子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珅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这句话概括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你再聪明，也不可能比皇帝更聪明啊！”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谁比谁更聪明，不是聪明本身就能够定夺的，而是因着无上的权力，才能够变得“更聪明”。你也许会说这是和珅这个马屁精的上佳表演，但我要说和珅只不过是露骨地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也是不少有成就的大臣如曾国藩等在获得巨大成功后，反而心情并不快活的原因，因为功高震主是稍有心计的人，在专制制度下都不得不忌讳的。推而广之，大臣不可能比皇帝聪明，各级官员随着等级的不同，下级始终比上级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层亦即广大的民众。这样的结果，便是民众中有稍微的反抗或者不听话的聪明，最直接的称呼便是“刁民”，本来民众也并不是不习惯于装疯卖傻，而是装疯卖傻实在无法得到赖以活命的基本生存条件了，只好选择“刁民”一途，正所谓逼上梁山。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要想极富想像力和创新

能力，就得有一整套完善的保护创新能力的机制。不幸的是，几千年来以至于今，都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相反倒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推之”、“枪打出头鸟”这样的训诫，孺妇皆知，成为全民近乎集体无意识的认可准则。有真正良好的保护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人们的创新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发挥。这种环境下，人们比的是谁比谁更聪明，谁比谁更有才华，更有创造力。反之，人们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愚蠢，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形成的文化是一个“比傻文化”，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比傻的国家。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是堂而皇之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假装不聪明，至少表面上要如何愚蠢，以便比自己“更聪明”的上司欣赏你，得到他的提拔，于是吹牛拍马，装疯卖傻，便成了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日常行为。

三十六计中的“扮猪吃虎”（有的版本名为“假痴不癫”），便是典型的比傻行为，亦即日常生活中大家所说的“装孙子”。这一计谋的核心便是，先示人以弱，麻痹对方，趁其不备，寻机再战而胜之。但是，这里有一个好玩而且可能的现象势必要出现，即人人都学习装疯卖傻，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傻子无所不在的傻子国，但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不明白，而在心悦诚服地、一生不变地想要做一个傻子。对真正十足的傻子，没有谁对他是持赞赏态度。我们赞赏的是一个人“面带猪相，心头嘹亮”，也就是装得像一头蠢笨的猪，却把一只凶恶的老虎都给吃掉了。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一方面愤世嫉俗地表明唯有他是清醒的，即“举世皆浊我独醒”；

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一个真正清醒的人，要装疯卖傻到别人无法窥知的境界，实在也是天下难事，正所谓糊涂难得。接下来也许有人要问，我们的生活中为何有如此多的糊涂虫呢？这是因为，我们无法保障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因了聪明便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得先机，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保护创新以及激活人们想像力的传统，这种不带傻气亦即不会装疯卖傻的聪明人，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说得再明白一点，不会装孙子的人最终就成不了江湖大爷。

计谋的特性，是四两拨千斤，以巧取胜，从而在总体上来讲，计谋是个先示人以弱的东西。三十六计的精髓便是以巧制敌。实施计谋的境况，八成以上都是以自己弱小或者假装弱小来取胜对手的。这也就意味着，除非你不使用计谋包括阴谋，否则装孙子就是你一个不可能逃避的选择。我们不怕在非常时刻包括战场和商场中装孙子，那是因为非常时期需要运用非常手段，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甚至许多创新领域内，我们都不得不装孙子，大家都看上去傻里巴叽的样子，虽然有一定的喜剧搞笑成分，但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悲剧的怆痛。

4. 阴谋的深渊及其经济学成本

虽然计谋与阴谋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前者中性，后者含有贬义。但就大多数谋略的总体特性来说，不可能像符合法律的合同一样白纸黑字地被规定下来，虽然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可能要使用

具有一定谋略的谈判技巧，但如果合同本身不违法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的。但大多数的谋略使用，都是为了不让对方知晓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设立的，因此存在信息上不对称是绝对的。互相不摸底或者不完全知晓其根底，采用计谋，以巧取胜，似乎是别无选择。就像说谎是非市场经济时代一种普遍行为一样，因为说谎的成本低而获取的效益高，而不是我们常讲的说谎仅是一种道德堕落。虽然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杜绝说谎，但却可以避免大规模像大跃进那样的全民撒谎，造成真正的历史悲剧。

我们对选择计谋包括阴谋的团体和个人，一般说来会做道德上的否定评价，老奸巨猾的小人就是常用的标识。但选择谋略包括阴谋最真实的动机，绝不是为了与对方进行道德上的比拼，以一争高下，而是具体境况下的实际利益所诱致。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信息完全，即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息是完全知道的。此点遭到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有力反驳："尽管以完全知识的预设为基础而展开的关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作为一个初步的逻辑探究，偶尔也会起些作用，然而试图用他们来解释真实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这里的根本问题乃在于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即我们的知识在事实上远非完全。"（《自由秩序原理》）这也就是说，知识包括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这也是谋略包括计谋得以实施的先天基础。之所以几千来，计谋在中国特别发达，那是因为以谋取胜成了成本很低而收益最高的事，

这在军事生活和商场竞争中尤其如此。

但这里有一个被大家所共同忽略了的问题，我们必须清理。即我们将谋略泛化到我们的日常人际交往之后，带来的对我们民族品格、个人品质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大大降低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公平与效率，影响了个人生活质量及社会进步，抑制了整个民族的创造性。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爱窝里斗，中国人的文化是酱缸文化，并没有错。但中国人为什么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一条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柏杨及很多人的思考就不那么让人满意了。因为许多思考中国文化的人，总是喜欢说我们的文化及民族性格的缺陷，而对造成这种缺陷的“罪魁祸首”或语焉不详，或姑息纵容。那是造成我们这种文化及民族性格缺陷的专制制度，因为人是受制度影响很深的动物。这种制度长达几千年，已经深入浸淫到我们的生活及文化的各方面，使得各色人等习焉不察，或者对此安之若素。因为专制制度缺乏现代民主制度所能够造就的以人为本、信誉至上的环境，于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便缺乏安全感、信任感，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民众之间也不信任，这种人际环境使人对自己的将来缺乏理性预期，致使坑蒙拐骗的一次性博弈增多，于是，选择不说真话而搞阴谋诡计反而成了一种理性行为。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如今许多人依然将各种各样的谋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说白了，是因为选择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原则，所需要的成本相对较低。但问题在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的过渡时期，大家都想选择带各种谋略的低成本方式，而导致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增高，自然效率下降，获利偏少。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的失败而导致市场低迷甚至失败，不能不说与我们的谋略文化过于发达而没有现代信誉制度有关。交易成本简要地说，就是相互扯皮以及对付扯皮的成本，一旦说谎话、不讲信用、违约增加，就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使经济效率降低。这是很要命的。而真正要实现市场经济，实现制度创新是当务之急。市场经济的价值核心是民主、平等、自由、公平竞争，这一切在制度不变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英国著名思想家波普尔曾写过《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的名著，开放的社会自然是民主社会，而民主社会的敌人便是专制社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不仅适合于社会需要开放，也可以拿来作为人也需要开放的例证。但我们几千来的人际格言，“防人之心不可无”，却是此种道理的大敌。我敢说，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花在人际交易上的成本是最高的。逢迎、吹牛拍马、说假话、虚套烦琐的应酬都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这会消耗掉人的多少青春才华，可惜没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来做个真切的算度。在我们这个社会，你有七分才华，三分人际，你失败了；倘若是相反，你倒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才高八斗，也可能怀才不遇，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因为你在人际方面的投入太少了。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信用制度，自然就会使人际投入增加，而人际投入一增加，大家不免互相倾轧，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

大的效益，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在我看来，耍阴谋诡计或者哪怕是滥用较为中性的谋略，都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及相应的社会生活成本增加，本来要用谋略来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滞后，人的创造性委顿的真正根源，当然最终是由于制度的缺失所致。

5. 阴谋的几种方式

三十六计当然有不少的版本，而且中国人的智谋也多种多样，但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脱不了三十六计的概括，何况三十六计互相之间尚有重复。我想概括地说，三十六计包括中国所有的谋略，无非坑、蒙、拐、骗、诱五个字。而坑、蒙、拐、骗、诱这几种行为互相渗透，不少时刻难分彼此，只不过为了言说的方便，将三十六计大致分成这几类而已，这不是学术区分，而仅是一种现象概括。

坑的最直接方式便是转嫁用心与灾难，使对方不明了制造事端的主体，从而坐收渔人之利。譬如借刀杀人、无中生有、笑里藏刀、反间计等。

装作不知实情，或者故意隐瞒实情，以达致战胜对方的目的，可视为蒙。如瞒天过海、暗渡陈仓、浑水摸鱼等。

将此事或人而带至彼地，掩人耳目，混淆视听而消灭之，或可称为拐。如顺手牵羊、调虎离山、金蝉脱壳等。

骗作为一术，自然是很古老的，但骗的核心是不能让对手看得透，这就是骗作为计谋的实用之处。如唱筹量沙、增兵减灶、声东击西等。

诱和拐均可视作计谋中的“搬运之术”，甚或是示人以弱、欲擒故纵、假痴不癫等。

6. 用阴谋来了断

谋略哪怕是阴谋可能要与人类相始终，因为这不只是中国人的特殊产品，即便是西方的《圣经》中也有大量的运用和记载——耶稣教导人们“一方面要像鸽子一样温柔”，另一方面要“像蛇一样机警”（《新约·马太福音》）。对此林语堂曾说过，“只有基督教的一个思想，中国老百姓一定乐于接受，也就是耶稣要求的：像鸽子一样温柔和像蛇一样机警。”这说明东西方文化虽然有不少相异之处，但在谋略的某些方面也可获得共识，这也正是像瑞士胜雅律这样的汉学家也能写出《智谋——平常和非常时刻的技巧》的内在理由。最后我想采取一个讨巧的办法，用几个计谋将我的谦虚串联起来，作为本文的了结，以满足我对计谋的游戏态度。所涉及的计谋后面均按最古老的本子《三十六计秘本兵法》的顺序，用括弧作有标注，以便读者查证。

关于中国的计谋，我所知极为有限，只知道浑水摸鱼（20），找不到多少理由的时候，不得已，我便指桑骂槐（26），有时恨不得

立马釜底抽薪（19），因而措辞激烈。或许一不小心我就有偷梁换柱（25）之举，但还不至于无耻到瞒天过海（1），顶多了就是金蝉脱壳（21）而已。虽然你可能说我借刀杀人（3），其实那只是我做得不够地道而打草惊蛇（13）。如果你读了本文，还能对你看“中国阴谋”有所帮助，那么即便你们上屋抽梯（28），我也心甘情愿，这绝非我的假痴不癫（27），我知道自己既不会唱空城计（32），也不会使苦肉计（34），终于投降，于是只好走为上（36）。

非人的历史：血淋淋的动物世界

高中时看《三国演义》，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甚合我等血性刚猛青年的胃口。于是拜服于罗贯中尊刘抑曹的见识，恨不得跑到三国去手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贼，意念中痛宰了无数回，过足了巫师意念害人的瘾。后来读书稍博，始知不特小说家言不可轻信，即便是那些奉正朔、张正统的历史学家，亦是胡言一派。

近几年读过二十四史，始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顾准先生所说的"史官文化"，胡适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且完全遵从的是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非人的血淋淋的大肉搏。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无论姓李还是姓赵的加冕，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都只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残暴把戏而已，于小民百姓的命运无丝毫的改观，正所谓洪洞县内无好人。如果用目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亦即用选票来进行政治更替的民主制度来看，你能说中国历史上哪些皇帝更具备正统资质，而应该受到百姓的拥戴和服从吗？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完全是一部活脱脱的动物史，成王败寇的把戏大家都演得烂熟于心。

吴思先生近著《血酬定律》秉承其《潜规则》的一贯思路：一是弃大取小，即从历史的细部发现历史非人的赤裸裸的动物性，避免那些大而无当的无用结论，直指中国历史令人惊悚恐怖的现实；

二是弃明取暗，即去掉那些旌表文章中的道德外衣，拿掉奉正朔、张正统的史学家的道德绑架，那些冠冕堂皇形诸纸笔的所谓法令规则，往往不及私下潜涌的陋规例则更能探得过往的真相。三是用自创的新词定义描述那些不好言说的模糊历史，如“潜规则”（相对于流行于桌面上的道统规则而言的私下约定）、“血酬”（用生命作为赌博之资，作为生存的最为基本的常用法则）、“灰牢”（如大家都见过的那种软禁人的所谓学习班）、“白员”（冗员，依附于正规编制的多余人员）等等，无疑它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的迷雾，而少受大言玄玄的正统说教的洗脑教育。四是在深揭历史痼疾的同时，更不忘用史家的铁笔、学者的良知针砭现实毒瘤，在抓住事实内核之后不惮下价值判断，并无一些学者遇现实而绕道，生怕触雷的所谓价值中立。

《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无疑是《血酬定律》一书最重要的文章。文章从考察用博命方式活命之土匪的历史渊源人手，着重分析匪何以成匪。专制社会的无道，使一个人做良民而不得，即如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随即细致而大胆地梳爬出官匪互变、匪民相连的惊人现实，进而得出中国历史在表面规则上有一条更为有力的指导性规则亦即他说的“元规则”——暴力强者说了算。中国历朝历代专制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是最大的暴力集团，而根据每一个阶层施暴能力亦即权利的大小，其施暴的范围及强弱也有所不同。一个衙役对单个个体的施暴能力可能不输于一个残暴的皇帝，只是衙役施暴的对象尤其是波及的广度不会像对万民

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那样，使万民顷刻死于一旦。但正好说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一座典型的金字塔生存结构，是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而造成的累累白骨或者小民的现实苟活来搭建而成的，好比"一将功成万骨枯"。当一个人被逼上生存的绝境，其与社会博弈的资本除身体外别无长物时，在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号召下，通过社会动荡和流血来重新洗牌就不可避免了。换言之，官匪互变、匪民相连的切换，端赖一个社会给人的利益最大化之追求创造了何等可资利用的资源和环境。陈胜、吴广的起义，李自成的造反，都只不过是专制制度残酷压榨该得到的报复罢了，尽管我们不能就此来反证他们的正当性，但人都有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本能以及生活得更好的权利，有时你想与现实和解，却像丘吉尔所说的人生三大难事之一——爬向一堵倒向自己的墙——一样困难万端。作者说得好："有一条无形的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会流血。大规模突破，大规模流血。生存在血线之下的集团就是博命集团。"(《血酬定律》P42)

诚然，吴思用经济学的思路来解释历史和现实的残酷冲突，有新人耳目之效，亦不乏切中痼疾之见解。但也因对经济理论来阐释历史这一路径过于迷恋和信任（这一点与他所批评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有相同的弊病），使得他的评价因过分充溢着实用主义而显得在冷酷中有庸滥之嫌。在《刘瑾潜流》一文里，作者分析如刘瑾一般的人物时有两句总结性陈词："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

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可谓一针见血。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给刘瑾的一些“辩护词”：“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定的，刘瑾只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P71）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论预设，即人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物。作者分析刘瑾之横征暴敛以及变着法子整人，空前绝后，如果说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难道另外一些太监就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吗？为什么没有刘瑾这般残暴大胆呢？你可以给我解释是他主子的纵容以及他本人过人的“本领”所致，甚至你可以说他的整人与别的太监相比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但我要问的是刘瑾为什么会这么极端呢？所以皇帝也好，专制制度也罢，都不能遮掩他的罪行，都不是宽恕他的理由。专制制度诚然是罪莫大焉，但生活其间的个人能说自己是毫无心理负担的受害者吗？我看问题绝不那么简单，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谈及群众心理时名之为“乌合之众”一样，选择专制制度同时又被专制制度所催生，没有谁可以完全干净地靠岸，更何况刘瑾这样的罪大恶极之徒，怎能逃脱在抨击专制制度之外的苛责？就像“文革”的发生你能说只是当权者或者“四人帮”有错？人人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罪，只是当权者更无法赎罪，所犯的罪行更不可饶恕。

《血酬定律》给人以新的启迪，但只是击其一端，远非尽善尽美。与他的《潜规则》一书相比，明显看出急就章的拼凑痕迹，这是《潜规则》一书畅销后，作者不能控制商业诱惑或者变相催逼，

匆忙成就的作品。虽然可以理解，但我还是不能不遗憾地说，读完此书，没达到我预期的兴奋程度。

2003年10月22日凌晨2：40于成都

通往比傻帝国

我有两个朋友看电影看DVD成癖，如今已渐成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是女作家洁尘，她的两本电影随笔《暗地妖娆》、《华丽转身》均是在万丈红尘中别立姿态；二是疯狂抢碟猛看的思想者王怡，此公提到某个漂亮女演员比对自己的太太——尽管他太太的漂亮也不输于很多自视甚高的女子——还熟悉。洁尘的读了，惊叹于她的敏慧绚丽，细达毫芒；王怡的阅了，诧异于他的别有用心，直捣黄龙。这自然是在下的私见，虽不足以耸动成公论，但贡献给艺术欣赏的领域，哪怕稍有差池，却也是可以饶恕的个人偏好。

2001年7月，藉李陀先生到成都之机，阿来邀扎西达娃与我会于黑夜吧，始识雷立刚和王怡。彼时寡言的王怡并没有引致我太大的注意，他给我写了网址和电话，之后瞬忽一年，无片言只语之交往。忽有一日，廖胡子亦武告知我说有人在网上假他之名痛骂余杰，殊为可笑，并说读到有个叫王怡的家伙写的文章，极为难得，并加重语气让我一定要看，且告我网址。我想，这个猖狂孤傲到顶的廖胡子有何人可入他眼目，居然赞起人来，莫非变天了么？于是开了电脑，上得网来，一阵猛读，始知此人识于一年前，悔无任何交往。好在当初的电话尚在，于是在电话中将其佩服一番，表扬一通，好在再会思想的人也服这包药，遂重新订交。之后交锋与论辩，赞同与反

驳，酒精与饭局渐多，始知其不特极有思想，而且爱好广泛，趣味良多，尤其对电影情有独钟，竟然出了本电影随笔《满载鹅的火车》。

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自己固有的知识背景，学文者自然好从影片的审美分析、艺术欣赏角度着眼阐述影片，前述洁尘便是；而学法律的王怡则多从影片的立意入手，探讨影片里所包含的宪政与自由、法律与犯罪含义，但行文绝不枯燥，时有出人意表的调侃，给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之感。在关于《七武士》和《蜘蛛巢城》的评论里，涉及到信仰给一个人所带来的矛盾时，他说："（生活）总是需要一两处地方是没有大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是一个清洁工。找不到上帝的人是不卫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也是一种媚俗。需要信仰就等于是在发春，向我主祷告说：'官人，我要。'"这些话就像他所赞赏的黄药师，有股"邪"味，在调侃之中让你看到是一个真人所说的话，不像有些人板起教师爷的脸嘴、以一副真理在握的面孔自居，完全像个死人，而这样的死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与死人生活在一起，不只是普通老百姓害怕，就连像我这样有点匪气的人，都经常感到毛骨悚然。

常人只会见到一种不好的制度譬如专制制度，对人的显性危害最大，因为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事关重大，这自然正确无比。譬如残暴已极的孙治刚案件，是一种怎样非人的暴力，这无论如何应该受到严厉的讨伐和谴责，并追究当事人以及主管者，乃至收容制度之责。但这些残害孙治刚的尤其是收容管理者为何禽兽不如，其主要原因何在，不只是手中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更重要的是，整

个宣传机器所运用的暴力命名术。小时看电影最爱问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人，谁是正道谁是魔道，以为世界如此简单易分。王怡在《蜀山传》中探讨“暴力和暴力的命名”，正好挖掘一个人在法制不健全的制度下为何会培养出如此强烈的整人及暴力倾向。“因为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产生最恶劣影响的其实并不是暴力，而是对于暴力的命名”，这就像杀人盈城的行为，只要自己手中握有权柄就会命名为“革命”或“正义的事业”一样，岂止名实难副，实在颠倒黑白！

数年前开始写作《中国告密史》，读毕二十四史，包括查阅无数明清史料笔记，以及我在旧书市场收来的其它杂件，深感一个社会依靠检举告密，其代价之昂贵，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一个民族的政府靠检举告密来维持其运转，不说让那些检举告密者获益的显性成本，单是整个民族素质的降低、人格的损伤，以及让每个人生活在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生活环境中，其危害可谓千秋万代。摩罗兄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文章里比较了中俄两国生存土壤的区别，就痛彻地批判了中国这种告密制度的黑暗，指出吾国为何不能诞生精神巨人的深层原因。反右及“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父子相告、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成仇，就像植物，挖掉你生存的土壤，断掉你的空气、阳光和水，除了死路一条，实在别无选择。正如王怡所说：“如果仅仅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犯罪，而去伤害每个人心中最宝贵、最柔弱，甚至可以说构成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实在是贻害无穷。”“除非包庇窝藏的行为手段本身涉及到了其它的犯罪，一个社会是不应该鼓励、威胁和强迫一个公民出卖

自己的亲人”，诚哉斯言！

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其娱乐性和票房价值注定了它是与民众最亲近的艺术品类之一，活生生的细节和充满动感的画面，决定了它的可接受性是许多艺术门类无可比拟的。而在这些细节和画面中，更能深切地包含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从这些人们习焉不察的细节中探出该影片所具有的民族心性和思想资源，是王怡电影评论的绝大贡献。我常说生在一个专制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灾难。这种灾难在王怡这种清醒的思想者也不免时有发生，下意识地流露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奴才有罪主子无过的思想，如他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术语解读《青蛇》，说作为大内侍卫的大鹏金翅明王够狠毒，而如来佛反倒并不在意一个科级女士蝠由于思想不能统一放了个臭屁，据此说明大鹏金翅明王如何的令人生厌。如果如来佛不纵容，大鹏金翅明王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如果不是专制制度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网络，如来佛纵有豹子胆也是枉然。换言之，不要出了问题，就停留在爪牙有错、主子无过，小的该死、领袖万岁的层次，那么不仅个人无救，民族亦将无望。

“满载鹅的火车”这句话，是苏联电影《毒太阳》里的音乐老师波里临终时所说的，这句话说尽了所有铁幕国家的真正思考者临终时该说的所有秘密。读了王怡所有的文章，我才想起他的书名是为我现在这标题而准备的：满载鹅的火车，通往比傻帝国。

2003年7月15日于成都

中国的怪题

据说中国人的智商是不低的，挣钱堪与犹太人比肩，当留学生玩题可以独步西方，这些伟大的报道不时充斥着国内善于搞信息垄断和玩一面之词的传媒，老子天下第一都不足以形容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发飙的爱国感情。吾国可歌可泣的事情固多，难以尽述，但至少有一项伟大的聪明被忽略了，即中国的聪明人出题的功夫好生了得，我只要说出这些题目，就够蛮夷之邦的高级知识分子喝一壶的，不是噎着就是醉坏，我敢跟你打赌，不会有第二条道路。

老婆和母亲同时落水，你救哪一个先？这题太次了，但就这小概率事件也可搞死你几个脑细胞；饿死与失节哪个更重要？我保准你会答错；舜尧会不会遍布神州？我敢肯定会把你搞晕；道德和金钱是不是敌人？如若是，请你来哥德巴赫乱想，如若不是，那么好，请你来开家道德银行。我猜你会夸奖我好有想像力，在下真是惭愧得紧，这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发明，不敢掠人之美。道德银行完全是对银行的“克隆”，有户名、账号及存入、支出、结余等栏目，币种不叫人民而叫道德。道德币怎么挣呢，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和其它好人好事都可获得道德币；道德怎么存呢，献血一次可得2万道德币；道德币怎么扣呢，有相关违纪行为，要扣2—10万道德币。除此之外，我道德了还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比如享受申请

勤工助学岗位、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类培训优先考虑待遇、可申请各类知识竞赛和学术讲座门票、获赠一季度学科类的报纸杂志等。献血当然好办，有献血证，做假的成本好像比较高。我扫了次厕所，是否请个同学在旁边站着监督？扶老人过街是否弄个同学来证明？我在公共汽车上让了回座，是否请那位受惠老人写封感谢给学校？我直接捐助了一名失学儿童，写在日记上，你们承不承认？道德银行行长大笔一挥说，行，完全照存。我是个数学上的失败者，但我敢肯定几个回合下来，道德可能没了（互证好人好事实在其乐融融，不这样做简直没天理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银行倒是通胀得厉害，因为大钞很多嘛，献血得两万，扫次厕所怎么也得三千吧。我拿着这道德币还以为在过清明节呢，因为赶明儿要赛冥币啦。

当然，有人会说我在搞诛心之论，反推归谬，其实这都是高看了我，我完全没准备拿出这把劲头对付此事。据浙江工业大学的领导说，此举是为了解决德育课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真是用心良苦。诚然现在的德育课是假话大比赛，但道德货币化就一定不变成滑稽的造假表演大赛吗？反正我绞尽脑汁也阻挡不住它向假的方向挺进的步伐。当然幸好货币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么全中国的道德表演都要到浙江工大去开展了。那么有人会问，德育课在搞比傻表演，道德银行在玩造假花招，究竟要怎样才能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我不是巫师，不能给你念一咒就解决问题。简单点说，诚信要靠制度来解决，道德要靠法制来保障。没有制度的所谓诚信都会变成表演，没有法制保障的道德都是道学家的元配。举个通例吧，

你如果说美国人生下来就比中国人讲信，打死我也不承认，但你现在说他们大多比中国人讲诚信，我同意，因为他不诚信便要自绝于人民。而我呢，在一个没有法制保障、没有诚信、坑蒙拐骗盛行的社会，你叫我一个人诚信，你不是要让我自绝于人民吗？求求你，不要给我讲什么道德，我是蝼蚁我要活命。你可以说我不道德，但我告诉你，这是经济学家在后面给我出点子，每个人都在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自然这种人人坑蒙拐骗的结果，会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损失，但个人好像不应该为社会缺失负这么多责任，在我看来，政府的信用危机才是我们生活的真正障碍。

古人都说仓禀实而知礼节，吃饱了做点好事是应该的。西方人做好人好事做义工，到社区服务，大多是业余时间，在自己的经济能力及时间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去做的，没有十大道德富翁的评选，更没有人号召你向某某同志学习。因为道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自律行为，不是百老汇上演的舞台剧，不要脱离了贞节牌坊，便一定要与货币拥抱。不要道德出了问题，就学胡万林乱下硭硝，多说点人话多做人事，少去弄那些不挨边的大事糊弄人，我认为你就离道德不远了。要是你觉得以上说法，都太麻烦的话，那么我主张将茅于轼先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作为中国高校的德育教材，甚至可以当作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读本，因为他比我说得利索多了。看了保准你就会知道恺撒的归恺撒，道德归道德，银行归银行，少搞点比傻表演，多弄点聪明有趣的事。

2003年11月25日夜于成都

第二辑

不穿裤子的书生

地球是个坏蛋

满目疮痍的地球，逐渐变成了一枚不折不扣的“坏蛋”，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出生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小村庄，山清水秀，树木葱茏，森林覆盖率极高，各种各样的动物如野猪、豺狼、狗熊等成群出没。儿时饥饿，常能在周围的山中寻到适时而可口的野果子，以解饥乏。而今这已成为前朝旧事，倒是今年的大洪水漫溢到地势较高的我家，猪圈里的猪被冲走了数头，万幸的是房子尚未受损。看一看近年来各地频发的旱涝灾害，你就会知道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远未有结束之期，因为我们对它的破坏实在算得上是骇人听闻。

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及人类两次大的杀戮，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空前恶化，但整个世界对环保的必要性却有个艰辛的认识过程。不只是1949年问世的美国环保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没有引起政治家、知识界与民众的注意；1962年，美国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批评杀虫剂包括获诺贝尔奖的DDT对农业生产及环境的危害，还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时出版了一份非正式的报告，这就是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在两年后的1974年即有了中译本，自然这不是对环保有什么紧迫之感，而是为政治挂帅的“供内部批判之用”提供靶子，按当时的逻辑，公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自然与我们不相干。其实环境污染并不因为你不承认便不存在，环保专家曲格平当时就发现“中国的环保问题实际上相当严重，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不过，这是20多年后此书再版时他在序言中发表的见解。由是观之，过度的民族主义和冷战信条所导致的动辄“说不”，并不总是给善于“说不”的人带来好处。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地球》里对世界环境污染所作的判断并非杞人忧天，其恶化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怕的是很多预言都不幸而言中，其原因无非是“人们为了获得臆想中的好处，宁愿冒一点生命危险”。固然他们说过“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并且也知道经济与环保之间的两难困境，但他们反对那种让环保服务于经济的做法，更反对高污染、高耗能、粗加工、低效益的项目在世界各地频繁上马。以无限地消耗资源和无止境地污染环境为代价，从而取得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办法，固然可使政客们的政治生涯显得表面灿烂辉煌，这种极端短视也许会赢得“有奶便是娘”的部分人的好感，而不考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对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令人自豪的遗产。环保的压力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人口的急速增长以及资源的逐渐稀缺，就业负担随之加重，使得人们为了活命不惜一切代价，环保自然成为这种代价的牺牲品。所以他

们说“最成功的人口政策就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对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不啻是一剂醒脑退烧的良药。

《只有一个地球》除了吁请各国自身对环保的重视外，还特别提倡世界各国在环保方面的全球性合作，因为环境的恶化越来越互相影响并且具有世界性，何况“对于气候，没有一个国家能要求主权”。中国的环保压力更是让人棘手，不只是民众的环保意识淡薄，经济学家忽视“增长的极限”，尚未将环境的损失计入经济增长的成本；政府官员的考评中没有绿色指标评估标准；人文思想学者热衷于空洞地讨论所谓精神的失落，对我们生存环境恶化的批评却是彻底地缺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桂林站为什么被新闻媒体和公众忽视，因为他在桂林是与民间环保人士讨论环保问题，这正是“只有一个地球”促成的。倒是克林顿在听到北京地球村环保中心主任廖晓义批评美国一次性制品过多时，克林顿立即说“是，是”，赓即又拿起他的笔看一看是不是一次性制品的细节，使人感慨。你可以说这里面有克林顿“作秀”的成分，但与某些中国官员擅长在事关民生大计的统计数字上浮夸性地“作秀”，我更欣赏克林顿这种开放的表演。

1998年8月7—9日于成都

科学的光芒与步伐

我们有众多的理由感谢这位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英国人李约瑟，他让我们中国人自己都蒙昧不知的祖先发明，举凡定量绘图法、磁学科学、冶铁技术、机械钟、马镫等等，得以从幽微细小处被揭櫫出来。他深爱中国的科学文化，以至很多中国人都自叹弗如，颇受科学文化上自负无知的欧洲中心论者的訾议。但他的研究在中国，更多的时候不是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的纯然热爱，增加了怀疑和反叛精神，而是从中寻找先前“比你们阔得多”的蛛丝马迹，正中了卑琐自大的阿Q先生们的下怀，实在是左右不得解人。自然，《我与李约瑟》一书的作者何丙郁先生是不在此列的。

何丙郁不只是李约瑟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而且是与其常通音信的好朋友，自然书中记述李约瑟的治学方法或轶闻趣事，均用洗练温婉的文字道来。且附有许多清爽可人的图片，十足地突显其著书时的雅人深致。固然这些也是我乐意看到的，但颇能吸引我之注意的却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论部分准备解答的、何丙郁也作了自己的探讨的、中国科学技术何以在宋朝之后衰落的原因。李约瑟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论部分，我至今尚未见到。但他在有关科学家贝尔纳的纪念论文集《科学的科学》里发表的一篇《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及了中

国科学技术的兴起与衰亡。他固然说过“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但他又说，“中国没有出现过大量的占有奴隶的现象，也许正好是早期中国文化在促进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因素。”而且还认为专制和干涉，反而使得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成为可能。但似乎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原因更是如此，由是观之，李约瑟彻底就成为一个又卖矛又卖盾的人。李约瑟的确只是个科学技术史家，确非像库恩、萨克雷、柯凡雷这样以怀疑反叛、逻辑谨严为己任的科学思想史家。比如库恩就认为，科学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理性活动，无不受权力的局限和约束，当权者需要科学时，便提倡科学，反之则提倡伪科学，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包括吴大猷先生都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古代中国赢过西方的是技术而非科学。因为李约瑟这样的结论在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看来，无论从情感还是从理智上都是不能接受的。文明固然有互不了解而导致的冲突，但何尝又没有类似“围城”一样的互相倾慕，而出现的情感与理智判断上的失真呢？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文化的热爱，是否不可避免地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偏颇呢？

科学史家萨顿曾说：“科学总是革命和非正统的，这是它的本性，只有科学在睡大觉才不如此。”科学是以严格的怀疑与开放的新思想相结合为其特征的。诚如何丙郁所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宋朝以后的衰落，其中之一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怀疑精神，倘若不是中

国人天然地缺乏怀疑精神，那么漫长而严苛的专制制度就难辞其咎。中国古代的科学与西方近代以前的科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地注重于实用的技术层面，否则，也就不能解释古代的主流社会为什么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非像西方那样将科学归于哲学的名下，一旦将近代兴起的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就显示了科学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真正力量，这在以往的中国是没有出现过的。1975年，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科学进步的障碍》的演讲中说到，经济上的贫困和意识形态的偏执，都是阻碍科学进步的敌人，有哪一顶“桂冠”我们黯昧专制的古代中国能幸免而不“荣膺”呢？科学的光芒并非自动照彻寰宇，其步伐在世界也是蹒跚和迅捷不一的。

1998年8月24—25日于成都

普及常识

学者谢泳有感于许多作家缺少吴祖光那样的正气胆识，作《普及吴祖光》一文以张目；同时深感像解放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那样“充满魅力的人物”“后来再没有”的尴尬现状，作《普及梅贻琦》一文以鼓吹。我极为赞同谢泳的意见，但我还要补充一种更值得普及的东西而不是人物，那就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常识，中国人尤为缺乏，并由此铸造了中国社会的病根。

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以传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世上哪有白吃的午餐（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free lunch.）”为己任，因此数度撰文谈及吃白食、占便宜的思想在中国之根深蒂固。他在《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发表近20年后，在大陆出版的他的经济学随笔集仍以此作为书名，我们便不难感到这种吃白食、占便宜的思想对国人浸淫之久，浃肌彻骨，极难肃清。其实左思右想，这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但是向社会阐述及灌输常识，并使其获得大众理论上的认同和行为上的实践，实在是顶困难的事情，以至高先生这样执着地传播经济学常识的人，也有“一个教书人的说服力委实有限”的感慨。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大陆和台湾的民众在吃白食、占便宜的许多方面均有相同之处，但由于两岸在制度上的差别，应该说有些观

念还稍有差别。比如我们一方面说人们缺乏纳税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用了纳税人的钱修建了基础设施后一声不吭，或者根本不提及纳税人的贡献，只是说某届政府为民办了实事；在财政中拿出了一部分钱看望困难职工，只说体现了政府的爱民之心，却不说这钱是纳税人支持的结果，这样就使得纳税人没有自豪感、责任感、义务感，因此国人总是不乐于纳税，以至于偷、漏税甚至拒交税成风。不把这些常识给民众讲清楚，不时时承认他们的贡献，偷税、漏税甚至拒交税的观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进而言之，吃白食、占便宜的观念之不能扭转的部分原因亦然。这当然不是说政府就没有贡献，政府的贡献在于把纳税人的钱用在了急需要用的地方，在修建公共设施之中起到了协调、监督作用而已，把政府的作用无限夸大，足以培养占便宜以及对政府的依赖思想，政府想夸大他对民众的作用和贡献，却反而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故意模糊常识，造成本可避免的混乱。高希均先生说："澄清一些流行的观念，传播一些进步的思想，应当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P27）其实这不只是经济学家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权利和义务，而普及常识，正是"澄清一些流行的观念，传播一些进步的思想"的一种有效步骤。的确，常识不像许多高深的道理那样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但它却与我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的）非常贴近，有些甚至影响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至关重要。可以说，过去的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志解放全人

类等奇怪的做法都是违背常理的，我们民族花了沉重的代价才总算弄清了这些混乱的认识。杂文家朱铁志曾说：“一个由于追求卓越而忘记常识的人，是可笑的；一个盲目超越常识强行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常识的代价》，《四川文学》1997年第12期）朱先生所说的这种关于常识的“常识”，恐怕应该引起所有的人尤其是政府的足够反省，比如老是说“形势大好”，报刊对此的重复率极高，这就是违背基本常识的，并不需要深奥的学理层面的支持和逻辑推理，就能判断其真伪。的确，我们的民众需要深入地普及一些常识，同时也应该具备一点怀疑精神而不是盲从，才有可能分清哪些是违背常情常理的。“我觉得，怀疑精神是随时都应具备的，连一般非知识分子的普通人，都应该抱有几分怀疑精神，这对整个民族来说，只有好处，不会有太大坏处。”（周策纵《弃园文粹》P9，上海文艺出版社）事实上，我们民众的怀疑精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没有保护怀疑精神的健康的社会机制，因此造成中国人内心明白而穷通世故这样根深蒂固的老毛病。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说真话，作为一个做人的常识，反而成了衡量一个人勇气与能力的标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

常识之所以值得普及，这是因为那些深奥的道理需要加以批判性的考察，从而借助具体而微、简单明了的常识而获得普通人的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石里克和卡尔纳普曾断言：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们能被还原为常识。可见常识与科学之间存在

着难以分割的关联，甚至可以说常识是科学的基石。常识与科学固然有不同，但其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存在着可以反复实验的可能性。由于大话套话、假话废话是反生活的，因此它们与常识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像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采自生活的细节和大量的实例，用经济学的解剖刀来阐述假话丛生的道德领域的时候，鞭辟入里地宣讲一些常识，给读者一种涣然冰释、茅塞顿开之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家在我们社会转型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传播常识的角色。而这种常识的增强，亦即观念的更新，大而言之，是文明得以发展、社会因而进步的基本保证；小而言之，"影响国家建设的因素不仅仅是当前的各种政策，而更在于各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P27）。

1998年2月27—28日于成都

纪念一种永远的理想

1898年冬天，一粒在匆忙间未曾被掐灭的种子，经过数代人的浇灌，这棵多灾多难的树终于开出葳蕤之花，结出硕大的精神之果，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北大。在所有这些艳丽迷目的花朵中，最为尊贵的是那上面残存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没有她，那么北大就只不过是中国众多平庸大学中的一所罢了。但是不妨直说，近几年来，我对北大的不满日有所长，不论是从谢冕先生对中国百年文学经典转若飞蓬的评骘标准，还是张颐武先生动辄用后现代主义的刀枪乱砍滥杀而得“张后主”之大名，这种开风气有余而学术积淀不足的做法，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校庆25周年时所针砭的。而且更为不幸的是，如今北大与往年相比，已较缺乏这种反躬自省的精神，多数情况流于自我赞美，如1988年所出的《精神的魅力》即是。因此像一些清醒的北大人，如陈平原先生便借写作《老北大的故事》和编辑《北大旧事》来婉曲地表达他对北大诸种精神失落的批判，借此继承和发展老北大丰富的精神资源。

关于北大的精神，也是言人人殊的一件事，这正好表明了北大精神的丰富性、包容性以及它随时代演进的发展。但其要旨在我们局外人看来却不外乎是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事实上，蔡先生这种理想不只是那个时候的北大

没能完全实现，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多事，就是于今也是个悬得过高的标准，极不易做到。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里对自由的分类，“循思想自由原则”应属积极自由，而“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属消极自由，尤其是后者极不容易做到，因为这里面不只是包举着有所不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学派的自由发展而导致的自由竞争，学生便可因此从中自由选择而发展其独立思考。如此说来，蔡元培先生不只是北京大学走向现代教育过程的奠基者，而且也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难得的精神领袖。再者，对北大的精神积累影响甚深的除了胡适、蒋梦麟二先生外，还有伟大而倒霉的马寅初先生，他在1927年就提出“北大主义”即是为了国家利益不顾个人牺牲的“牺牲主义”的观点，后来终于因“新人口论”而获罪。但是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这实在是北大精神的要害之所在，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以此为榜样的社会良知。

《老北大的故事》不只注重如上的宏大叙事，而且极为重视洞见心曲、抉隐发微的个人叙事，无论是传说还是轶事，皆小题大做，大题小做，纵横贯联。如北大之改校庆日期，就是个让北大人无奈的选择，这不过是北大风雨坎坷的一个表征而已，然而陈先生却以无可辩驳的考证道来，学识与才情并现，理性与真趣兼备，端的是“学问、才气、见识、情趣”四美并得的学术随笔。事实上，北大百年的校庆，早已越出了一个普通学校的校庆，它勾起了人们对

北大辉煌的回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将更多的厚望期许于北大，这既是北大的光荣，也是北大的不幸。因为民族的进步，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昌明，固是北大所应争取和努力的，但北大毕竟是个高等学府，传播知识与发展学术才是它的主要功能。当我们还将某种不切实际的希冀寄托于一所大学的时候，此种越俎代庖正好表明我们制度上的缺陷是多么的深重。对此，《老北大的故事》一书里有一种较为彰显的暗示。但是不管怎么说，北大要维持她的光荣与梦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是一个绝对不可丢掉的理念。

1998年5月7日于成都

思想与良知的“考古”

相对法国思想家福科研究“癫狂与文明”的知识考古，俄罗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正在形成一股对思想与良知的“考古”发掘的热潮，中国对此也作了大量的译介。“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与思想成就成为自苏联解体以来历久弥新的话题，不仅大批打入另册的思想家、作家如别尔嘉耶夫、洛扎洛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等被重新“发掘”出来，就像高尔基这样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作家，也展示出与此前官方极为相左的思想和文学面貌，从而激活了人们对20世纪俄罗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复杂性的认识。这样的“考古”是花费了几十年沉重代价的一个迟到的救亡和欢迎流放者归来的仪式，是人类良知与理性向前发展并赢得局部胜利的景观。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和文学课程里，由于官方的过分吹捧，高尔基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单一而板滞，所以当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都觉得高尔基“阻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时，仿佛获得了研究者和读者较为一致的认可。但随着新的文献不断发现和披露，我们才知道高尔基不仅仅是欢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海燕”，还是一个具有超越党派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勇敢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

其行动与思想的复杂性几与彼时的现实状况共始终。1918年4—6月，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大量刊发时文政论，其后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尘封近70年后才重见天日。其核心议题是揭露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有的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破坏法制与秩序、滥用暴力、摧残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罪恶勾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极为复杂，不过，在高尔基看来，“政治是能培植毒辣的敌意、邪恶的怀疑、无耻的谎言、诽谤、病态的虚荣和对个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坏东西都可往上加）的杂草迅速、大量疯长的温床，人身上的一切坏东西正是在政治斗争的土壤上特别明显和大量地疯长的。”（《不合时宜的思想》P47）因而苏联的十月革命也不可避免地有这种弱点，“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这种做法无论对政权自身，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有害的。”（P119）所以高尔基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他（指列宁——引者注）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实验”。（P209）可以想见，高尔基这种本来可以理解的激烈言辞受到了诸如《真理报》等其它媒体的猛烈抨击。

其实，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高尔基和彼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能够维持由多党竞争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促成国家向民主自由的社会迈进，但时局的演进和政治本身的残酷却打碎了像高尔基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梦想。他对苏维埃一党专政政权的戒惧，不只是来源于他对彼时实际情况的考察，更来源于他对俄罗斯历史

的了解，“莫斯科国家是按亚洲的专制模式组成的，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影响，这些影响不能不把亚洲心理的基本因素移植给我们。”（《两种灵魂》）退而求其次，他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但他却不能容忍苏维埃里的一些人把知识分子不当人看的一些做法，他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营救，贯穿了他此后的个人生活。有时甚至为了达到自己营救和改善他们处境的目的，不惜与政府达成美化生活的私下协议，但最终被政府愚弄了，而且受到各方的指责，被人误会。（见蓝英年《高尔基的回国》，《随笔》1998年第1期）事实上，高尔基的悲剧，正来源于他用书生的人道主义来对付现实的政治生活，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已经明显地感到了高尔基与现政权的尴尬，“老熊被封住了嘴”。（《莫斯科日记》）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政权欺骗和利用的尴尬了。早在1921年，他领导的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为俄国解除了国际上的封锁，赢得了国际上的支持，“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却被诬为反政府，结果，委员会被解散，一些成员被逮捕。高尔基曾含着眼泪对加米涅夫说：‘你们把我变成了奸细。’”（《高尔基集》P38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当然，你可以说，他的悲剧在于他想利用政府而被政府利用。但他利用政府甚至同列宁的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不受迫害，他为自己的人道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思想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更为可悲的是，他因此最终还要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误解。

当然，他从早期的批评政府到晚年的拥抱斯大林体制，除了如

上原因外，的确可以看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哲学从文化精英主义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国家和政治崇拜”。(程映虹《“不合时宜”的高尔基》，《读书》1997年第11期) 其实他这类观点，从他早年的作品如《报仇》、《三人》、《醒悟》里均已现出端倪，其思想的影子来自尼采。甚至我们可以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书名看出他对尼采《不合时宜的思考》的套用。或许可以这样说，高尔基的思想有时并不是“不合时宜”，从底线上看，而是悲剧性地暗合时代的病症；如果从高处看，那么他的思想只是不合阶段性的政体利用，然而却符合人类最为善良 (虽然有时并不很理性) 的愿望，这样看来，他永“不合时宜”的命运便是铁定的了。

对我们来讲，思想与良知上的“考古”不能说没有开始，但毋庸置疑的是，远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发掘深度。当然，我们的确有不得已的尴尬，一方面是“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朱学勤语)，因此够得上我们去“考古”的思想与良知的确极少；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囿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不敢大胆而公正地研讨那些至今仍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就是像沈卫威的《守望自由——胡适派文人引论》、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二书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样观点较为隐讳的研究20至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述都不算多。至于像谢泳从事的储安平这样具体而微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良知与思想的考古之路还很漫长。

1998年3月5 — 6日凌晨于成都

百年风雨重追索

走过百年光荣与梦想的荆棘之路，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反观来时之路竟有不辨路标的梦中依稀之感。而历史的真相有时确如三尺小童捉迷藏，是隐中有显，显中亦有隐，互相交汇，一时大有进入迷宫之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非有细达毫芒的鉴别力与过人的勇气胆识，难中历史之鹄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先生的新著《晚清佚闻丛考》，便对晚清历史中的一些谜团做了有力的澄清和辨识。

已成为吾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的戊戌维新运动，即是这样隐显交织的一团历史迷雾。袁世凯出卖维新志士和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自然成了历史主流话语所界定的“反面人物”。但他并非从娘胎里生出来就是坏蛋，应是不言自明的。新近于美国翁万戈先生处发现的，他呈给帝师翁同龢的两封说帖，就极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袁世凯的说帖显然没能像康有为的变法策论一样，引起翁同龢的关注，以致上达天听。其原因在于康的策论激烈而煽情，对老臣勋旧一律排斥而“打倒”，而袁则主张适当联合，以取得对改革的广泛支持；康主张从中央政府变革开始，进而天下影从，一蹴而就，而袁主张选择两三个忠诚的督抚从地方进行改革实验，然后逐渐推广。但彼时作为帝师的翁同龢由于深感国之将亡，亦欲痛下猛

药，故尔袁氏的改革说帖自然遭到冷落。倘若历史可以重新设定的话，那么我们推想袁氏的变法说帖更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慈禧的认可，因为就一般变法而言，她也是不反对的。那么历史或许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我们不说袁世凯比康有为高明多少，也没有为袁世凯翻案的必要，这样做只是便于对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作一相对理性的修正而已。说帖的发现及他后来的丑行，诚如孔祥吉所说，“晚清以降，中国的不少官僚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袁世凯的特征，他们了解真理，知道什么对国家、对民族之进步有裨益，但是当国家民族利益，与一己之私利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们大多会牺牲整体利益，而保全自己，这种现象难道还是少见的吗？”（《被忽略了的维新蓝图》）纵观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均以失败告终，固然与袁世凯这样品行低劣的人出卖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不保障改革者实行改革，因为专制制度是不可能让你从中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民主自由的国家，具体实行改革的人，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戊戌维新诸人那样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成为派系斗争的替罪羊。腐朽的制度不只是不保障改革者的生命安全，像李鸿章那样接受俄国的贿赂而卖国的行为却屡屡发生，（《俄使行贿揭秘》）像慈禧、皇帝及其妃子们各自靠卖官得钱的事也不在少数。（《珍妃卖缺纪实》）更为可鄙的是，腐败的制度必须依靠让人与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种以民众人格的堕落来弥补制度缺陷的做法，实在是使全民族整

体素质恶化的短视行为。(《沈荩血案内幕》、《从唐才中“慷慨就义”说起》)只要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便无法无天，无所不用其极，的确是恶劣的制度影响民众素质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孔氏的研究近代史的专实，既可以写出像《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等这样学术性极强的专著，也可以用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笔记体，撰写出像《晚清佚闻丛考》这样意趣纵横的书。不特如此，该书还附载了许多人们鲜见的历史文献图录，且文笔畅达谨严，间有说部的善置悬念，却又颇通人情款曲，道理自出。晚清中西杂处，新旧并存，各种奇闻异说，层出不穷。既及街谈琐议，又涉宫闱秘闻，大至典章制度，小到笑语谈助，无不考索得来，与一般道听途说的耳食之徒，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史学原本是可以做得这样好看的。

1998年8月17日于成都

深邃迷人的个人意见

在中国的读书人心中，我们不必做这样的夸大，说《纽约时报书评》是众所周知的，但说它让个性十足的蠹鱼弟子们心仪已久，至少是不过分的。以前我们对书籍消费的选择是如此有限，那么《纽约时报书评》作为我们封闭屋子里一扇不大实用的假设窗口，离我们分外遥远，是不言自明的。好在今天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这一切正在得到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只是一种微妙的潜入，作为“《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的《西风吹书读哪页》，正是这种潜入的适当信号。

不用说，书评是书籍出版业繁荣的必然伴生物。因为书籍为数甚众，五色迷目，使得读者在浩瀚的书籍信息里举步踌躇，甚至有丧失辨别力的危险，所以需要那些眼光锐利、见多识广的学者、作家及书评家的引导，贡献出自己别具只眼的个人意见，才有可能使读者的疑难涣然冰释。评者的文风自然是或戏谑严谨，或冷峻热烈，悉听尊便。“我们等了12年才见到亨利·亚当斯的自传。”这是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进行评述的起始之句，包含着一种漫长期待后得以遂愿的欣悦，以及毫不掩饰的崇敬，是那些期期艾艾、永远不给出自己观点的累赘文章的敌人。有关《精神分析引论》的书评以引述一个古老的童话开始，直截了当地说弗洛伊德

“发现了开启人类生活中的不解之谜的钥匙。从那以后，他一直使用这把钥匙，或把它向左旋转，或向右旋转，出人意料地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大门”。深刻的识见与精妙之比喻相得益彰，使得书评现出它应有的蓬勃飞动的面貌。

自然，一篇好的书评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它还应该是评者才气与见识、情趣与个性的显现，直白地说，需要评者有越出常人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因为大多数书籍在被评时还没有显现出经过时间汰洗后自然而然的经典性，尽管该书蕴含着某种经典的信息，但非具手眼独到的功夫和披沙拣金的能力莫为，因而我们有必要向《西风吹书读哪页》的大多数书评卓越的判断力和预见性致敬。单是从以下书评的标题，我们便不难发现其惊人的准确及评者趣味的沉毅雅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美妙的疯狂”，纳博科夫的《洛莉塔》是“优雅的迷恋”，丘吉尔的《积累中的风暴》是“对他气概的终极考验”，卡森的《沉默的春天》是“我们周围的毒”，等等。从细部来看，评者称普鲁斯特的句子，“如果我们想找个比喻来形容普鲁斯特这些互相缠绕、细枝末节而又使人受罪的句子，那么一扇转门是再恰当不过了，这扇转门甚至时常将普鲁斯特也绕进去了。”这是我读普鲁斯特小说所体会到而没能说出的真切感受。“她为自己第二本书定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目标”，这是对米切尔所著的《飘》的评价，这个结论既是现时的也是历史的，已成千古不刊之至论。“许多小说通过恶心可怕的形象令人毛骨悚然，而《审判》却像少数小说那样，通过真正的危险或悬念而令人恐惧。”我

认为对于卡夫卡的小说，再也没有比这简明扼要的洞见更醍醐灌顶的了。

对于这本书的整体评价，我们也忍不住要做一个“但是先生”，即这种“精选”的潜在宿命，因为选择既代表一种眼光，也暗示着一种局限。“精选”里的大部分文章均是评价文学作品的，而影响20世纪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等方面著述的评介却只有寥寥数篇，这种选择性的“遗忘”使我们对这个“精选”保留一分审慎的怀疑态度。但对于中国书评界来说，目下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我们暂时忘却李健吾、萧乾诸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对书评建设所做出的辉煌成就，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文化建设上的缺陷实在太多，需要重新修补的地方不少，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踏上这或荒芜或荆棘丛生的艰难之路。既然学习并不是件掉份的事，那么，让我们从借鉴《纽约时报书评》的精妙之处开始。

1998年5月14—16日于成都

学会忏悔

韦君宜先生以前也是知道的，但恕我直言，我对她的作品没有兴趣。因为我喜欢阅读的作品，要么是作品有趣而幽默，或者是彻底的游戏作品，能带来阅读和审美上的纯粹愉悦；要么作品干脆是对现存秩序和历史问题有强烈的反省与批判，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觉得做一个没有心肝的看客有点别扭。她《露莎的路》和《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前的作品，都不可能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似乎不能全怪我的孤陋。

《露莎的路》和《思痛录》相对大部头著作都只能算是小册子，但分量实在不轻。前者是有关解放区捕风捉影的“抢救运动”的小说，“抢救运动”弄得许多真心的革命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大批的人深受诬陷与残酷迫害。而后者则是描写解放后历次整人运动的回忆录，二者之间只是体裁不同而已，震撼人心、使人深思的效果则是相同的。我觉得韦君宜先生通过她晚年这两部作品，完成了自我的再生，即由“古人”转变为“现代人”、由“野蛮人”转变成“文明人”。他们这一代人真的很像“古人”，均是从狂热崇拜、无条件的服从开始。因为大体说来，只有“古人”（尤其是中国古人）才对什么都相信，不具备哪怕些微的怀疑精神。在《思痛录》里，韦先生谈到自己的丈夫杨述，他一直认为反右与“文革”是

因为一小撮坏人蒙蔽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不少人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他却一直等了很久才沉冤昭雪，终于因此而稍有了点怀疑精神。用韦先生的话说，“逼啊，真是逼得石头也要说话了。”(P131) 真是应了一句流行歌词，“爱你爱到我心痛”。

如果说，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过来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有了哪怕一点怀疑精神，因而完成了由古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的话，那么我敢肯定地说，直到如今为止，还有许多人却并没有完成一个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过渡。只有像韦先生这样写过《思痛录》并进行深入忏悔的人，才有资格被称做“文明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韦先生不只是向自己曾经整过的人当面道歉，她还认为，对反右和“文革”中许多事，“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P142) 环顾当今，如此浃肌彻骨反省与忏悔的能有几人？大多数人只会将自己当作受害者来记述。“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P114) 固然他们未必是“自愿变做无知的”，但他们确实不曾像韦先生那样进行痛彻的反

省与忏悔，却是不争的事实。

真是无独有偶，对在过去政治运动中所做之事做过忏悔的人，几乎都是耄耋老人，比如巴金之主张讲真话和成立“文革博物馆”，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痛彻忏悔以及对彼时政治运动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样的局面，对当今知识界那些经历过历次政治迫害，以及迫害过他人的人不啻于是一种讽刺，难道人硬要到真正的老年之境后才无所牵挂、无所畏惧而道出一点真情吗？当然，想一想季先生1992年写好的《牛棚杂忆》6年后才问世，韦先生的《思痛录》几经周折才得以出版，我们就会感到一个人要说真话，在我们国家仍是难乎其难的事。别的人也许少有发表言论的机会，而著书立说对知识分子来讲应是分内之事，对这一段历史的反省和忏悔付诸阙如，似乎可视为一种犯罪，而我们民族可能要为这样的健忘症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应该先学会忏悔，放下包袱，由此对我们经历的多次人祸进行更深入的批判，从而无所羁绊地发出由衷之论，好让我们国家不再发生类似的惨剧。

1998年8月3日于成都

异端开辟野道

我不得不承认，老威作为诗人廖亦武的影子替身、绰号笔名，是个名符其实的冒险家，这就决定了他写作的特别，偏激、怀疑、批判、露骨兼及混合着多种复杂滋味的感伤，因而与这个时代一般意义上较为固定的写作基调——拖沓、平庸、舒缓、讲究隐忍体面的写作方式，不大相同。一方面固然源自他本人起于青萍之末、长于寒素之家、混迹于草莽之间的生活经历，这种来自弱势群体的底层生活注定了他与民间是血肉相连的，而不是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为了装出平等的样子，利用民间来作为点缀自己思想谱系的装饰品，进而对民间厚土的滋养，采取杀鸡取卵式的巧取豪夺。另一方面，以老威对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熟稔，他深知强权者对历史的任意阐释和摆布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可以使历史变成任由人打扮的小姑娘，而这样公然地掩盖真相，是老威所不能接受的。对此，唯一的解药便是不少人所信奉的自欺，但老威似乎不服这包药。

于是他利用生活之便，与酒鬼、流浪儿、乞丐、瞎子、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号丧者、混混、三陪小姐、梦游者、老右派、老军人、老知青、老地主、算命先生、民间艺人、同性恋者、碎尸犯、神医及其信徒等人打成一片，混迹在一起，并借机采访他们，从而撰写成《漂泊——边缘人访谈录》一书。老威用自己嬉笑怒骂的提问，来

使被采访者按其想法"就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他所留下的底层真实，是他按自己的想法所能采集到的底层真实，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它既不同于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里的雇佣枪手、民歌手、漂泊的军人子女和印第安人，也不同于卡内蒂《耳证人》中所创造的延缓术家、纸醉鬼、迷魂演说家、告密员。当然如果我们对老威和廖亦武联袂所搞的文学活动知道得更多一些，我们就会知道老威所采访的底层人固然有其阶层的生活特性，但此中又何尝没有廖亦武诗歌活动的外在折射呢！正如他所写的《活下去》三部曲之一《黑道》里，借其中的诗人恶棍之口评述诗人阿拉法威（亦即老威）："'北岛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杂种阿拉法威的时代，'恶棍不怀好意道，'他是白痴、天才、圣者、巫师、走街窜巷的卖艺者及大骗子联合操出来的。'"与此同时，该书又提及"廖胡子也在一篇文章的卷后语里宣称：'自古以来，诗歌就是臆想狂、醉酒汉、自恋病人和走街串巷卖艺者的神圣事业，我们只能扑倒在自己这个传统里。'"不特如此，《漂泊》里的许多采访细节，与《黑道》有不少的暗中勾结。阿拉法威的四舅告诉他，"我残生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你大舅，人也好，坟也好，不负早年生离死别之约。"《老军人廖恩泽》里就有这一细节的翻版。《漂泊》与《黑道》的精神勾结是显然的，不同的只是形式之别，前者是新闻采访，后者是纪实小说。

《黑道》的副标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下文学野史"，纪录了众多离经叛道的先锋诗人的左冲右突。或许由于精神上的内

在勾连，廖亦武以朦胧诗之后的诗人身份主编了《沉沦的圣殿》，作为纪念以《今天》杂志为主的地下诗歌前驱们的丰富文献，其副标题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这种承接不只是形式意义上的，而且是骨子里的指引和精神召唤。1949年后到80年代以前，中国的小说之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好作品，与人们的世俗生活被强加于其上的泛政治化所剥夺有关。这样深刻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阿城在《闲话闲说》里的阐述。我们可以顺着发挥一下，这就像阳光未经臭氧层的阻隔过滤，直接照射大地，不仅不适合万物的生长，而且会烤焦一切。如果民众有着正常而健康的世俗生活，民间生活自然就勃郁旺盛、五彩缤纷，那么底层就不会只是苦难的渊薮，可惜这一切离我们还那么遥远。设若每个人都有自我活动的私人空间，以及自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并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拒绝强权所主宰的公共表达对私人空间的侵蚀，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老威选择民间作为自己写作的支点，不仅是与主流话语对抗，而且是通过个人的表达，给这个还不能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社会以更多的个人表达空间，汰弃人们所遵循的大概率价值观，使真正的自由表达成为人们的权利和生活习惯。

老威的写作离经叛道，锐利前卫的诗歌、切入生活内核的采访，是对现实生活重压和精神生活荒芜的真切应对，切中我们周围的毒素。大有刀锋过处，脓血出焉的功效。但是老威是复杂的，他反强权的武器，不经意间用的正是他所反对的东西，比如武断。这

种行文格式在其写作中似乎形成了某种习惯（当然用此进行调侃不在其列，而且《漂泊》比《黑道》更宽容且不失写作个性）。这是一种近于宿命的二律背反，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都难免不蹈入此种万劫不复的厄运之中，不少人打着革命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这就是灾难的中国及苦命的中国人生活之写照。对此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1999年9月16—18日于成都

大道如青天

我自行做了个实验，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单位、环境和心情下阅读两种著作——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和萨义德的学术著作《东方学》，结果证明阅读《东方学》的速度是《在路上》的1.5倍。这除了表明我的思维对线性叙述和逻辑实证更服从外，还得出了一个似乎并不完全是多余的结论，即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在路上》对我自己来说，是一部难读的作品，它跳跃、混乱、致幻，凯鲁亚克的自动写作和吸食大麻促使他顺着这条颠三倒四的道路，原地踏步或者奋勇前行。面对不少《在路上》的赞美之辞，我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对小说的阅读贫穷到了可怕的地步，这不禁使我暗自伤心。想一想自己10年前也曾有过与此类似的癫狂的写作状态，因此对垮掉一代的写作态度及其作品的生产并不陌生，尽管文楚安先生的译文十分出色，但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竟是如此生涩，使我大感意外。

《在路上》是近乎纪实的流浪汉小说，其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垮掉一代”的精英——卡罗·马克斯（金斯堡）、老布尔·李（威廉·巴勒斯）、狄安·莫里亚蒂（尼尔·卡萨迪）、萨尔·帕拉迪斯（即凯鲁亚克本人），如此按图索骥，或许会惹得凯鲁亚克大感遭人“误读”的苦恼。他们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几次开着破车横越

美国大陆，甚至到了墨西哥，在路上发生些荒唐古怪的事——讲粗话骂人、醉酒、不停地换女人、疯狂听爵士乐、频繁遇见流浪汉、偷盗、打架等，似乎为了获得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自由，人就得有点堕落。倘若按照一般正常标准来看，是问题青年或者神经病。而他们如此疯狂活着的外在背景又很不妙，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说得对，不少美国人"对自己能够做到保守、富裕、随俗从流，坚定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怪人、赤党、异端、名士派、激进派、神经病、布尔什维克、疯子、左派、同路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毫不感兴趣"。"在路上，我们固然可以将其提升到哲学上的寻根究底，但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与众不同的行动之必须，而外部也为他们准备了'在路上'或者逃离过分实在而规矩生活的条件。那个时期被热核战争的恐怖阴影笼罩着，却又弥漫着一种万事如常、人人安分的气氛。其立法方面的丰碑是州际公路系统，它帮助愈来愈漂泊不定的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城市迁徙到郊区，从南方迁徙到城市黑人区，从中西部迁徙到加利福尼亚。"（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开着车横越美国或者到处流浪成了可能。但是"在路上"的实际情形在小说里，只是人物演进，达致水到渠成效果的巧妙策略。而小说中的人物只是在那里存在，让我找不出通常所要寻找的某种道理，使人无所依傍。或许这正是我们面对这部小说时的不习惯，更是一种与固有的阅读经验产生间离效果的内在慌乱。但愿如此，天知道是不是如此。

垮掉一代所具有的热情，从今天来看，也并非完全仅仅源自人

身上的一种激情，而是多种社会观念、欲望、理想、风向标的大杂烩。这就表明，如今的人们对垮掉一代尚存的热爱，一方面源自垮掉一代作品的魅力，其实又何尝不是将混合着各种感情的20世纪50年代的模糊影像继承下来了，以便为己所用呢？正可映照出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命题的普遍正确性。当代中国诗歌中的莽汉、撒娇、他们等派别以及廖亦武记述80年代地下诗歌野史的《黑道》，正是美国"垮掉一代"精神气质的中国版。《在路上》一书中的细节，像越过河床的约束而四处泛滥喧腾的河水，疯狂粗犷。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疯狂才能拯救他们自己"。而且这种疯狂有着相应的语速，粗话连篇，简短而跳跃，既像电视画面的频繁切换，又像鲍布·迪伦演唱的摇滚乐《像一块滚石》，理查德·戈尔茨坦的简评是"它使你想动"，那么"在路上"的快速"翻页"，则既能表现流浪意味，亦有闪烁不定。"垮掉一代"引用法国作家塞利纳所说，"犯罪如果有九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无聊透顶。"其实这是他们别开生路地了解美国的方式，"美国就像是一个牡蛎，要我们去打开，珍珠就在里面"，寻欢作乐、消磨时光成了他们的人生经典，因为"达到至福极乐的人生最高境界"本身就是英文BEAT（亦有"垮掉"之意）的含义之一。垮掉一代对现存的秩序感到失望，于是萌生了将美国弄疲的愿望，其实到头来，倒是美国把他们弄疲了。

对垮掉一代的怀念和不屑，造就以下两种不同的认识景观，它会被长久地树立在我们生活的路口，甚至被人们举着，作为向人们

炫示自己态度的标语牌。前者说：垮掉一代永垂不朽。后者说：两份煎垮掉一代肉排马上就好，让我们火速吃掉它。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垮掉一代都有一个暗道相通：那就是一种天然的自我解构倾向。垮掉一代在对现实的解构上，奠定了自己作为美国文化历史的新传统。这就是任何一种反叛固有文化姿态的举措，最终必然受控于历史布下的天罗地网，既而受逻辑的招安而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因为艺术与文化不可能就此止步，它不会那么简单地成全我们。换言之，假使如此的话，那么在我们之后生活的人是多么无趣。也就意味着，离经叛道对我们人类始终有着不朽的魅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震撼于霍桑的《威克菲尔德》的“在路上”——该短篇小说写一个离家出走到另一个街区的男人，离家不过几百米，每天都在暗中观察家人的生活，20年后在家人的惊恐中返家的故事——同时也倾心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真正原因。

读书小札三则

一

梁启超在写给其子梁思成的家书中不无动情地说，尔等将来读书做学问要像我一样烂漫向上，但不要像我一样泛滥无归。这个教导果然奏效，梁家虽然人才辈出，但大多是学术之洞打得越来越深的专门家，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饮冰（饮冰此号语出庄子）室主人这样的通才。我之读他文章，每感漏洞不少，但得来的感受，如同他读清代诗人龚自珍一样若受电然，颇有肤切体受之感。承蒙王怡兄抬举我，说我杂得无边，我本不是谦虚之人，但与梁任公相较实有小巫见大巫之慨。在我心目中庞杂如梁任公者，一时无两，天下无双。其行文汪洋恣肆，浩荡不可方物，启智开愚。从学术的专门深度上，他既不比王国维之冷僻，也不比其后出之陈寅恪精审，但他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毋庸置疑，正如夏晓虹先生所言，梁氏文章，泰半在觉世与传世之间。

家中锐意搜求，得梁氏书籍数十种，坊间易得者，多已备置。最为可心的是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40册《饮冰室合集》，编辑精审，错讹甚少，批比论列，亦较得体。每于花园中品茗把玩，不胜快意。

二

现在的秘书成为贪官捷径，过去的秘书可视为奴才培训学校，所以我对秘书均无好感。你可以说我偏颇狭隘无知，无知者无畏，我都将一以贯之坚持我的观点。我喜欢自我判别，不喜从众，如果你据此抨击，那我们川人的谐谑语就用得着了：但求疼，碗大个包。换言之，在下不尿你那壶。不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或许让我有点小小的意外。

田家英给毛泽东当秘书18年，有过何种功绩，犯过何种错误，此乃史家之要务。不贤识其小，择其余业来申说。最近他的女婿陈烈著了一本《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三联书店版），书中所录田家英搜罗有清一代学人士子、达官显贵之书法、印章等如此宏富，囊括殆尽，当今罕有其匹，于研治清代学术史艺术史文学史者大有裨益，成为清代学问及艺术研究的精神地图。惜乎没有买到600多块钱两本的《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令我寝食难安。

田家英早年看了史学家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我只读过萧一山的《曾国藩传》，虽有不能苟同之处，但佩服不减——发愿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写一部辩证唯物主义的清代史，幸好没写出来，写出来也只不过是一堆“正确”的废话而已。因为做学问者最忌讳主义的框框，意识形态先行，而不据实行事，仔细考量，谨慎得来。过去史界之以论代史，其祸远矣。倒是他善用萧一山另一本工具书

《清代学者著述表》，堪为初入门径者之指南，被人则效。

三

互联网如龙卷风，已成席卷之势，无论通衢都市，僻野乡村，都受程度不等的影响，是不争之事实。我与网络的拥抱比较迟，因为我看她衣服穿得太多，就像我无法与一个美女和衣而睡，这不是我的错。柳下惠的功夫确实好，他可能是第一次得辟邪剑谱真传的人，难怪孔老人家要旌表他。

我这人一旦迷恋某个东西，其狂热则无法形容。我的朋友马小兵形容我的食量大、身体好时曾说，喝酒八两不醉，写作通宵不睡，打麻将一夜不累，玩游戏如痴如醉，成天上网到处乱吠。这不，我玩过很多游戏，玩《新仙剑奇侠传》的时候，我女儿喜欢上了李逍遥，就硬要我教她打。虽然她才5岁，但我也不能随意拒绝她的学习热情，于是我就教了她几招，她当然就迷恋。如今的传媒、家长和社会都觉得电脑游戏是电子海洛因，我认为这是个弱智的说法。很多家长自己不知网络为何物，就对小孩上网采取堵的方式，大禹的老子鲧犯的错误他们重复千遍也不厌倦。

我不想像鲧那么愚蠢，小女今已上学，我准备给她添置一台电脑。于是我就从《黑客X档案》（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杂志，一直读到王晨昀的《站长兵法》（上海远东出版社），再读到赵水忠的《数字化侵害——中国青少年网络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知道可以安装美萍反黄专家、护花使者之类来解决孩子上网遭受黄色暴力之类侵害的问题。同时我准备与她签约，每天只准上半个小时的网，我这人不太相信道德说教的力量，而我和她妈妈又不能随时都在她身边。于是准备请高手设置一道障碍，半个小时候无论怎么也无法再上网，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解决“总统也是靠不住”的难题。我朋友说，如果她解开的话，你应该高兴啊，因为她的计算机应用已然进步了，然后我们又继续设置新的障碍嘛。

一个视电脑游戏为电子海洛因的社会，是一个有病的社会。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2002年10月15日于成都

我们都是感伤的动物

我交友喜欢简化手续，不耐繁缛礼节，才华、地位、财富均不是我的首选，而是要看他对自己父母有爱心与否。这样说，并不是要你做残酷埋儿的郭巨、愚孝卧冰的王祥，更不是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去迎奉父母，而是从点滴和细节中深藏着对父母的关爱，这种内在的爱细小暖心到无以言说，就像空气一样，虽平日里并无特别的强调，但对于生命来讲，它何曾须臾离开。换言之，一个对父母并无真正关爱的人，他还给我说他爱祖国，善待朋友，这相当于贪官给我作廉政报告，独裁者给我讲三个代表，纯属对我智商的侮辱。扩而大之，一个人在这个铁石般的社会里，尚存那种骨子里令人感动的暖意，心灵里始终有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扼杀的柔软，必定是个悲悯爱人的有趣之人，这是我多年以前第一次看季风兄关于歌谣和游戏等民俗画时的直觉，这种美好的感觉直到他今天结集出版两本漂亮的《百谣图》和《百戏图》。

四川人是天生的搞笑分子、游戏之徒。成人和儿童都喜欢把玩游戏叫搞耍法、玩把戏，仿佛不这样大大咧咧地、嘴里带着点轻谩之气来说，就怪别扭的。其实在我看来，如此才真是摸到了游戏的筋脉，更符合儿童散淡好玩的个性。而像教科书、印刷体一样来议论游戏虽可作研习民俗之一途，但游戏分子可不这么看，他们没

有这么多讲究。犹忆儿时，斗鸡、挤油渣（北方为挤老迷，成都为挤热和，苗、彝为挤油尖，与我们土家族只是读音稍有不同而已）、跳飞机盘（成都名跳房）、踢毽（成都名为打毽）、跷跷板、秋千、摙不落（成都叫摙牛牛儿）、捡子儿（一种颇带算术意味的游戏）、打子炮、摙豆腐干、摙烟盒、弹枪（成都名弹弓）、滚铁环、打游击、挑茶盘（读若peng，成都名为翻胶线）、放烟灯（过年时用皮纸糊制，入口处系十字细钢丝或铜丝以架松油亮膏点燃，用明火作为动力使其上天）、捅黄鳝（鳝鱼）、摸刺黄狗（黄辣丁）、扳螃蟹（读若hai）、办锅馒（成都名过家家）、藏猫等游戏，伴以季节性地上山打野物、摘野果，即便贫寒如我的童年，自春徂秋，草木荣枯，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摔摆，像暴发户把突然得来的巨资拿作豪赌，三下五除二就挥霍掉了，也就不可救药地长大了。如今在初冬的暖阳里，坐在花园的秋千架上，与女儿共说《百戏图》里丰富有趣但正在消失的游戏，读着简练实用的配图文字，看她一派稚子情状，倍添爱女情深，仿佛梦回童年，回想儿戏，更叹白驹过隙，岁月无敌。

十多年前，当我热血喷涌，青春仿佛得了狂犬病的时候，在狂嚣的白昼一闪而过，空对孤檠的夜晚，不经意的瞬间，故乡好似难言的隐痛，切肤而过，却没有任何劈面而来的伤痕。逐渐清晰的是童年那些难忘的歌谣，与伙伴们玩乐游戏的场景，哼起母亲教的儿歌和扯谎歌，前尘旧事，联袂浮上心来，绕之不去。那躲在渝东南边陲、襟连着魅力湘西、攀援着神奇鄂西、对望着粗犷的黔东北大地的小小故乡，鲜活得如同可以捉得住的人物，那样实在而温暖，

似乎就此可以面对一切沧桑。故乡就像童年的摇篮，盖着有母亲体温的衣被，而这些催人魂魄的谣曲和游戏，不管岁月多么久远，故乡离你多么迢遥，猛然忆起，未曾离开你血液和灵魂半步，而这一切的获得竟要仰赖农业文明温情的余晖。无论是《百谣图》里搞笑的“龙门阵”、“屁”、“悄悄话”，还是“三十晚上月亮”之类的颠倒歌（吾乡名之为扯谎歌），以及颇具讽刺意味的“跟到人家学”，都活脱脱地勾勒生活的可爱，我们普通老百姓苦中作乐的绝大本领和无限趣味。

而现在城市里的人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一座大得连街道名字都难以知晓的城市，一座能吞吐无数人群但老死不相往来、能吞吐成千上万吨垃圾却无处倾诉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谁的故乡，只有天知道。四合院的消失，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教育中对传统的吸劣汰优，使得现在的父母亲越来越没有能力教如今的小孩学这些谣曲和游戏的本领，这也正是《百谣图》、《百戏图》里的歌谣、游戏正在瓦解消失的一大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商业战车的碾压，人情的浇薄，游戏的单调无味，使得女儿他们这一代在物质上得到许多好处的同时，精神上的丰富性并没有同步增长，无论是看动画片、打电脑游戏，还是上网聊天（网络交流的鲜活性相对较差，究竟只是隔了一层的“如面谈”而已，不如看着活的欢快），都是一种独自的欣赏而已，而缺少交流与合作。游戏最大众的方式，或者不妨说最高境界，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像孟子教导独裁者一样，独乐乐何如与民同乐？

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说，我爱四种旧事物：古书、老酒、故人，还有旧风俗。而我则认为人是故乡的风筝，怀旧的过客，感伤的动物，祖先的影子，先贤的跟班，族群情感的共享者。而《百戏图》、《百谣图》这两本漂亮而并不完美的民俗图画书，无疑是对我这些感受的最好注脚。

2003年10月16日病中于成都

书账九篇

一

平生购书甚勤，好比小偷一日不偷就手痒，大盗一日不抢便难过，贪官一日不贪就呵欠连天，嫖客一日不弄美女便无法活。我以嗜美女、好书、美酒为绝大爱好。这嗜好虽然看上去很美，但较量身体、耗费银子却是不争之事实。早年也有记日记的习惯，终于未能坚持，一以贯之，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展露无遗。如今斋中既坐镇黑夜吧论坛，日夜与各位兄弟姐妹网上过招，据网高谈，互相切磋，总要拿点硬货出来，以示献曝之诚。

左文襄（宗棠）公虽然杀人功夫更好，但也要说点与书生沾边的话，其中有副对联深得我心：古剑不磨留养气，异书多读当加餐。常规枪法自是不必说，要修习得来，独门绝技自然更不应废弃。所以在下读书庞杂而广博，或许不求甚解，或许断章取义，要么泛泛而观，要么细细比勘，皆随我私人所好，不奉他人旨意，不看别人眼色，不尿权威那一壶。

之所以我的购书账名为呆账，乃袭用坊间对读书人的蔑称，书呆子之意。至于说真呆还是假呆，或者是三十六计中的假痴不癫，当然不会随意给那些好为书生下蔑称者透露半分消息。所以我的

购书之账，与其说是书账，不如说是呆账更爽。复次，所谓呆账，无聊之处必有，就像被奉为神明的迅翁日记里也有关于濯足的记载一样，好像无用，实则有趣。呆账在那里，不必日日理会，他日一观，聊供莞尔，以博一粲。

今日到猛追湾邮局收岳父大人从鹏城寄给小女的礼物，在书亭顺带买了本刘达临主编的《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精华本，1995年上海三联书店版），9折，费银17.80元。反动居主人品德不够高尚，心中时有龌龊之念，总想对性技巧以及相关的形而上的东东都来番搜讨，明白人都知道，形而下的想法更多，所以在下性学书籍众多，邪门歪道，居然蔚然可观。

其后至七中对面的成都教育书店，奉老师之命为小女买数学《自主学习》一书。得久未觅得的《泡沫：“搞笑诺贝尔奖”面面观》（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至为快慰。瑞典各学科之诺贝尔委员会所评骘的人物，当然在我观赏范畴，而美国这位《不可思议年刊》主编马克·亚伯拉罕斯所主编的这本书，更使我急欲观看而后快。更有意外之喜的是，得黄秀文主编之《智者的阅读：中外名报名刊名家的推荐书目》（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是我目前所见关于书目的书中最成气候的一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为人师者不少，当然狗屁不通的人更不在少数。有的书目推荐如饮佳酿，有的书目展览如胡万林的硭硝，不能除疾，只能添病，他日有闲，定当学圣叹老师评第五才子书，破瓜砍菜，令诸君浮

一大白。我关注教育有年，几乎上瘾，曾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书，至今乐此不疲。顷见美国著名教育家博耶的演讲集《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教育科学出版社），掏钱风快，生怕他人夺爱，其时偌大书店空无一人，自我心幻，空树敌人而已。

2002年10月22日于成都

二

晨起，目送阿姨携小女上学。夜雨后的初阳，在微冷而潮润的空气中，和着清冽的微风，像个生客一样，仿佛有种冒昧，试探性地访进书房来，令人心通神爽，预示着一天的好心情于兹开始。书房外的紫薇已然败落，但杜鹃还开得煞有介事，巴壁虎和金银花的颜色依旧像个硬汉，不改往日面貌，虽然绿得有点发抖。女儿笼养的两只热带白文鸟，还在它们的小房里呆着，不肯轻易与已然降临的冬天在寒冷的清晨会面，这和它的主人懒床一样有值得同情的理由。电脑里放着最近一期《爱乐》杂志附送的CD《阿尔弗莱德·施尼特克作品录音全集》精选，给我的好心情添了个注脚。我并不真正懂得音乐，但你若要说我附庸风雅，我断乎不肯招供。因为音乐是我的空气，你不能因为我对空气没有研究，就说我对空气的需要是附庸风雅吧，我企望你没有那么残酷。此时再次检视昨日所得之书，不能不想到小店天合书屋。

到干槐树街的天合书屋小店，是我每天的必修课，因为这是我走路上下班的必经之途。虽然我上班也是独享一间办公室，且常将双脚搁于案桌，捧读书籍，甚是悠闲快活，但还是不如坐在小店里挑选各种书籍和众多杂志愉快。店主也算是个美女，初次进店，她居然知道我要什么货，什么成色哪种品位，使我如逢故人。不特如此，她还破例给我打折，让我吃了亏也得个捡便宜的心态，真是厉害。在行的生意经匹配美色，像我这种买家不束手就擒都不行。于是天天到那里报到，小待一会儿，成了我生活的常态。

多年前曾在九眼桥旧书摊和草堂寺旧书市场搜得过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中文版杂志《信使》，喜欢上面的访谈录之生动异样，介绍人物之有容乃大，文化内涵之多元丰富，内容之旁搜博杂，所以一直梦想搜齐它，但多年未能如愿。今入天合书屋，老板说今天又有你要的书哦。我抬眼一看，6本24开，印制精美，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信使〉精华丛书》赫然在目。它们分别是《世界电影一百年》、《天涯孤旅》（谈种族民俗的传播与旅游之关系）、《与世界名人一席谈》（随意指名道姓地说几个家伙吧，譬如美国史学家布尔斯廷、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意大利符号学家埃科、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法国探险家兼社会科学家马洛里、美国电影制片人斯通、印度物理学家希瓦、喀迈隆音乐家迪邦戈等等）、《媒介的变迁》（谈新闻媒体包括互联网演变的诸种方面）、《城市迷宫》（探讨市政建设及建筑设计）、《神灵，图腾与信仰》（谈宗教及相关民俗文化），共费银两133元（9折）。急急回到

家中，粗略一翻，精彩无处不在啊。只是此套丛书尚有六本还没出版，需要稍待时日，方成完璧。

今日有幸得此套丛书中之六本，至于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东方》杂志这样的“小虾米”就不去说它了罢。

2002年10月23日于成都

三

近几日状态奇佳，心情大好，身体更棒。成都冬天难得一见的太阳，阴谋在这两天把自己花光，你除了配合它的阴谋，别无选择。于是趁此大好时光，在家中整理故旧新籍，学二不挂五的郝隆晒腹，也把那些长年深居简出的线装书中的幸运分子，拿一小部分到花园中晒一晒，让蹲监狱的它们也放个风，免得它们说我没有书道，枉为读书人。

每次搬家，就像一个后现代的皇帝吃饱了没事干，喜欢牵（迁）着首都到处玩一样，弄得天怒人怨。十几个搬家公司的工人抱怨，运几大卡车，累一天居然没有搬完；家中的阿姨于一个月前就开始给书打包装箱，搬家那天又要到新房去打扫房间，抹掉书架的灰尘；凑巧，单位的人见我书多，又喜欢来看稀奇，参观指点，弄得疲于应付的太太，心里窝火，还得赔着笑脸；我呢，一天协调下来，已是鼻塌嘴歪，周身是汗，四裤全输，还要听小女在旁边说风

凉话：韦小宝（她喜欢喊我的众多网名），你看嘛，一天没得事你就买书来耍嘛，这下舒服了哇；就连80岁的老母亲，也得在旧房那里守着这堆破书，等工人一次次来搬。如此一来，一家人至少要休息三四天才能缓过劲来，原来都是这些破书惹的祸啊。

新房搬了一年，书房足够阔大，书架众多，顶天立地，它们训练有素，秩序井然，然书籍分类始终未能告罄。我却将书籍弄得遍地都是，到处私混，杂乱群居，至今不时受到拙荆的唠叨。她是城市中长大的人，事事讲究条理，而我是生于青萍之末，长于草莽之间，起于寒素之家的人，任意胡来，不听号召，成了我这个老顽固的常态。以至一个月前从西南书城弄回来的一套书，也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真是费了我军统很大的劲，才把它们抓出来，公诸同好。

这套丛书的书名与其说气派，不如说有点吓人——“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八大册，费银195元（9折），分别是《信仰民俗卷》、《史诗歌谣卷》、《神话卷》、《民俗理论卷》、《物质民俗卷》、《传说故事卷》、《社会民俗卷》、《学术史卷》，选编大体得当，偶有差池，不碍研读。封面素洁雅致，一派良家妇女模样，不做拉客状，识得她好处的人，自然要与她苟且，老学究会说得高明而极中庸，像我这种青皮疙瘩则只会用天生丽质难自弃，来一番俗气的赞美。虽然名气往往是妨碍一个人判断力的雾障，但作为一个书媒婆，要简略地让大家喜欢她，总得说说她是哪家的闺女才行啊。她的家长分别有严复、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江绍原、常惠、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郑振铎、

闻一多、于省吾、林惠祥、杨堃、钟敬文、常任侠、李安宅、季羡林等等，均是一时之选，不胜枚举。而编者苑利作为钟敬文先生的弟子，他的劳作，只说每卷都有各自这一卷在20世纪民俗学史上发展演变的论文索引，便利得很，当属功莫大焉。讨巧如我辈，真是欢忭若狂。

不才当初喜欢看点民俗的书，既不是受普罗普民间文学理论的伟大号召，也不是受了珍妮·约伦编的《世界著名民间故事》的正确指引，而是受周作人这样喜欢枯涩文字的大家也研究猥亵歌谣的蛊惑，一阵乱摸索，居然一发而不可收。顺带说一句，我学任何东西都是从形而下开始，喜欢学脏乱差的东西，性学自不必说，就是习英语，也是骂人的单词和对话特别会说，容易记住。学习与游戏是天然的双胞胎，于斯可见一斑。

那日5点，扛着余晖，乘着三轮车，与女儿挟书回家。她看着《蜘蛛侠》，我重温一下猥亵歌谣，哼着《蒙古人》。当下决定，把与老妻敦伦之事免了，节约点体力，今晚不干掉八两白酒，把书看个饱，绝不收场。

2002年10月25日于成都

九

7点钟甫一醒来，天空一派灰暗，压抑到如同刀锋直逼喉咙。

挎一大包，奔下楼去，打车直杀草堂寺文物旧书市场。近来杂事丛脞，已有几月没到旧书市场去无度搜刮，大开买戒，心中竟有些近乡情更怯的况味。不知这几月旧书市场如何沉浮迁衍，不是我善咒，那些贩书的朋友和执着的买家都还健在吧。

到得市场，往日繁荣气象不减，人头攒动，各式文物及书籍，真假相杂，高下同伴，应有尽有。旧书摊依旧有四五十家，有的已由行商而坐贾，在市场里租一铺面来扩大自己的买卖领地。看我到来，贩书者谓我稀客者不绝于耳，于是一边调笑一边四下搜索，手脑耳口鼻并用，身体各器官的使用频率空前高涨，欢快的搜书过程，使三小时一晃而过。

当今有些妄人，识得两个字，教过几年书，写过一二篇并无原创性质的文章，便以教育家自命，或者被某些善于搞事的意识形态巨匠册封为教育家。在我看来，所谓教育家一定得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且在教育实践或理论中做出利在当代、泽被后世的业绩来。浩犬神州，放眼望去，1949年后还有教育家么？只要他不是狂妄到无耻的人，当今应该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教育家吧。4年前我写《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书的时候，还是借了朋友的《陶行知全集》来看，今天一到市场便以60元的低价得全部之11巨册，真是快何如哉！

我之搜书并无一定之规，凡我所好者必拿来一观，因此很多主题开始并无措意，而是日积月累，自然而成规模。谱牒之学，是吾国文化传承之重要一脉，于今返观，爱好此道已近10年，书已得

三四百种之多。今以5元之价得《吴玉章年谱》，可观近现代四川各类情形及为近现代史做点佐证。同理，正是基于对近现代中国更多的了解和研究之目的，以18元之价得《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韬奋〈读者信箱〉》，1949年前的民盟中有不少可贵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照他们后来的厄运及表现，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得更为清楚；看20世纪初中国如此多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一是为彼时价值观及选择的相对多元庆幸，另一方面也可看专制制度为什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土壤。20世纪的中国如此多事，从任何一个窗口都只能得其一端，写过像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样出色的《猫城记》的老舍，借用《四世同堂》中的常四爷之口——“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这句话置换到当今，简直细达毫芒，直刺肺腑啊）——来讽刺国与民之关系，到后半叶居然不得不自杀。今得上下两大册《老舍研究资料》，盼对他有更深之理解；另得上海书店影印版之《周作人论》（陶明志编）、台湾文成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五四时代的小说作家和作品》（尹雪曼著）、民国万有文库的《中美外交史》（唐增庆著），均可以慢看细观，共费银17元。

知性实践而不懂性科学，藏性学书多而茫然不晓，今以3折之价150元得吴阶平主编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上、下），参与者均是此中高人，而性学研究明星潘绥铭、刘达临、阮芳赋等均名列其中，可以扫盲矣。李慎之先生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近年来表现尤佳，今以5元之价得品相稍差之《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何家

栋著，南方日报出版社），可免去到处上网搜寻他文章之苦。以10元之价得一册1933年由成都甫澄中学石印线装书《中国文学史大纲》，题署郑宾于著，未审何人，留待他日详考。其它书籍不一一详论，写下书目，聊作记账而已。工具书《英汉戏剧辞典》（杜定宇编）、《English说文解字》（袁立著）；哲学著作《科学加逻辑的发现》（波普尔著）、《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赫克著）；文学读物《丹东传》、《熙德之歌》、《老插图新看法》（胡洪侠著），杂著《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港如茶事》（陈文怀著）、经济学著作《平等与效率》（奥肯著），共费55元，可谓廉矣。

今日之书，共费320元，若以市价观之，怕倍于此价亦不能得，故旧书市场之不可偏废之重要，毋须多言。

五

深秋的成都，经不住雨水的一再撩拨，使得冬天像一个发怒的夺命高手，迅捷而孟浪地追杀过来，不按牌理出牌。独睡一室的小女夜晚还留存着夏天及初秋时节的惯性动作——掀被子，内人和我由来已久的不拘小节及粗疏型放养，终使女儿患上支气管炎，自出世以降第一次进医院输液。医生当然苦口婆心地号召我们住院治疗，一派急患者所急的高尚品质，弄得我开始感动。可是我古小说看多了，喜欢对事情来个且慢。虽自以为不是特别聪明，但也不是傻瓜中选出来的，就给医院的朋友挂了个电话，她认为在观察室

输几天液便可告捷，不必太过花钱耗时，大费周章。何况女儿向学之心日浓，不愿停课就医。我原以为她像我一样学习孔繁森先生上瘾了，把自己埋首书山的生活，当成漫长的阿里奋斗。好在她还不曾像老爸这般老滑俏皮，只觉得读书好玩，而她的老师们又喜欢用表扬之法，使得她吃糖上瘾。

在下供职的“作假邪会”，郁达夫先生几十年前就形容好了：“乾坤大度容废物，无边风月属闲人。”10天前天涯四川版一个网友论及我时，说我不过是个小虾米。喜欢上网较劲的雷子一见，为我不平，问我可曾看见。我说早已学习，于我的评骘，不准备接招。只是他说我们这个“作假邪会”人物辈出，实在是皮相得可以，滑稽之至，令我笑痛肚皮。这个单位，乾坤实在太大度，无边风月却不多。某虽不才，一直也算风月中的闲人，加之近几日小女身体欠佳，自然更有理由不到单位点卯领教。今日信步前往，也只是到天合书屋参观而已。

进得书屋，老板将单独搁置一旁的一叠书拿出来，让我研判。三下五除二，我就拈出几种让她算账。我一直认为好东西是用不着计较的，那些所谓的细细斟酌，实在只是对自己眼光不够信任的托辞。陈从周先生的《说园》，的确早有存货，业已学习，今得一个图文并茂的版子（陈健行摄），不买下无法对自己交待，何况我对这两年的山东画报社已比较信任。三联版的“乡土中国”，我是看了写自己家乡和民族的《武陵土家》后，才开始热爱上瘾的，如今看到《闽西客家》哪肯错过？自己久有游赏八闽大地的欲望，那就

先卧读神游吧。董桥一直是我喜欢的写家，凡属他的著作大多配置得有，这次三联推出他的自选集，顷见《从前》，不用多翻，赓即购下。此书和三联书店大多数封面设计一样典雅素洁，但这书的缺点，我忍不住要发挥几句。这种活动封套，辅以腰封，让我想起汉代时曾有人五条裤子一起穿——川人今日还以此戏谑为多余的蠢举。于是不愉快的记忆一哄而上，看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腰封丢失，读林达的《带一本书到巴黎》，活动封套早已踪影全无。我不知三联的美术设计者最近是否像吸毒一样上了瘾，以至于像今天买的一本《新唐人街》（“游走世界的中国人”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也着魔似的用腰封来摹仿这种繁缛的耗材之举。美而不实用，只可远观，不可近玩，这是对他人喜好的折磨。

对形而下亦即阿城所说的世俗烟火气的热爱，使我青春附身，于吃喝玩乐诸多小道有无尽的兴趣，故家中搜罗的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也颇成气候。前不久才读完刘枋的《吃的艺术》，今又得逯耀东的《肚大能容》，一看开篇写到北京豆汁，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不落俗套，勾起我前年到北京办事，余杰夫妇请我吃北京菜、喝豆汁的温暖回忆。余杰说今天很多北京人已不能喝这微苦带酸的豆汁，自然他们夫妇俩也无此口福，见我喝得很陶醉，连说你真是好口福。关于饮食，从古代食谱到现代江湖菜，从民间小吃到野菜图谱，寒斋备有上百种之多，何况如今成都电视台，欲做一档饮食文化栏目《饮食聊斋》，想请我吃了侃，侃了吃，这不正使我多年所购读的饮食书籍发挥余热吗？顺带说一句，在我收到的赠阅杂志中，

《财经》汪朗所写的关于饮食的随笔，庶几近于逯耀东《肚大能容》里面的文章，是必欲先睹而后快的。形而下是无边宽广的，自然不会闭锁一隅。去年7月李陀先生到成都，有幸一晤，谈到自己最近工作时，他说正主编一套“大众文化研究译丛”（中央编译版）、《大众文化批评丛书》（研究国内大众文化，江苏人民版）、《视界》杂志，后来陆续读到《理解大众文化》、《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的快感》、《美国牛仔》等，今得研究国内大众文化的《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意在观览他们的研究水准，从中寻绎出中国社会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

几年前，中央台美术星空的温普林做一期关于四川美术的节目采访我时，我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四川美术批评的缺席。虽然在我们的视野中，也有二三人写了美术批评专著，但既缺乏李小山、陈传席一般的猛锐之士，也没有如尹吉男的《独自叩门》这样科班出身，文笔仍很佻达的学者之作，今《独自叩门》出了修订版，自然不惜再费银子买来学习。自己也算识文断字的人，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还很难说，但见贤思齐之心总是未曾泯灭的，于是周宪、许钧主编的“知识分子译丛”是见一本购一本，今得最新一种《最后的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著），希望这不是“最后的知识分子”。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一经传入国内，即引起持续的阅读热潮，以至国内好发宏论、喜作大语的史学界，学风也得到了些许纠正。这不，《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及著）由三联书店最新推

出，让人不能抹去《万历十五年》的身影。但这本书能否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俗滥教条，还要看了再说，另一本定价68元、824页的大部头书《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被称为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的书我是第一次看到，随意翻了几页，读了序言，别有新意，活跃有趣，毫末不弃的细节及高远前瞻的宏论，倒是新我眼目，不过要将它读完，得浪费我多少吃喝玩乐的时间，想一想不禁心慌啊！

冷雨敲窗的夜晚，空对孤檠，细数今日所得，不禁生出些暖意来。因为又有一批生龙活虎、思想锐利的家伙，入住我家，与我长相切磋和较量。虽然费掉264元，也在所不计了。

2002年10月31日—11月1日于成都

六

昨晚高尔泰先生弟子李兄亚东与诗人廖兄亦武的妹夫，因生得巧合登对，竟在同一天，假座于莽汉派诗人二毛在倪家桥路开的川东老家宴客，我叨陪末座。座中多属老友，自是开怀豪饮，剧谈欢笑。可怜的白酒，经不住我们狂弄，一不小心就被我消灭了七八两。饭毕，按常理，不是打牌洗脚，就是继续到翟永明的白夜吧或者雷立刚的黑夜吧斗酒，弄到深夜，带着二分醉意、三分豪气、五分快感，得意地奔回家中。但这两天是非常时期，小女病症尚未痊

愈，不敢久留，人父之责催我，奈何？

回到家中，与女儿共同学习阿来兄送的《科幻世界》的少年版《飞》，温习蜘蛛的习性，不久她便欢快入睡。稍后上网巡查一番，赓即倒床睡下，一觉睡至6点即起。读书、上网并清洗鸟笼，7点半始至草堂寺搜旧书。草堂寺旧书市场呈半月形展开，我从前门进去，到后面最后一家出来，就可梳篦完那里我所看得起的旧书。第一个要注意的便是开得大约有10年之久的南牖书铺，此店最早开于仁厚街，毗邻红极一时的卡夫卡书店。店主是一年过六旬的老者，烟抽得很厉害，他的喉咙与旧时打铁催火之风箱无甚区别。今问其儿子，云其老父尚在仁厚街继续革命，不由感叹他老父身体之好，大出我的意料。他日有闲，我一定写一篇或者一本《书贾列传》，这里面有绝大故事，外人不知，就是个中人也未必完全知晓。我因久居江湖，性喜交游，给钱大方，文气与匪性并重，故得结交很多卖者和买家，可以仿太史公来给他们立个牌坊吧。

南牖书铺可说是草堂寺旧书市场中书卖得最贵的，但贵必有贵的理由。其所搜书的种类及品相是其它小书店所不及的，更遑论地摊贩书者。每次我在这里所花的钱，大抵占搜书总花费的三分之一以上，得书当然亦甚可记录。先秦典籍里我家中大多有集释或校释，独缺《吕氏春秋》，心下恨恨。今得陈奇猷先生校释的四卷本《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价8.05元），老板索价60，我以50元成交。寒斋备有陈奇猷先生的《韩非子集释》，知其为陈垣、余嘉锡、唐兰诸先生的高足，足可信任其功力。周氏二兄

弟在我的书房都享受单独存柜的资格，他们的著作固然甚夥，而研究他们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今以10元之价得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和《四川风物志》二书。前者固足助我将来有闲，用力来点与众不同的研究，后者则为乡邦文献的搜集又添一砖。写鲁迅的传记何其多也，私心还是以为王晓明的较好；研究周作人的亦不少，没有谁的专著让我心仪，但钟叔河先生笺释的《儿童杂事诗》最为出彩。朋友李书崇写过两本性学专著，文采斐然，均极有趣，平日里在一起谈得最多的也算男女之性，因此被我们一帮朋友戏称为下水道专家。受他的影响，加上我本身也爱性过度，所以见有点名堂的性学书必生占为己有的欲望，今以50元之价得《灵与性》（光明日报2002年版，原价66元）、《性典诠释》、《中国传统性治疗学》三书，充实反动居的性学专藏，快哉快哉。藏书票久欲大批罗致，但不得其门而入，希望《藏书票鉴赏》（沈弘著，辽宁画报版，以近半价20元得之）一书是我的“火星探路者”。闲闲书话中有网友谈到签名本的趣事，关于此等趣事，他日必以专文公诸同好。今以10元之价得日本作家城千枝赠四川老诗人戴安常的随笔集《热河离宫》，城千枝的字，可以超过很多常写汉字的人。我不通日文，粗看里面的内容有写承德、沈阳、杭州包括作家冰心的。书是方二四的异形开本，里面的插图全是有日本风味的剪纸，煞是有趣。他日可交高尔泰先生另一弟子查常平兄看一看，是否有可翻译之价值。

从南牖书铺出来，到一家新开的、专以搜字画古书及外文书的小店一看（店名暂忘），店主名吕新，原系一机械工程师，认识

我。他开玩笑说我谈足球是借足球反党，只差说社会主义不能搞足球。原来此君不仅是个球迷，而且是个篆刻高手，柜前摆满了他所刻的东西，的确不错。我选了一枚“心路如秋风”的印章，费50元。我看到《中国闲章艺术集锦》、《中国篆刻大辞典》在架上，正欲问价，他说此乃工具书，属非卖品，我只有怏怏不已。说到篆刻师承，他自称是无师承、无门派、无头衔的三无人员。我说我们是兄弟啊，我也是三无人员啊。他说不知我之所指。我说政客无良心，商人无德，文人无行，你说我是不是三无人员之一种嘛。他大笑不止，遂互留电话，乃订交。接下来，细翻其英语旧书，我于其中得英国作家韦尔斯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1925年麦克米兰公司版），品相不错，硬精装。我虽有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诸先生的翻译本《世界史纲》，但还是想看看韦尔斯的文采。王尔德的《一个平庸妇人的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Boni and Liveright，1919年仿皮版），扉页上的“华阳中学校藏图书印”的印章，老到朴茂，十分耐看。192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硬精装版《现代英语散文选》（Modern English Prose），选编精审，皆是英语世界的翘楚。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得到198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凤凰丛书之一种《亨利·詹姆斯的笔记》（The Notebooks of Henry James），品相极佳，以我对詹姆斯的了解，好像这本书国内尚无译本。共费50元。因为我每星期搜书后就要到流沙河先生家中，与一帮朋友谈诗论文，

我把这些书拿给流沙河先生看，他看到《亨利·詹姆斯的笔记》一书上的印章有“佩章”二字，便说莫非是英文专家钟佩章（我未听说过此人）的旧物？当时因其它话题茬着，不及细问，未审是耶不是？

各地摊的买卖也风起云涌，于是我只好告别吕庄主。在各地摊转悠，共得清代教忠堂版线装书《人类谱记》（下册，白棉纸，5元）、《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杨周翰编选，2元）、《坚多节斋韵文存稿》（屈守元著，2元）、《万国公报文选》（主编钱钟书，执行主编朱维铮，三联版，现以4折之价30元得之）、《一九八四》（奥威尔，董乐山译，3元，此书多年前割爱给伍立杨兄，今补购）、《苏舜钦诗诠注》（杨重华注释）、《历代游记选》（贝远辰、叶幼明选注，内有钟惺写成都的游记）、《陈炜谟文集》（刘传辉选编），三书共费10元。这些暂且按下不表，何不趁机说一种从出版上来说的“非卖品”，因为出版者是成都一家经营火锅名气很大，文化味也很足，而在我看来味道却不怎么样的成都皇城老妈酒店有限公司（火锅酒楼建筑极有特点，还自办有成都乡邦文献的博物馆，诗人杜力在那里当馆长的时候，曾带我参观过，虽然藏品说不上丰富，但已属难能可贵）。

这书名为《老成都》（无标价，我20元购得），成都画家代树良绘图，原《成都晚报》“老成都”版编辑、《民国时期的老成都》的作者之一王泽华配文，前有流沙河先生的序文。书中内容皆成都旧日勾当，多已消亡，文字细腻有趣，图画稚拙清雅，印制得精美，是

书出版前作者曾拿给流沙河先生看过图文，经流沙河先生斧正十数处，始以今日面貌示人，庶几错谬较少。同是这家公司还在1996年出版过一本台历《蜀里》（四川美术版），里面的照片涉及四川民居、茶馆、酒馆等民俗味道极浓的物事，且配有一首非常好玩的童谣，实在不错。我于前年在旧书市场以一元钱购得，至今收藏不弃，可见好东西，哪怕有点商业味道，也是可以让人爱不释手的。我客居成都20年，渐渐喜欢上这座城市的一些味道，还写过一本《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的书，自然见与成都相关的有意思的东西，必欲搜之而后快。顺告诸位，流沙河先生应江苏美术出版社之约而写之非常个人化的、图文并茂的老成都《老成都——芙蓉秋梦》，将在年底脱稿，年初出版，敬请各位爱家垂注。

2002年11月3－4日于成都

七

7日，我应阿坝一帮哥们的约请，至毗邻都江堰的三江风景区，于山中逍遥两日，听雪雀的鸣叫，饮清冽的山泉，观红绿杂错的山林，吸洗肺沁脾的空气，吃小金黄搅团，喝三江土产的锁阳酒，走人迹罕至的茶马古道，快活难以言宣。可惜欢愉之事易逝，9号下午5点在浓雾弥漫中穿千年古镇旋口，7点奔回成都，因为余杰已于京返蓉。一周前我跟王怡、廖亦武相约，等余杰回来一聚。我尚在途

中，他们已在离我家很近的望平街滋味鲜餐馆等我。到得吃饭处，遇到很久不见的藏族女诗人维色，更为意外的是，碰着路过成都、小作休整的王力雄先生，他的《天葬：西藏的命运》正纳入我的阅读范围。因他们都不是斗酒之徒，故饭后很快回家上网、看帖、回邮件，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不亦快哉！

晨5点半即起续写《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史》，7点半始毕，稍作修改，赓即传到关天、闲闲书话及大地文化社区，旋到草堂寺完成每星期日的搜书作业。碰到多日不遇的龚明德兄，看他所搜的民国版战果，谈及最近请北京一朋友给他搞的全套《晨报副刊》的影印本，花了3000多元的事，面有得色。交谈之中，我也把搜的东西展览给他看，虽无甚珍秘之本，倒也不乏于我的研究和写作不无小补的书。

因为多年来关注教育，写过一本从宏观上批评中国教育的书《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后来有志于做一个关于百年语文教材变迁的微观研究，故尔收到很多教材及各个时期关于教育的各种杂志，以期作一个较为完整的个案阐述。今天所得的三种杂志都值得一叙，首先得1956年下半年及1957年上半年的《中学生》各6期，总共12期，费10元。不用说，这上面的文章紧跟政府的时事风向非常明显，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周作人（周遐寿《“二十四孝图”和“救救孩子”》，1956年10期，不知周作人的集子收入否？）、邵力子、侯仁之、邵燕祥、萧也牧、谢觉哉、梁南等都在这上面发表过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大多乏善可陈。很有意思的是，接着

在同一买主手上又得到国民党治下的《学生杂志》4期，共费20元。这些杂志是1930－1931年出版的，这上面的文章没有跟风之病，作者及译者有巴金、周予同、贾祖璋、张世禄等。抗战时期出版的《中学生》纸张当然是大家习见的土纸，但文章却见不出丝毫的苟且。在这上面发文章的有夏衍、蹇先艾、翁文灏、丰子恺、张天翼、胡愈之、艾芜、黄药眠、邵荃麟、彭燕郊等。

对三种杂志，我尚未细读，但粗略比较有几个方面的印象。一、封面。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学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杂志，以红色为主调，封面多是戴红领巾的学生，譬如宣誓或者做实验。国民党统治下的《学生杂志》（商务印书馆）封面为钱君匋先生设计，主色为黑白对比，厚重大方简洁，编辑者陆功甫、发行人王云五；而叶圣陶先生任主编的《中学生》（开明书店）则为战时半月刊，为了节约纸张，封面即目录，颜色为土黄。二、广告。中国青年版无广告，而商务及开明版则广告甚多，均为这两个社出版的各种书籍。广告的多寡表明书籍出版的繁荣与否及相应的经济形态。三、出版及杂志所属性质。1949年特别是公私合营后，中国再也没有私营出版社，而开明及商务均是私人出版社。四、内容。中青版政治内容甚多，而商务及开明版则无甚政治内容，涉及纯然知识及文艺作品。

其他书籍可依先后购买顺序记录如次。8大本《文史资料选辑》，共费40元。因为文史资料里潜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他日再慢慢补配。于南牖书铺得《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古

今联话》，费16元，观前者主要是想看毛读书为什么能读出与我们不同的、偏于实用的东西，而影响他对现实的特别判断。苏渊雷被认为是学者且书法好，今以4元之价得新加坡出版的《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附苏诗龚图风流人物无双谱》。《笔记文选读》一小册，吕叔湘选注，《人文地理学》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之一册，二者合计费银3元。以10元之价于吕新处得清版线装书《训蒙必读二十四孝》，扉页谓板存乐邑北街桦茂斋，不知乐邑何处。买是书不在于此书便宜，也想系统看一看以孝治天下是怎么害人的，因为以孝治天下不只是个道德问题，而且包含着统治者对民众多重剥夺的祸心。

复次，在绰号豁嘴小赖处以8元钱得《科学知识进化论》、《世纪回忆》（冰心回忆录），前者为波普尔的科学哲学选集，波普尔是我最为佩服的20世纪几个思想家之一，其他还有伯林、哈耶克、汉娜·阿伦特等亦为我所折服。后者好像是谢冰心回忆文章的结集而已，聊胜于无。旅游乃我所热衷者，故凡是见与旅游相关的，好一点的书籍必搜罗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今以2元之价得品相稍差之《古代旅游诗抄》（云告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下，缺中），加上《碧鸡漫志校正》（岳珍著，岳曾为四川社科院谢桃枋的研究生，3年前我曾在旧书摊上得到谢所赠她的、上面有殷殷勉励其学习的签名本《张元干年谱》），共费15元。《作家的童年》（作者高缨签名本，送一位名纫君的人，未审何人，3元）、《周作人概观》（舒芜著）和《老子新释》（任继愈），共费5元。《儿童文学与

故事体写作论》（林文宝著，1994年台湾版，书前有"儿童文学教育学术研讨会　八十三年六月二、三日　'国'立台东师范学院"的字样），此书仅费5元，非常值得一观。

2002年11月11—12日凌晨2点于成都

八

自小不算个听话的人，余生也不可能轻意就范于哪个人或党派的教导，更不会按那些大言玄玄的号召行事。正因如此，我与老师的关系历来微妙，既融洽又对抗。融洽是因为读书不太费力就能考上更高一级的学校，对抗是因为我对老师的教导不会照单全收，甚至常指出老师的错误，使其尴尬，这在我们这个把名分看得胜于真理的国度，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到了大学，还是有不少老师我不喜欢，一是上课无趣，二是没有真知，三是对教学没有热情，四是没有对知识的纯然热爱。当然例外总是有的，那就是许多年龄稍长于我的青年教师，大抵是刚毕业不久，不大拿架子，喜探讨问题，好纵论人物，关系自然不错。20世纪80年代美学和哲学的火暴程度，就像现在挣钱和坐台一样热烈，人年轻难免追新逐浪，于是与教美学的阎嘉师交往日渐增多，和他斗酒猜拳，探讨辩难，俨如兄弟。多年来他翻译和写作的书大多送我学习，使我不至于蜕化到流俗之末而不向学。不特如此，他连我一直禀承的大胆胡扯，

也一如既往地表示赞赏。

这不，11月12日上午他就请我给母校中文系研二的师弟师妹们上上课。美其名曰上课，其实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乱说一气而已，就像天涯社区一位老兄的网名：还是胡扯。师弟师妹们可抽烟可接电话可随意打断可以提问可以辩难，这样也好，使我犯了错误也不脸红，颇有点逍遥论学的意思。如此一来，整个上午便一晃而过。中午阎嘉师自费邀我们大家到红瓦宾馆醉酒后，下午继续其舌耕生涯，真是诲人无倦。我与几位师弟师妹喝茶后，便到久已熟悉而又陌生的邮局附近的几家书店闲逛。

日本的文学，我看得有限，计有川端康成、三岛游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等人的小说。不知何故，总体来说不是很喜欢。后来看了些散文如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稍许改变了点印象。这次见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主编的"东瀛美文丛书"，其中有三岛游纪夫、井上靖、永井荷风、松尾巴蕉、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将1套15本立刻照单全部买下。一是相信叶先生的眼光，再者这套书的封面设计别出心裁，古蓝色的布纹纸，辅以仿纸浆的封脊包裹住，令我眼睛一亮，配得上日本散文一贯的唯美态度。"岁月就这样流逝过去，我一直叹息着自己的命运总不能由着自己。以至于迎来了新年也未感到高兴。一想到这世上不变的只有我这无依无靠的命运，就沉浸在可有可无的想法中。我的笔记下了命若蜉蝣的女人的日记。"（藤原道纲母、紫式部等著《王朝女性日记》，"东瀛美文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面对无法收拾的命运的

笼罩，如此节制不愤的文字，真有无言之痛。我对近现代日本人与中国交往的诸多事情均有兴趣一探，大抵与日本近现代在中国掀起波谲云诡的局势，造成我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有关。本身我对诸种游记均有搜罗之志，今见冯天瑜先生主编的“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中的一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书中居然勘探至在下偏僻难行的家乡酉阳，一方面日本人求真吃苦的精神为我所深佩，另一方面为他们窥伺中国的祸心不寒而栗。日记的裒集也是我藏书的一大特点，《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4月版）只是多年前从别人的文章中见人提及过，一直未得阅读之快，今始得之，一快平生。

市井趣谈、江湖怪招、行业轶闻、文坛琐屑，均乐意一观。如此爱好，大抵从阅读晋人小品再到明清史料及学术笔记而来，降及近现代有郑逸梅这样的掌故大家的熏陶，不免泥陷其中而自得，顾国华的《文坛杂忆初编》与续编（上海书店1999年版）也有此等供资谈助，补史之余的功效。这就像网络上关于各种著名人物的争论虽然有点八卦搞笑，如《网络金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一书，亦可作为阅读研究之用。但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这些排比错列其间的资料也不能照单全纳，读书贵在有疑，有疑则为发现问题之始，这就是路新生先生《中国近代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类的书籍得以问世和存在的根由。粗略一阅，惜乎路先生对疑古思潮与日本近现代文化的有关渊源阐发不足，治史之难资料固是问题，求真态度实乃要件，思想视野之宽

阔贯通似乎亦不可少。国祚易鼎，政权血替，百姓遭殃，是专制社会和铁幕国家的千古铁律。明清换代，巴蜀先民所遭血洗尤惨，百姓生活肃杀悲苦，厨烟不继，文化委顿不昌。就拿贩书业来说，直至乾隆中后期始有江西书商前来卖书，故明清巴蜀文化的雪泥鸿爪，令我辈巴蜀子民备感珍惜。前几年得李朝正先生所著《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和《彭端淑诗文注》，今又得其所著《明清巴蜀文化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可补我收乡邦文献之不足。

我不是学界之士，亦不是文坛中人，只是个读书人而已，但对思想实在有点业余爱好，暇余看点也只是作为催眠之用。但看伯林这样的思想家的书居然使我越来越清醒，前不久读完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今见其《反潮流：观念史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望买下来便中一读，开我愚鲁。几年前我写作《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读过许倬云先生的书《汉代农业》，留下极深印象，后读王小波的文章，始知他们系师徒关系，尤有好感。《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好像是许先生辞世之前亲自选编的著作，弥足珍贵。我虽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但对小波先生是很佩服的，当代文坛让我有如此情感者，仅此一人而已。不意短短几年间，他们师徒竟先后辞世，令人扼腕不已。天不假年，哲人共萎，奈何！

2002年11月16—18于成都

九

现代乱化的脚步及无所不俗的风气，从城市追逼过来，一直杀到穷乡僻野，明火执仗，大有未予先取的匪风，直至瓦解仅存的中国乡村风韵。三联书店这两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系列图文并茂的丛书大受欢迎，洵非偶然。中国旧有的人文习性，山川风物，民俗风情，民居建筑，古老小镇，经此浊浪滔天的现代乱化，大有朝不保夕之势。朋友相邀，奔泸州小城叙永作所谓的讲课，存心公干私混，于是将最近购得的《中国古镇游——自助旅游地图手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带到身边，按图索骥，可惜叙永没有纸上风景，亦非现实尤物，街景乏善可陈，实属意料之中。叙永固小，然抗战时也接纳过西南联大的学子以及像朱自清先生这样的人物，以使文明不堕，弦歌不绝，诚堪表彰。蒙当地文友许庭杨兄赐赠《叙永诗钞》、《叙永文钞》、《叙永县名胜古迹简介》，获悉历代与叙永有瓜葛而名声彰显者亦复不少，计有杨慎、何景明、李攀龙、纪昀、林思进、向楚、杨庶堪、吴芳吉诸人，前贤萍踪旧影，旅历一过，多系小寄一时，勾留数日，正复如我。

冷寂的小城似我，一夜无梦，醒得很早，居然听着像藏族人做宗教仪式时，所用的法号吹奏出来的哀乐，辅以锣声，一路喧车过街，引颈长望，不明就里。不过此等民俗究竟开我俗眼，委实为之一惊。行至陕西街罗氏面馆吃豆汤面，实乃一绝。此面系当地所产

小麦制成很有筋头的水叶子面，佐料为用文火煨炖的上等豌豆，辅以肉沫，加上大骨熬制的热汤，汤宽无比，豪吃一碗，爽到极致。轻松搞笑将课讲完，晚间主人延至魔方茶楼夜宴，席上得食叙永水尾产的苦笋，为我最爱，微苦的清凉，嫩脆的口感，不顾他人诧异的眼神，竟一人独食三盘而毫无赧颜。听主人介绍，此物畅销东南亚及韩国、日本，原来外佬们已早得爽快，小有感叹，大有妒忌。

某到一地，贪吃美食，打望美女，收得好书，拿走文史，醉得佳酿，已是多年不改之积习。间隙得闲，主人陪我至城中的上南街觅书。书店深藏在一个门面当街的房子里面，有十米的进深，店面狭小，门可罗雀，倒也符合我对县级书店历来的观感。书少而陈旧，实用居一，娱乐次之，可读而存之者实在少得可怜。某不通音律，连马克思强调的懂音乐的耳朵也不曾具备，然素喜音乐，此龙之于叶公，大有宋人卖章甫于越之讥。《音乐CD鉴赏》（泰德·比利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评鉴，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一书我在一位搞音乐的朋友家中见过，看他作为资料，宝贝得不行，顺便翻了几下，300部基本作品的知识，经典CD的大聚合，心下恨恨，惜不为我所有，今竟在小城叙永得到，虽然封底已被翻卷角，仍风快拿下，欢忭若狂。我问店员，这本书你们书店进了多少，他说3本，卖了两年。其实在这人口不多，收入不高的小城已属不易，须知不菲的书价，是可以吓退很多读书人的，何况小城的赏乐者毕竟有限。接下来在一本薄薄的小书上看到张兆和的名字，拿过一看，是《张兆和小说：湖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属于“民国女

作家小说经典”中之“虹影丛书”，因为喜欢沈从文的缘故，爱沈及张，故尔买下，以便将来阅读沈从文先生作品时有个新的参照及认知角度。十多年前对博尔赫斯的热爱，至今未有稍减，凡是与他有关的中英文著作都尽力搜罗，他小说的技巧及智慧，确实不愧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称号，因此4年前我不揣冒昧写了一本研究他的评传《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以此献上我对他的敬意。《杜撰集》（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集中的作品我都读过，但这书也许受读图时代的影响，配了很多与书籍内容及博尔赫斯本人有关的图片，至少一半我不曾见过，自然毫不犹豫地拿下。

一路浏览过来，竟然在农用科技知识一柜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本值得一看的书，一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钱仲联辑注），价格昂贵，品相亦稍差，书店又不打折，因为这书不是什么热门畅销书，我想回成都亦能买到，而且还能拿到更便宜的货，就此搁置未购。不过这书无论如何是要买回来的，一是我喜欢黄遵宪的一些东西，二来一位学古典文学的美眉与我喝酒，和我斗诗，我说拿郁达夫来斗，因为我认为郁是现代写古体诗的第一人，而她说你熟悉，我自然斗不过你，我们斗黄遵宪，你肯定输。我倒要看黄遵宪大衰哥引起美眉注目的诗句到底有多好。其二为法国人让-皮埃尔·韦尔南所写的《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三联书店2001年9月版），真是写得好看，既有专家之论，亦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着眼，无晦涩之笔。看看有些自称为专家的人写的东西，就让我

想起萧伯纳的一句对专家的戏谑性评语：所谓专家就是针对普通人的阴谋。前不久在《万象》杂志上读到叶兆言写一些故去学者、文化名人的文章，被其闲散冲淡，机智绕道，出语精妙吸引，此前我只读过他有限的两个短篇小说，不甚喜欢。这次见到《叶兆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买来就读了几篇，如《南京的乐》诸篇也不算太好，不过写众多文化名人，及回忆亲朋故旧的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

买书出来，到叙永有名的文化古迹春秋祠一观。春秋祠本是陕西、山西盐商修建的秦晋会所，主要供奉关羽。因关羽大哥功夫高，天天都不去会美女，抱着《春秋左氏传》苦读不休而得名。在不贤如我看来，关羽大哥真是辜负了自己英俊挺拔、高大威猛的身体。唉，令人废书三叹。春秋祠为晚清宫庭风格，木雕之精美，为孤陋如我者未曾目击过，其中的九龙坊、九凤坊、永宁八大景、百鸟梅花窗、百凤图、百鸟图、仿米南宫绘画等木雕石刻，说是绝世佳品，实不为过，我准备哪天叫正在运作鹿野苑博物馆的钟鸣兄前往一观。晚上临睡前读《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其读书之用功，观览古籍之勤，更在关羽大哥之上。原来为了读书浪费身体的人大有人在啊，古今中外，读书种子，看来不会像恐龙那样消亡。

2002年11月23—25日于成都

第三辑

可怜的中国教育

教育的光芒

有这样一位教师，我希望自己的女儿上初中和高中后能够做他的学生，尽管我女儿现在才刚上幼儿园，但不妨碍我作这样的遐想和期盼。有这样一位教师，他采用可行性、广泛性、互制性的原则，征求所有学生的意见，经过广泛的讨论，借用"总统是靠不住的"的思想内核，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班规》来进行班级的民主管理。更为有趣的是，这位老师有时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和法制意识，不惜"以身试班规"，以便接受学生的监督，甘受《班规》的惩罚，使得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有这样一位老师，他颇具爱心，但却断然否认教师是"圣人"，相反他将自己十几年教学生涯的失误公之于众，并当面或者在文章中向学生诚恳道歉。有这样一位老师，他质疑权威、勇于创新、敢讲真话，十分注意保护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千姿百态的个性，在出色地完成班主任工作和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出版了三部极有创见、令人感动的教育专著《爱心与教育——素质教育探索手记》、《走进心灵——民主教育手记》、《从批判走向建设——语文教育手记》。这便是充满个性魅力的成都石室中学语文教师李镇西。

我是个骨子里的怀疑主义者，不轻易相信书本上的东西，也不为花言巧语的说教所蛊惑，更不信任那些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

和所谓高尚的言辞。因为我对人的缺陷和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有着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尤其是对时下不少颇受非议的老师的教学工作——虽然有不少是由于教育制度的原因造成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应该承担自己那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切的观察。但当我看了李镇西的教学实践及其所著的教育专著后，我不得不佩服李镇西在教育实践里的艰辛努力，并在其间所投注的难能可贵的独特思考。李镇西在教学实践中，既展示了他独特有趣的课堂教学，对学生个性的关爱与维护，同时还体现了一般教师所没有的民主教育理念。他多方借鉴古今中外教育名家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真诚而实在地向学生学习，经过长年累月的教学实践，不断修正自己的教育思想。由是观之，李镇西的教育理念不是僵化的教条，不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似乎是内在自足的体系，因为他既有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的勇气，又有不断修正自我错误的坦荡。换言之，一个人的教育实践及教育理念，充满"试错"机制，这表明他的教育理念呈现出难得的开放状态，可以包容、吸纳、修正各种不同的教育理念，使自己的教育实践及思想更臻人性而合理，自然不会被不可企及的绝对真理所诱惑，故此凌云蹈虚而近于乌托邦。这也是我们对李镇西的将来还有更高期待的真正原因。

当然李镇西由于身处教育系统内部，利益所系，在批评当今教育的诸多弊端时有顾忌，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也不能不表示某种遗憾。不过，公允地看，李镇西教育实践及其思想中的某些缺陷，大多是因为如今的教育还存在许多禁区，教育制度有诸多弊端

所致。进而言之，李镇西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的缺陷并不全应由他个人来负责，他勤于学习、善于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飞速发展之社会对教育改革的需要。但他有时在书中小心谨慎地对待教育禁区，绝非学术意义上的谨慎，而是陷入了“知情不敢说，敢说的又多不知情”的双重困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镇西的一些认识和价值判断与真正的现代教育不睦。“1996年4月，我班年仅12岁的马宁同学，撰文对某些国人热衷于‘愚人节’等洋节的现象提出批评：‘中国人百年来被洋人愚弄得还不够吗？为什么到了今天有的中国人却要借洋人的节日来愚弄自己的同胞呢？……我盼望有那么一天，所有美国人能在他们的国土上放鞭炮、舞龙灯，心甘情愿地过春节。那才是我们的祖国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屹立于地球东方的日子——那将是中华民族最辉煌的节日！’这篇题为《盼望美国人过春节》的文章在《成都商报》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从批判走向建设——语文教育手记》P28）马宁很小，他的爱国思想应该表扬，但爱国中含着过多的狭隘性、排他性，无疑是不太健全不够理性的，老师应该就此指出来，否则就是我们教育的失误乃至失败。愚人节只不过是一个搞笑的节日，哪有上升到如此“爱国”高度的必要?！美国人过春节就能证明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吗？这里面存在非常幼稚而混乱的逻辑。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没有有容乃大的胸襟和开放的态度，要想有所作为，是绝对不可能的。要言之，近几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甚嚣尘上，殆源于我们缺陷甚多的教育，对此我们应有更为清醒睿智的反省。

我自认为对中国教育的弊端认识甚深，曾在自己的教育批评专著《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扉页上题署（后被出版商删除）“献给可爱的女儿冉小苒，她将接受中国未来最残酷之教育，我为她祈祷，阿门！”因此当我看到有一些像李镇西这样优秀的教师，在教育上做认真的建设、努力的尝试、不停的探索时，作为一位女儿的父亲，我的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我的女儿还小，但她将是受益者，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她还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时，我可以先代她感谢你们。

1999年9月22—24日于成都

质疑教育产业化

恕我孤陋，以我对教育的了解，世界各国尚没有教育产业化一说。不能因为教育重要，就来提教育产业化，这就像不能因为人重要，有时甚至资源稀缺，就默认人被买卖的现实，形成人贩子市场并产业化一样。这话也许你听上去很扎耳，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对教育有研究的人士，就更是如此。但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很可能导致如上我那句不伦的比喻，不幸的是，这一点很快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初步的证实。

循名责实，先说“产业”。《现代汉语词典》中说“产业”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土地、房屋、工厂等财产（多指私有的）”。其二为“关于工业生产的（多用于定语）”，如产业工人，产业革命。产业“多指工业生产的”，看上去好像不确，其实产业与工业在英文中本系一词，如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顿的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就被国内经济学界翻译为《产业革命：1760—1830》（参见梁小民、姚开建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读》）。自然，现在关于产业一说，早已脱开了所谓“多用于工业生产的”狭隘范畴，比如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但能形成“产业”并能“产业化”的多是能规模生产、大批效仿、普遍推广的行当，用产业来指称教育，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教育把人当作螺丝钉来对待的、与

现代教育一贯背道而驰的陈旧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认为，培养人可以像生产彩电一样，成规模地生产，而不顾每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独一无二的实际特性，用雷同的方式强行灌输自以为正确的观念和僵化而无用的知识，这已经加重了中国教育中的奴化成分以及对个人创造力的极大扼杀。

不特如此，教育产业化紧接而来的后果便是使教育成为许多与教育相关的部门对家长、学生甚至对社会的敛财手段。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只是家长有送适龄学生上学的义务，而且也是政府的义务。但教育法对家长的义务强调得很清楚，而对政府的义务含混不清。所谓义务教育，按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必须做的，二是免费。但我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仅不是免费的，而是花钱越来越多的教育。众所周知，民众都是纳税人（因为人只要消费就不可避免地在纳税），同时还专门缴纳了教育附加费的，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还让受教育者的父母花更多的钱读书，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重复收费，是双重剥夺。加之，教育供不应求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才导致了教育资源的稀缺，形成了畸形的重点与非重点学校这样带有普遍歧视性的区分。而这样的划分，就是在教育部强调给学生减负的今天，教育部依然还在给一些学校评国家级重点中学，这不仅与减负的初衷相违，而且与义务教育是人人——不论贫富、种族等的差别——都应该获得的基本权利的主旨相背，因为获取义务教育阶段所应获得的受教育权利，是实现人权中的生存权、发

展权最为基本的保障。本来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区别，就使家长及学生择校的风气日益浓厚，这不是家长和学生的过错，因为任何人都想获得更好的教育，但问题是可供选择的好学校是那样的少，就很不正常地形成了较好的学校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市场，于是在义务教育亦即本应是免费教育阶段择校费高达几万的天下奇观。自然像非义务教育阶段，如上大学，许多高校把收取学生高昂的学费（与国民平均收入相比，我国高校收取的学校堪称昂贵，我将在与人合著的《中国高等教育批判》一书中作专题性研究）当作敛财手段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

换言之，由于没有有效的制度制衡，教育产业化往往会被歪嘴和尚利用念成歪经，成为很多部门和个人都垂涎三尺，人人都想来吃的唐僧肉。产业化会使那些高昂的收费披上正当的外衣而不被人质疑。凡是产业，必然要赚钱，而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本的，不可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就是说，人力资本必须有相应发挥其能力的土壤等中间条件，才能产生效益。基础教育亦即义务教育阶段是人人都应该获得的权利，而非义务教育阶段是培养人才的成品或者半成品，进而推向社会，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增添动力，创造财富。教育也有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的地方，这一部分实行产业化倒是必需的。譬如高校后勤工作的社会化及产业化。如果能将学校庞大的行政人员包括多余的老师，以及机构臃肿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市场的需求来进行调节，而不把这些人员完全用纳税人的钱包括学生高昂的学费将他们养起来，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

受教育者的经济重压，从而使那些打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号捞取自己私利的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教育不是唐僧肉，它的很多领域不能产业化，否则它就有可能被那些念歪经的“妖魔鬼怪”千刀万剐而体无完肤，最终使人人都应该受到良好而无害的教育这项权利，受到极大的伤害。果真如此，不仅个人利益受损，社会进步无望，国家利益也将无从保障。

2000年5月16—17日于成都

将"减负"进行到底

外国人初到中国，固然会有不少的新鲜感，但也随即发现中国最让他们惊愕的两件事情，就是官员们制度性的贪污腐化，以及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忙碌不堪。我有一位对中国很有研究的外国朋友甚至不无义愤地说，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客气地说，只有你们国家的教育让学生如此痛苦，学习的乐趣已变成遥不可及的理想，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们从古至今为什么都喜欢提倡"头悬梁，锥刺股"。而作为教育主体的"当事人"——中国的中小学生对此则用"寄调"流行歌曲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控诉："书包最重的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有鉴于此，近几年来，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业已成社会热门话题。但不幸的是，对"减负"我们好像也堕入了一个怪圈之中，说得最多的，往往是我们知道得最少的；越是热门的话题，解决起来的难度仿佛与热度的高低就越是成正比。

1

教育部及各级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学校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可谓毫无用心、毫无成绩。但每次政策的制订、出台、实

施，其短视单一、急功近利、毫无相应的配套措施及长远规划，不讲求效率，不计政策执行成本，不算度改进阻力，真是使人大惑不解。这就好比一对父母在大冬天，只给孩子穿条内裤，而不给他用其它许多衣服配套一样，要想孩子长势良好，不患感冒不生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父母就是要一意孤行，不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不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一味要孩子执行大冬天只穿条内裤的决定。说句不大中听的话，知道的人或许会说，这是父母做主，有点瞎指挥；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在大冬天只穿条内裤的孩子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凡是研究公共行政思想和政府治道的人都明白，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一是从计划政府走向市场政府；二是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三是从专制政府走向民主政府，四是从单中心政治统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毛寿龙《公共范式的选择》，见《美国公共行政思想的危机》译序）前三者姑且不论，单说"从单中心政治统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如果能够真正逐步实现，无疑是对现今我们仍在完全采取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的一种改进。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的教育模式一无是处（因为法国的教育管理中至今仍有中央集权的成分，有效率而且开明），而是说统得过死，管得太多，将教育完全当作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样就会扼杀学生的活力和教育的创造性。简言之，教育部门要把宏观管理和尽量的放权工作做好，才能使教育最大限度以人为本。比如西方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就非常灵活，

政府只在政策上给予大体的指导，至于各个学校用什么方法教学生则不予过问。“减负”条例由教育部发出，本身就证明行政集权管得过死，而导致教育的死气呆板。中国由于幅员辽阔，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但还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考试，人才评价标准单一，造成不必要的竞争压力，使得教育的供求关系，在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内，压力和竞争空前惨烈。这个局面必须改革，否则“减负”就会是一纸空文。

要使学生减负落到实处，政策必须全面配套，因为减负是个系统工程，尤其是我们这个权力过于集中的国度。譬如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不是用合格率、及格率、升学率来要求各级学校，改结论性评价为过程性评价和资格性评价；在教学大纲的规范下，改统一教材为各省自行编选适合自己的教材，以适应本地区经济发展之需，尤其是高校应有自主招生的权利——这当然仰赖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才可能使高校独立，而不只是个行政单位（那样就会受制于现行体制，反而造成更多腐败的钱权交易）——如此才可能使学生的选择权利、上大学的机会增多，缓解教育供不应求的紧张关系；改革只重学历的单一的社会用人制度和人才评价标准；建立家长教师协会，让家长对学校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发言权，等等。要言之，教育改革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平台上，否则“减负”就会适得其反——令人忧虑的是，目前单一的减负政策正遭受社会各方面的抵抗，不说学校，就是家长们也是“减负”的最大阻碍者——“减负减负越减越负”，难怪学者秦晖

不无激愤地说，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换言之，减负既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2

为什么近几年反反复复闻听社会各界要求给中小学生减负，而以我对教育的研究，很少听说过国外有关于减负的话题。因为他们不仅恪守自己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而且真正知道尊重“玩耍是儿童的权利”。在他们看来，童年应是人一生最宝贵而短暂的时光，充满了“enjoy”，因此学习就是“enjoy”。而在我们的国度，儿童和学生如同所有的弱势群体一样，受到尊重并得到保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未成年保护法，以及教育法中关于儿童和学生在学习中的义务说得非常清楚，而对他们的权利则含混其辞，这反映了立法中义务与权利不对等的偏颇。教育立法首先有问题，教育中的司法案例非常少，即便有，司法不公也丧失对弱势群体比如学生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学生权利的忽略，或者干脆不提及，以便蒙混过关。这也是我们不实行真正的公民教育——如让学生有知情权、参与权、在一定范围内的自决权等——而实行愚民教育的深层原因之所在，否则让学生知道得太多，有许多近乎法盲或者知法却不守法的教育者，便无从任意指挥学生，所谓的“教学”便无法开展。关键是教育系统的人包括老师，尤其是教育官员，必须提高自己素质，以尊重学生权利，让其知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

己任。诚如我在拙著《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中所言，不从小培养学生的权利意识，学生只知服从听话，那么做奴才便是他的宿命；不让学生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便会变成有知识的“侏儒”。

这不，现在教育部及各级部门下发的减负令及相关的减负措施中，无一条提及学生的权利，或者运用相关的教育法规，这正是对我们常说自己的国家已走上法治国家最无情的讽刺。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不建立在法治和学生权利基础上的减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而已，这种把戏，一个中国人一生中不知要见识多少回。换言之，要把学生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教育必须以科学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目的，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教育纳入真正的法治轨道，才可能达到减负的真正目的，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善于学习。减负的另一个必要性在于，真正的学校教育只不过是为人一生的教育打下一定的知识基础，并且养成终身热爱学习的良好习惯，掌握学习方法，而不是记下许多用处不大的死知识，否则学校教育便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减负本来是我们的教育向更人性更合理更现代化迈进的一个小步骤，教育部和各级政府的用意都是很好的，但千万不要变成海涅的名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而现今的减负正露出了这样的端倪，值得社会各界深切关注。

2000年3月13—14日于成都

手写的女儿

一、戏仿秦始皇

家无长物，有破书近两万册，因此在女儿周岁的时候，我并没有搞抓周活动。因为环壁皆书，俯拾即是，只有抓书。这样一来，就硬要逼出个读书种子。在我这样信奉自由选择的人看来，是不愿意造这种假相的。没有选择，便是一种剥夺。因此不行抓周之俗也罢。

但女儿冉小苒很快就显示出她初始的伟大理想来——这当然是我连猜带蒙的，不知有没有诬陷她的成分，阿弥陀佛，但愿没有——便是戏仿一回秦始皇。她对书很有攻击性，遇书如见仇敌。撕书的声音很刺耳，但对她来说，却有点像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有次撕着手上的书，撕着撕着，终于睡着。看来撕书可不是轻巧的活，比秦始皇一天批阅120斤竹简还累。当然，像活埋460个不听话的儒生，烧掉除方术书籍外的大批图书，这种非凡的能力只有龙种配做。我女儿属耗子，看着她撕书不止，却成效甚微，连模仿秦始皇的能力都还不够，只能算是戏仿，最多拿个模仿秀的尾奖，还不够上“欢乐总动员”。

二、她的工作

小苒有亲触大地的癖好，能走了她也爱爬，因此好像我们只给她买了黑衣服，惹得她母亲责备不止。而我乐得让她如此接近大地。女儿的母亲是城市人，而我是农村人，这大概就是区别。人是环境的动物，信然。女儿上幼儿园，平日接送都是我，据我的观察，她对把衣服弄脏有特别的快感。譬如钻灰尘极多的冬青树，还有坐梭梭板，别的小朋友是坐着梭下来，而她是爬着梭下来，整个身体全面打开，好像她是梭梭板的清洁工。这样一来，每天回来，衣服就特别脏，妻子就很不高兴。而我却很得意，仿佛这是父女俩的合谋。有次我就对妻子开玩笑说：“把小苒的衣服洗干净，是你的工作；而她把自己的衣服弄脏，就是她的工作。你们都是在做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于是女儿以后干脆叫板式地向她母亲说：“妈妈，我今天工作得好不好？”

三、绿党与叫花子

我小时候，家乡的野生动物极多，举凡豺狼虎豹，野猪刺猬等等，似乎应有尽有。10岁那年，我照看一只母羊，差点被土狼叼走。母羊的喉咙被咬了几个大洞，后来十多位青壮小伙子赶到，才将其赶走，母羊当晚一命归西。每年玉米即将成熟的季节，男人们都必须参加在苞谷地里的守夜，以防野猪来啃吃玉米。尽管蚊虫肆虐，但

在苞谷篷里喝酒，听大人讲骚龙门阵，我觉得很有乐趣。女儿自小喜看卡通片，而且爱看“动物世界”、“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探索频道”，因此从小就喜欢动物。有次路过一个羊肉店，看见几只活羊，我给女儿说，我们买只羊回去吃。女儿说，你又要吃动物嗦？我就给她讲家养和野生的区别，说家养的可吃，野生的不能吃。于是她就说，家养的小孩也要被吃掉嗦？我开玩笑说，不听话就要被吃。她说，那我就要做叫花子。我说，为什么？她说，叫花子是野生的。

四、不发奖状

平日从传媒上常看到我们教育的不堪，如大批儿童失学，教师工资被挪用，老师无所不用其极地体罚学生，教育官员贪污腐化，非人的应试教育，老古董式的教材，等等。因此我早在90年代初即开始关注中国的教育。后来，随着女儿的降生，更是忧心如焚。于是寻思着给女儿做一点什么。因此在1998—1999年，我以一个父亲的爱心，以一个公民的责任，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了一本猛烈批评中国教育的书《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

书甫出来，我欣喜地拿给女儿看，想向女儿邀功。说是我给她写的书，她以为是诸如宝莲灯之类的卡通书，一看不是，就随便翻了几页，便摔在沙发旁边。没有表扬，没有批评，一句话也没有。我问她，她只说了一句：不晓得你写的是啥子。

2000年2月17日于成都

教育思想家胡适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20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1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论家庭教育》，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版，下引有关胡适论教育的篇目均出此）。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

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

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750人，其中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44人，占82.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占282人，占16.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占23人，占1.3%。”（王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P216，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事实上，去外国留学的这种技术至上的思想，实是沉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执迷不悟，也是实业救国过头的及时反映；更是我们自己过分强调技术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专才教育的结果。固然，没有实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国不强，民不富，要说国家之变革，有点近乎痴人说梦，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还不完善，但的确包蕴着一点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经济发展了，就自然带来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吗？恐怕只有实足的妄人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应该深知，习一先进之国的文明，非学该国积淀甚久的精神内涵不可，尤其是该国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剂，这一切都必须是习人文科学的人来实现。

胡适对念兹在兹的中国留学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着实的建设，细致的主意，他认为“今日教育之唯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们要想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

2

国家既处衰变之期，民众亦处颓唐之时，外侮日重，内乱频仍，国之不保，民之将堕，使有识之士，心有不甘，奋身跃起。像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医手齐聚，于是各种方略纷纷出笼。胡适未必不知狂傲的龚自珍愤然后的谦虚："何敢自矜医国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见死不救，何况国之将倾，在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那里得来的训练，配以胡适好名"做圣"的心态，于是他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先不妨切实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放了眼光大胆去看，"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方略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这也是不发达国家在被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紧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复，非动大手术，即最终迈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不可，舍此别无它途，这一切已被后来的社会实践对人不堪的实验所验证。胡适的确是希望国民过上好日子，后来又与人献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们这个惯弄权术、以玩人为要务的国度，除了可堪尊敬的书生之诚，实无它用。而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之所以不能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复杂，诚非三两句话能一网打尽。这可能与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样，分析计划经济将"通往奴役之路"，从而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关，使其自

由主义成了只与别的主义不同的另一个乌托邦，而他又不具备另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强烈的煽惑功能。国家多难，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药者多，希借此而一劳永逸，但猛药的副作用是，疗得眼前之病，而它病夹带而人，或许最终转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术。而胡适用的是调和之中药，药力虽有，且无副作用，但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疗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不能去煽惑民众起来斗争，自然就不能顺应眼下民情，又要去“做圣”，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背时，而教育救国便是其背时的一个体现。胡适面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国家内外夹击的困难，他走的是温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无能，但又不同意学生因此罢课而荒废学业。他多次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演讲，呼吁学生不要以罢课来作为革命的响箭，因此他认为“救国必须从自己下手”，而学生自救的方略则是“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自铸成器，国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认为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显例。胡适这些话对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冷水浇头。我们理解那些下猛药的人，但猛药的副作用，却没有人来管，则是不好的，只有等几十年后像韦君宜这样的学生老革命，来写《思痛录》以反躬自省。而胡适的观点素来被那些超验地不加证明的喜欢革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包括一些借此吃饭的研究者，至今这种论调仍可谓甚嚣尘上。倘使革命成功后，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会说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们有吗？我敢去找死，

你敢不敢？换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脑袋，我想没有人敢或者愿跟他们打赌，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人类文明和经验的传递工具，并且自身具有对社会前进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方式来讲，有其延续性和滞后性，因为教育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今世界风行终身教育，但终身教育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论教育怎么发展，总是有其难以超越的阶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阶段学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定，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阶段辍学或失学，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胡适的话与干革命的人，应该说两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适的道理从文化继承层面上来讲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唐诗既属于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义则属于唐朝，因为它不可能影响当今政局，至多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教育有不囿于一党一派的超越性，这在民主国家尤为明显，你不能说美国现在的教育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教育，而前几年则是共和党（布什）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救国不是一党一派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这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个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个很妙的、说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集体无饥饿，只有个体才会饥饿；集体没有痛痒，只

有个体才有痛痒。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痛痒，然后再及其它。这说明个体的利益与权利应受到保护，才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教育不从个体选择及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救国”完全以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号召，国家主义教育就会像一柄双刃剑，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会形成二战前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最高旨归，剥夺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受害者终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适“教育救国论”的根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与其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有关，由此，至少在理论上可避免统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话语霸权，来实行教育上的独裁。

3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用浅近文言撰写《吾我篇》、《尔汝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后这篇文章里说：“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接着他又在1915年写了一篇《如

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得出一个石破惊天的断论，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相应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便要解决的是，旧式标点中只有一个句号和一个读号，所造成的对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胡适便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制定出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胡适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伟。他单刀直入地指出旧式标点符号的弊病有三：一为“常人不能‘断句’，书报便都成无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为“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解”；其三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胡适文存》第1卷）。新式标点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础，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国语的文学”的先声。

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陈规，实施白话文之普及，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国语统一”的标准，就必须建立一个简便易行的仿效规则。胡适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国语的文学”必须建立在“文学的国语”基础之上，“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第1卷）这真是心细若发、慧眼独具的见解，说明文学作品对一国语文之发展建立，有相当的基础作用，这是符合语言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

的。1922年，教育部颁布了废止文言文，采用国语的第一法令。与此同时，胡适到教育部开办的国语讲习班授课，他授课的讲稿后来以《白话文学史》出版，而且他与国语会的成员共同努力，使得教育部颁布了统一的《国音字典》，对达到“言文一致”极为有利。再者，他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国文应达的标准：其一，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其二，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其三，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其四，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中学国文的教授》），后来他再谈中学毕业生的国文水准时，觉得对古文要求过高，降低了学古文的标准。

胡适所谈的中学国文教育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着对学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重，对今日中学语文教育仍有相当针对性的有两点：其一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机会，因此后两年安排“演说”与“辩论”，在他看来，能演说与辩论的人，没有国文不好的，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其二，他主张从古小说里理解古文，而不是从干瘪瘪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读本》，这是实践他“文学的国语”的见解，因此他倡导用“看书”代替“讲读”。而我们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之不堪，简直到了要让人发疯的地步，语文教学之僵死呆板仿佛《聊斋》里的关于鬼的故事，实在让人恐怖；考试答题之繁琐无趣，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标准的考试机器，真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从《北京文学》到《滇池》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无一不是民情汹汹的讨伐之声，于此可观中学语文

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们教育界的一些老爷们只管省事，哪管要给学生带来一点可怜的乐趣，与胡适倡导的“活的”中学语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4

语文在学校教育中各学科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甚至有学科中心之领衔作用。由于语文作为其它学科工具的基础地位，因此解决语文教育的革新问题，必然为其它学科的改革奠定基础，同时也显示了语文教育革新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文化教育界兴起了两个热潮：一是白话刊物纷纷创刊，二是平民教育的勃兴。前者，不用说，胡适是其中支持创办白话刊物的干将，后者胡适亦不落人后。平民教育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劳工神圣”有相通之处，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工读互助团”，旨在提倡半工半读，以利平民之识字及文化提高。这些都是西方教育机会平等和普及教育的思想在中国的反映，更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直接体现。虽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对过往的“精英教育”的一种反动。

为了更好地普及基础教育，胡适参与了有名的壬戌（1922年）学制的制订。学制作为教育制度的子制度，极为重要，它能反映出教育是重普及还是重提高，尤其是决定着考试制度的性质，而考试制度又会影响教学，乃至反映出该种教育制度的教育目的观等

等。这次学制尚未改革之前，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学制会议的希望》的短评，他主张教育的精神，而非为学制而学制，并认为新学制里中学部分最为切要。这反映了他对普及基础教育的热望。此次学制改革，将小学7年改为6年，将中学4年改为6年（三三制，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取消预科，师范学校6年，也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这样，以前的日本学制就转向改为英美学制。虽然中国考试制度的金字塔形结构并没有因此改为欧洲的梯形结构和日本、美国的谷仓型结构，这与我们人口众多，以淘汰性而非资格性考试方式有关，此种弊端实承科举考试制度而来，非三朝两夕所能断改。但胡适参与制订的7项学制标准中有4项与杜威的思想有关：加强职业教育，实行选课制和弹性制、下放大学预科至高级中学等。新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缩短了学制，中学加强了文理科的融合，提高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水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开创之功，此种学制延续到1949年，解放后废弃已久，但改革开放后又承此制，可见此学制的生命力和相应的科学性。

解放后，学制之变化极为频繁，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命令正式颁布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稍后受苏式学制的影响，尤其是“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影响深远：“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

可以从此看出以胡适为主制订的壬戌学制的一些影响，比如学制要缩短，比如既要学这样又要学那样，这既有平民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职业教育的影响，也多少有民粹主义教育的影响。胡适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1918年8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赞《湘江评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毛泽东后来找胡适谈湖南教育界驱逐张敬尧的事，并说"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有毛泽东的回忆，说喜欢《新青年》，爱好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众所周知，后来双方越走越远，而到了50年代，胡适作为战犯和资产阶级学者，遭大批士人承官方旨意的猛烈批判。据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研究（《论胡适的诗》），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受胡适早年词《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周先生说毛泽东未必有意摹仿胡氏，但在下意识里尚未摆脱少年时代受胡的影响，两词结尾分别为：

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胡词）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词）

学者罗志田的分析是，毛泽东写此词时，心中有胡词在，而且是对胡词的回答。胡适咏俄国二月革命，但亦可一般地理解为新俄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写此词时颇感自豪，回答胡氏，我们的革命将要赶超俄苏革命。"就像胡适一生都有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一

样，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的毛泽东又何尝没有一个赶超英美最后赶超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呢？”（《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晚年大改学制，是否心中有个胡适，不敢遽下断言。但老年时的一些举动与少年时代的某些影响有种隐秘的通道，是得到心理学家认可的。

5

胡适对教育之重视，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他在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奔走呼吁，既存教育救国之心，也是他对西方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认同的结果。他认为教育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必要途径，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经验，也是遍观民国社会弊端后所开的药方。

胡适相信教育应该独立，尽量少受政治风潮的波动，受政府三天两头陵替的影响，加之他常看到学生闹学潮（并不是所有的风潮都没有道理，学潮之讨论是另题，不在此列），给教育的负面作用，以及对学生的直接影响。他认为，东汉已经有很发达的大学，但因为大学是作为国家官制的一部分，而一朝一代之天下即专制主义，学校作为传载文化的工具，必然随王朝的灭亡而未得保留，或者有所损伤，也就不利于搞持续的创造性研究，不像西方的大学，政府

的上台与下野，并不影响大学之存亡。因此他呼唤大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独立的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管理制度（《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讲话》）。胡先生似乎忘了，西方绝没有我们这样漫长的专制传统，而且教会在他们的世俗生活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不少大学都得教会之助，得以建立和发展，而我们的社会政治系统中，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哪有什么能独立的漏网之鱼，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行民主制度，要想大学在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上独立，要想思想自由，精神无羁，实在比登天还难。但教育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胡先生这个梦确是深得我心。

另一方面，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教育的牺牲品。他批评教会学校时指出，“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他为此拟了教育独立的三项具体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转引自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P197，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点自然都是中国教育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空谷足音，但在专制国家实难实现，且不说别的，单说要中央禁止无知疆吏干

涉教育一项，即不可能实施。首先你必须不证自明地相信中央是开明而不昏庸的，他们享受着不被怀疑的豁免权，其实，这豁免权首先就应该被怀疑；退一步说，他们开明可靠，是否就可以证明他们不勾结，因为利益之网是千丝万缕的，你要他禁止无知疆吏，他只有在暗中干笑两声。事实上，制度刻酷吃人，不管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哪怕是像胡适这样的大才如何努力，也极难实现与此制度冰炭不容的教育独立。弄到后来，胡适自己执掌了北大，也主张“党政军团与学校合作”来“疏导教育”学生。诚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P333）

当然不是说坏的制度，就一事无成。在专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时期，即相当于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主政，也还是可以在校内维持一小点民主自由权利的。比如1917年经胡适提议，在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回顾与反省》）可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争得这种权利，对办高等教育尽管只是权宜之计，但也属难得。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动情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的好处来，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因此教

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胡适的教育理念，还关涉到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等，难以备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视的。但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判断依然是混乱而奇怪的，我们从来不愿意有自己的判别标准，于是只得出了一个漫画式的胡适。现在当然不说他是走狗了，只说他没与国民党统治者作生猛的较量，甚至还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问说这话的人，对当下现实中的混乱和黯昧作过多少批评与指陈？尽管你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胡适批评的权利，但你批评起胡适来是否就问心无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评价古人时教导我们：“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我想评价胡适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吧。

1998年10月27—29日于成都

请看今日之中国名校

目下中国社会诸方面的问题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盘根错节，即便是嚣张兀傲的绝顶高手，也只有暗自喟叹：何敢自矜医国手。教育问题便是社会这张纷乱无端的烂网中的死结之一，要解开这个死结，当然不能用积极革命的剪刀，天翻地覆，干脆一刀两断。教育的严肃性和延续性，以及它与千家万户乃至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大有关联的特殊性，决定了采取一刀了断的做法，哪怕真的能够泽被后世，如果对当下受教育者伤害既深且巨，成本高昂，社会认可的难度自然就会加大，故教育宜在改良之中抓住其要害之所在，裨使教育在现今剧烈变化的社会，以相对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畸形产儿

要改善当下教育的现实境况，应该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对接方式上入手。这看似寻常的一个问题，因每个人所取之立场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不易达成共识。但问题在于，中国教育几千年来始终是个供不应求的市场，教育作为稀缺资源，虽经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然由于吾国人口基数过

于庞大，使得在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学校教育包括全民教育的规模效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消。这种抵消再次造成教育大规模的供求失衡，供求失衡的后果是基础教育尤其是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的门槛增高，而通往大学之路的拥挤之途并没因扩招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因为我们国家出台的教育政策一向缺乏系统性，所以在执行教育政策时难免成本过高，因而适得其反，比如所谓的减负，初衷不可谓不好，然实际效果是四处不讨好，难道真的是减负本身错了吗？非也。这就像一个城市要铺设下水道管、自来水管道、煤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并没有错，但依然引致民怨沸腾，问题就在于政府的公共行政执行部门，进行城市建设，铺埋管道时不考虑公共营运成本（显性的成本是乱花钱多花冤枉钱，隐性成本是民怨沸腾），才出现今年铺好了这种管道，过一阵又挖开铺另一种，如此反复，好似子子孙孙无穷尽。教育政策的出台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解决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对接问题，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相当关键，二者不可偏废，但因此处所谈及的所谓名校，特指基础教育中的中学部分，因而着重关涉基础教育中学部分何以形成今天的局面，对于理解如今所谓的名校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的关键就是要有足够多的好学校，良好的设备（包括图书馆、实验室等），高素质的师资，让众多学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正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实质问题所在。因为人口基数庞大，各地经济发展不一，造成了学校与学校之间差别甚大的现实。作为一个政府，对其政绩、行政能力，应该有相应的评估体

系及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教育所具有的延续性特征，作为文化传承、学习知识的必要途径，换句话说，教育作为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坚实稳定、不折不扣的长期的投资眼光，并通过良好的可操作的制度将其固定下来，而不是朝令夕改，头脑发热，目光短浅。而重点学校的诞生，就像搞样板工程一样，是急功近利的产物。这就好比，政府现在喜欢说，我们今年要为民办十件好事实事一样（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除了这十件好事实事外，政府每年所干的多是虚事假事，总之是不好事。这不是曲意解读，而是政府讲话、新闻传媒中这种不合逻辑的漏洞俯拾即是），就是集中搞样板，然后以点代面，掩盖自己在其他方面的错失。一言以蔽之，重点学校就是政府为了掩盖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误（包括投入经费严重不足）采取的一种巧妙的掩人耳目的措施而已。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作为一种特权产品（农工干部、出身成分好者等优先原则），而不是人人皆得以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自然教育经费的给多给少，不是按制度行事（现在的教育法有教育经费拨给占GDP的百分比，但《人民日报》每年在10月22日左右公布的教育白皮书，都说有许多省没按法规完成，但没听说任何政府官员为此受到制裁），而是一些对教育管理根本不懂的官员信手一挥，自然就会多花一点钱在每一个城市建三四所所谓的样板学校——正符合政府做任何事情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是大事姑且不论）——这便是重点学校诞生的教育思路和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一所学校获得的支持一多，另一所学校就相应减少，拨款

亦是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当今的重点学校几乎都是以牺牲大批的非重点学校为代价的，这是对大批学校包括在该校受教学生的严重歧视，这个代价十分昂贵。就像农民在这个国家一直是二等公民，没能得到相应的国民待遇一样，大部分普通中学在为重点中学做贡献、付代价，牺牲自己应得的受教利益，这是等级特权观念在中国教育中的真切反映。

我承认像四川石室中学、浙江春晖中学、江苏南师大附中等这样的名校，有它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人文传统，不凡的教育业绩。但说句实话，这些可堪炫耀的大多系旧日资本。春晖的辉煌在我看来是它在民国作为私立学校的时期，像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这样不世出的好老师，现在已经成为绝响。成都石室中学的灿烂，当然与文翁石室有关，但我更承认是近代学校兴起的产物。石室中学在民国时期可谓名师辈出，如赵少咸、何其芳、曹葆华、林思进、刘咸荥、庞石帚、李劼人等。恕我孤陋，现今不仅没有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家，而且连几个像样的、具有教育家气质、真正以教育为己任的校长都少有。

应试教育"集中营"

中国人口繁众，受教人数庞大，而教育经费拨给并不充足，即便拨了，被雁过拔毛贪污掉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自从4年前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上大学毛人率稍有增加，然对于众所欲上大学的人

来说，大学教育仍是供不应求，以往那种过高考独木桥，挤下很多失败者的惨状仍在发生。最主要的当然在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即教育仍是稀缺资源的残酷现实在我们国家仍没有根本改变，同时也与当政者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对每所学校的投入和关注程度不一样所致。

去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湖北黄冈中学的文章。作为重点中学，黄冈中学的考试升学率在普遍成绩很高的湖北省都名列前茅，但很多从那所学校毕业考上大学的学生，却说自己在那里曾经的学习生涯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以致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这在当今中国的中学里并不是个别现象，黄冈中学只不过被传媒当作一个拿来研究的靶子罢了，并不表明黄冈中学为了升学率、及格率、合格率做得比别的学校更加残酷更不人道，这只是当今中学教育残酷现实的缩影罢了。而这残酷现实的始作俑者，既有人口过多、教育资源稀缺的原因，更有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因由，还有教育行政部门评价体系过于承袭僵硬单调呆板的苏式评价体系所致。

前几年教育部门虽然开始公开提倡素质教育（虽然定位不清，含义不明），但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搞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评比。现在重点中学有区重点、县重点、市重点、省重点、国家级重点，只差来个宇宙级重点中学。比如国家级示范中学的评比采取的就是百分制的方式，将每一项得分数标示出来，这样考量学校的标准样本设计固然易于操作，但往往易于突击和做假，而对一所学

校来说最为重要的人文素养却无法通过这种评比将其量化出来，这样的样本设计和评估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教育自身，以我本人多年来对教育的研究，是大可怀疑的。教育行政部门不在教育行政、包括协助法院在教育执法上多做文章，而在一方面倡导学生减负、素质教育的同时，却在全国大搞“国家千所示范性普通高中”的评估及评比，使得每所省级重点中学疲于竞争，做表面文章，视升学率为办学的唯一鹄的，这样能实行素质教育，无异于白日做梦。

教育行政部门考量一所学校的工作实绩，多用易于操作的实用主义态度，“三率”（升学率、合格率、及格率）放之吾国而皆准，这是教育行政部门作风衙门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为自己渎职找到的最简便的搪塞办法。此种过分庸俗的实用主义评价系统，是教育评价体系中的结论性评价，在教育行政工作和学校工作中泛滥成灾的必然结果。老师看学生就看考试结果，而不看学生在自身基础上的不断进步，创造力的张扬，想像力的勃发，快乐有趣的学习，身心俱健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不注重过程性评论和诊断性评价。重结论性评价，是教育管理中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过度的必然产物，是过分迷信数字及达标等所谓的商业管理模式对教育管理的完全侵入。看重结论性评价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大问题，即教育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教人何以成其为人的必要途径。既然教育是人何以成为人的必要途径，那么完全把人当物品来看的数字管理、彻底量化的管理方式，本身就是对人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一个人成

长受教历程简单粗暴无礼的对待方式，并且从本质上违背教育的初衷。老师及学校重结论性评价，必然导致学生对分数的无限崇拜；教育行政部门重结论性评价，则校长及学校包括老师轻则在数字上造假，重则唯数字之命是听，而不管学生心灵的健康及整体素养的升华。这样一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成本好像因易于分析而降低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中国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沾染上了所有中国官僚机构的恶习，如人浮于事、扯皮拖拉、效率低下、轻谩公众、打压纳税人、唯利是图等等痼疾。要这样的机构有办事效率，尊重纳税人的权益，实在是与虎谋皮。

如此顽固不化、偷懒取巧的评价体系，自然就会使应试教育之风愈演愈烈。因为校长是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既非民主选举亦非一定程序的公推，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董制，校长成了官员系统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自然不可不看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自己的评价，不管这评价是如何的形式主义。有的校长甚至如同政客，不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而是把它作为自己政治上往上爬的晋身之阶，这与民国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等人相较，相去何止霄壤！与他们相比，当今有多少人有资格做一个合格的校长，可以说寥寥无几，这种悲哀已经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残酷现实。再推下来，没有流动自由、迁徙自由的教师把校长当作自己命运的主宰，唯校长是听，没有独立的人格，将校长的目标考核和管理视作圣旨，不管这考核是如何荒谬绝伦。当然最受苦者，必然是处在最底层的学生了，他们只有遭受分数残酷奴役，而成为

分数的奴隶的悲苦命运。

复次，普通学校纷纷恶性竞争，造假谎报，争当重点学校，区重点欲成县重点，县重点快马加鞭至省重点，省重点坐火箭至国家级示范重点学校，除了升学率比其它学校较高以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更无论什么人文内涵，学生的自主发展。为什么这么多学校纷纷欲当重点学校而后快呢，说白了，无非利益驱动而已。因为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特别喜欢搞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重点学校在诸方面——教育经费的拨给、师资配置、软硬件设施建设、生源选择、收费标准等——享受其它普通学校不可企及的待遇，这使得许多学校趋之若鹜，踵武其后。不特如此，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便是，成为重点学校后，各种乱收费将大幅度增长，使学校像一家盈利空间极大的企业，校长成了一个只管赚钱、对上峰负责的官商联合体的老板，所以当今许多学校的校长都只不过变相的商人而已。而所有学生，不论考上还是没有考上的，无一例外成为真正的钱学生。本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部分不该收费的，也是人人都得交，而且动辄上万，而高中阶段的收费则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当今的重点学校要争当义务教育的排头兵，每年高考后要宣传自己的学生上线人数，宣传某某状元的内在动力之所在。以至于有人说，当今中国没有什么名校不名校，只有著名的“集中营”。其言辞虽说不无偏激，但实在不是毫无道理。

何谓名校

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话就是说，没有著名学者、出色的教授，一所大学简直不能算是一所合格的大学。我们也可以说，一所中学没有名师，简直不能算是名校。以此观察当今全国有名的中学，可以说没有哪所学校称得上真正的名校。

1949年后教育界批臭老九，视有专业特长的人是走白专道路，彻底毁掉了知识在一个民族心目中的应有地位，长期以来，不学无术，读书无用成为一个社会可怕的共识，在世界民族之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社会不把知识当回事，视金钱为万能，把权力奉为圭臬，当官和挣钱成为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别说建立书香社会，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就是对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都很困难。加之当政者往往以卑鄙相尚，社会风气以实用相趋，拿官本位作标的，动辄以利益相诱：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不如一个科研处长受人尊重；一个相当有修为的特级教师，不如一个教导主任吃香。正如网友边园先生所说，当今“有教官，有教棍，有教混子，就是没什么教育家”！（《上海猎书记》，见天涯闲闲书话）实在是沉痛见骨的话。

就拿民国时期的成都石室中学来说吧，由于教师实行聘任制，教师的敬业程度得到了相应保证，再者彼时教育界不像今天这样

固步自封，教育界自成死水一潭，社会不关注教育，教育界不关注社会，互不往来。社会上的教育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譬如在校外聘有名望的老师来兼课，一来提高学生的水平，增加讲授吸引力；二来形成良性竞争，使老师不至于靠一本讲义吃N年而不思进取，不进行知识结构的自我更新和不断更替，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3月和1949年12月在石室中学兼课的大学教授、讲师达21人之多，其中单就国文一科来说，就不乏彼时和后来名重士林的人物，如赵少咸、文百川、卢剑波等，教师籍贯遍及省内外甚至美国。而在1902到1949年的教师名录中，因为我对别的科目欠缺更多的了解，单看语文一科，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人物曾经是该校的老师：经学大师廖平、历史学家蒙文通、著名作家李劼人、古典文学学者庞石帚、文字学家赵少威和殷孟伦、文学家何其芳、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刘咸荥和林思进、唐诗研究学者刘开扬、古代文学学者龚向农和周虚白、文献学学者罗孟祯、刘君惠等，真可谓一时俊彦云集，均为吾蜀一时之选，有的甚至闻名全国。他们大多除了教书出色、育人有方以外，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学术特长，我收藏的他们的专著都不下几十种，大多颇有见地，有些甚至仍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而反观当今的石室中学，虽说也有优秀的老师，甚至有现在比较出名的语文老师李镇西，但要跟彼时的群星灿烂、人物纷起相比较，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名师延聘在过去端赖校长的号召力，学校的发展空间对老师的吸引力，以及薪金的多寡来决定。聘用双方签约，权利与义务一

经谈妥，上课的质量，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管竞争多么激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师的去留。不特此，老师有专职和兼职之别，专职者和兼职者在薪水上固有区别，但最重要的是形成去来自由，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良性竞争态势。而兼课者多半是在各大学里延聘的名教授、名学者，一来增加讲课吸引力，增加学校的知名度；二来为整个学校树立一种爱学习、勤研究的风尚；三来也可让学校的年轻教师与这些名教授、名学者往来，增加自己研究和讲课的经验，无形之中起着一定的培训作用，并形成良好的学校风气。可是当今中国的学校，学校是如此的封闭，教师一进学校，就被包下来进入了一潭死水的小单位，不与社会通声气、相往来，不能达致社会与学校在各方面的有效互动。更不聘请也不允许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到学校兼课，很好利用社会资源，以弥补师资不足之症结。如此一来，造成了与教育有关的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激活学校固有资源，而且对学生开阔视野，培养人文气质极为不利。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技术性难题，现在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而且更为不堪的是全国统一高考。我曾经写过一篇《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的文章尽申此说。高考是需要的，但全国统一就毫无必要了。民国时期每一所高等院校都是自行招考，时间不尽一致，有极大的自主权，学生也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对所有人包括当事各方都尊重的多赢局面。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以前那些文化名人，为什么一会儿被这所学校录取，一会儿又被那所学校录取，最终选择某学校

的佚闻趣事。我认为扩招也罢，其它改革也好，如果真要推行素质教育，首先得如此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良好的对接，才不至于学生无学校选择之自由（一年只能考一次成本昂贵，代价巨大，谁的青春永在）；教师有选择教材和讲授教材的自由（或者自编教材），才不至于毫无见解、照本宣科；同时学校也因要为自己招收的生源的毕业后就业出路作选择，就不会设置一些根本无用的专业，而是办出自己的特点。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职业技术学院，没有特点的话，就会像庄臣广告语一样：蟑螂死光光。

变全国统一高考而为每一个学校自行招考（考题及招生计划在教育部备案就行），增加学生考试的机会，这样就会使扩招所带来的实惠变得名副其实。如此一来每个人的自由度皆得以发挥。延请名师，自编教材（教育部或者省教育厅备案即可），学生自由发挥，才可能诞生真正的名校。目前许多所谓的名校只不过应试教育中考试有名的学校而已，除了比别的学校多考上几个大学外（这些重点学校很多一年只放一天半假的是常事，奴役老师和学生，这样的名校休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名校云乎哉。

要言之，在我的眼中，当今中国没有真正的名校，只有披着名校外衣的应试教育“集中营”，必须加以改革，才可能诞生真正的名校。

2003年1月18—24日凌晨于成都

第四辑

散布可能的风景

对《热烈欢呼王小波去世一周年》的修正

朋友张打田是个王小波爱好者（他正在筹备“王小波爱好者协会”），自从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一直注意一些特别的动向，深入各地，广搜资料。他说，有人在王小波去世消息见报的当天，便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大有急不可耐的味道。不特如此，我还嫉妒打田的“倒行逆施”，将自己的调查报告命名为《热烈欢呼王小波去世一周年》，而且指名道姓地点出这些人。打田从来不以发表为荣，而且知道我是个贪名好利之徒，因此他将自己的资料无偿供给我使用。我据此略加敷陈，省略其间那些指名道姓的考证，适当增删，公之于众，以便读者明鉴。

其一，花剌子模国君王，刚听到王小波的名字，便以为是宋朝那位拉杆子的山大王，吓得发抖，后来得知其外表虽魁伟，却系一书生，谅他也不敢送来坏消息。但王小波偏不信邪，送来无数条说国王必死的坏消息，国王赶紧让其直属的宣传机构认真商讨对策，否则全国都模仿王小波，将会坏事且不堪收拾。反击的方案尚未出笼，上天已将王小波收去，国王在宫中大仿金圣叹，连说五十天“不亦快哉”，至今仍在幸福之中。

其二，前几年，中国盛产只对钱不说不的“不先生”，弄得全民

神魂颠倒，一会儿对美国说"不"，一会儿对日本说"不"，只觉得自己无限正确，堪与全世界对抗。王小波拿住他们的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猛烈洗涮，直到大家看到"不先生"们一身不甚好看的臭皮囊才善罢甘休。"不先生"们因此灰头土脸，状若耗子过街，因之对王小波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有人采访"不先生"们对其论敌王小波的看法，他们语调抑扬，面有得色地说："我们本来想与他决一死战，哪知他竟然害怕，不打招呼先走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其三，读了几本古书的国学家，常说大千世界无不尽备其中，状若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王小波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受益，只会据此得病，"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会变成一种妖怪"。如此一来，不只是国学家对他大为不满，就是就业管理局也甚为不快，因替国家分担一些下岗的国学家，比如"红学"研究上的疥癣也是转型期的一部分，实乃增加就业渠道之一种。从下岗位置上起死回生的国学家们将一面锦旗送到就业管理局："给人衣食如再生父母，替民昭雪似转世包公。"

其四，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因自己是同性恋者败露而自杀，王小波说我要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就会劝他"无耻"地活下去。同性恋者们当然欢迎他的友情援助和科学研究，但毕竟不合主流社会之节拍，更不是不加怀疑的、羊随大群不挨打的"大概率价值观"的支持者。那些自封的道德洁癖者就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千上万的好人好事不去研究，却专去研究那些下流的东

西，你只好快速自绝于像我们这样清洁的人民。

其五，哲人王在中国的市场占有份额极大，就像某种垄断产品一样，有着不需竞争而获得的天然市场。经常有些人要求我们像不须论证的几何公理一样去信任他的教导，所以我们不仅要崇拜圣人，而且还要把庶民也放在圣人的等级来加以要求。更为关键的是，总有些哲人王设计好一些圈套非逼着我们往里钻，当然也有些哲人王要通情达理一些，他们弄懂了升斗小民的一些内心想法，便变着法子将其神话起来，各种气功、神医便是这样的结果。结果有一气功组织出来发表声明，声称对王小波的去世负责。但负什么样的责他们并不明说，只是说王小波的死与不信他们的气功有关，你看柯云路就活得尚好。

其六，分明知道"自由"永远不及"一句顶万句"顺耳，王小波却偏要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考证自由派是否始自王小波，诚然是件煞风景的事。但自由派的命运一向不大好却是明摆着的，以前的储安平、罗隆基、王造时、殷海光等均是如此。王小波的死固然不必安排在1997年，但像他这样绝顶智慧的人物都犯了过分乐观的毛病，令人遗憾。"因为自由是远远等不到结成派的，就像王小波尚未完全开放，便英年早逝在世界的暗处一样，此实乃宿命，原本怨不得他人，自由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含着不可名状的毒气。"这句话摘自《论王小波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渊源》，此文即将刊发在"王小波爱好者协会"主办的不定期打印本刊物《思维的乐趣》上。

其七，王小波死后，很出了些作品，各媒体也给予了大量报道，然后就有人欢呼王小波死得好，死后备极哀荣。有人说这是一种比魔鬼还恶毒的说法，在媒体时代，好的东西不宣传也会被淹没在信息垃圾之中。张打田说："其实罪不在王小波，而是媒体本身的双重刻毒所致，他们要么不宣传你，要么把你宣传到让读者厌烦为止。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号召大家与记者作'斗争'。事实上，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是媒体永远无法宣传到位的，王小波死后遭一些恶性宣传的'三鞠躬'，然后再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戮尸'。"

其八，关于上帝，我们都知道尼采是位急匆匆的报案者，因为他说上帝死了；关于王小波，上帝成了一位过分幸灾乐祸的报案者，因为他说王小波终于死了；有读者说，上帝对中国硬是不公平，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把什么拿走了。其实对此上帝还委屈呢，他说："王小波不死去，过不了多久，你们顶多只承认我是个叫王二的人，而不是什么上帝，王小波的想像力好到让我害怕的地步，我赞赏他死得正是时候，他放了我一马。"

1998年4月6—8日于成都

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论

一

流沙河先生20世纪50年代因大毒草《草木篇》荣登钦点，贾得大祸，得大右派之大名，此项殊荣，诚非其所能预想，更不是他想争取的呢。对此，劫后归来的他曾不无幽默地说：《草木篇》并非写得如何，全靠毛泽东做广告，一次又一次，共做了四次。每次几句，一共十几句。一句又当一万句，共十几万句。这样的广告做下来，谁也得出名。他本想努力歌颂新社会，做一名忠实的"歌德"弟子，但是，所谓"歌颂"的权利尚未配发给你，你便去挠其痒痒，弄得当权者好不耐烦，就说你流沙河挠痒术不精，居然将其皮肉抠烂了两块。遂入另册，差点套用祖宗的雅辞来说"永不叙用"，尽管他并没有当什么官。在集权制度的淫威下，一只鸡和一个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何况他也不可能比那只乐天派的鸡更有城府，深谙别人请君入瓮的韬晦之法，一不小心就犯了"响应号召罪"。年年到了腊月下旬，四邻忽听雄鸡报晓。听那多声部的轮唱，叫得好欢。Y先生说："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啊，晓得不晓得，要挨刀了。"（《Y先生语录》第378则）这就像美食家车辐老与流沙河先生同当右派时一起拉车，流沙河深知彼时的右派是"人人畏我，我畏人人"，而车辐还

是拉着车，一如既往地沿路与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扬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文人拉车记》）

接下来便是学习改造，拉车解锯，劳其筋骨，清洁精神，就像花木断掉一切水源，刨掉其营养根基的土壤，抽空他活着的伦理基础，号召家人与其划清界限，加以检举揭发，孤立其身，宜乎郁郁而终。哪知他竟从这万劫不复里逃了出来，捡得小命一条，还能看到那些整人者的下场，他有联赠一右派同学：“潮停水落龙安在，云淡天高雁自飞。”细品之下，其味无穷，尽管个中典故洵非三两句话能够说清。但他并非豪语大言之徒，且深知人生是一场亦悲亦喜之戏，人人都只不过是其中的傀儡，太过老实迂阔，以至胶柱鼓瑟，徒惹人哂笑而已。下面这副对联很是表达了他无奈的超脱：“尽历沧桑身犹在，重过黄粱梦已无。”20多年苦役下青春的惨损，无处申诉，无处可辩，即使可辩，又从何处赎回。求得一个无罪，于我们已属万幸，感恩戴德，几近涕泗滂沱；山呼万岁，只差皇恩浩荡。至于在法制之下的追讨精神损失费，就免谈了罢。

人生受过大劫，有的人憬悟出苟世之方，有的人明白了晋身之阶，而流沙河则明白了人骨子里面尤其是在集权制度下的渺小可怜，于是便不懈地自嘲，亦笑蝇营狗苟之徒的贪婪鄙吝。他在1985年以前所写的文章还较中规中矩，讲述新诗，更多的是不忘载那种相对正统的道（后来就有点拒载的意思了），因为在他再度解放后，其对主流话语的认同态度与遭罪以前并没有多少分别。这种实

情在他后来的认识中有很好的表述："适逢改革开放，拨云翳，见青天，欢忭若狂，喜我青春之复归也。有组诗《故园九咏》谴责旧时期，有长诗《老人与海》赞美邓小平，自觉歌颂当今改革，若使命在焉。"（《Y先生与我》）比如他在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评介余光中、洛夫时，均带着批评性的语调说他们的诗，消极悲观，惊人的厌世。其实正常的人没有任何时候都积极的理由，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只有那些浅薄而狂热得发烫的所谓革命派才随时处于向上爬的积极状态。流沙河之所以于生存环境有了不少的怀疑精神，那是从"文革"后期就慢慢发芽而生长出来的。有了怀疑精神，人就或多或少地具备了现代人的气息，不再盲目崇奉什么。流沙河自复出以降，其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与日俱增，1985年，在不学如我看来，却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期。其下笔之吊诡犀利，嬉笑为文，直指现时社会的肮脏痛处，散淡看世，体察当下人文的委顿无骨，洵非往昔可比。譬如反思自己右派生涯和批判"文革"生活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即是此中扛鼎之作，应与巴金反思"文革"的《随想录》一同看待，即使现今看来也是同类著述中的翘楚。其它尚有被学者冯川称为"动物列传"的诸随笔《祸延羽族》、《弱肉强食》等，不乏以动物喻人的诙谐之章，特别显示出他诗才与史笔的完美结合，读后真是让人大快朵颐。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流沙河80年代中后期迭出的随笔佳什，便不难发现他日后要费心意译《庄子》而成《庄子现代版》，随即又创作集笑话、幽默、讽刺、批判于一炉的《Y先生语录》的大致线索。

他在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时讲到羊令野的《蝶之美学》便发挥道：“这只雄彩蝶记得自己曾经是睡眠的蛹，无知无觉，后来化蝶，在春天里忙于采花。它飞入过庄周的梦境。它逃脱了香扇的扑扇。它游戏了一生，现在虽死了，仍感到满意。当然，给钉在标本盒里不能飞了，但可读读《庄子·逍遥游》，想象一番鹏鸟自北冥飞往南冥是怎样的快活，也就等于自己在飞了。”但流沙河先生说这样的人生观“未免悲观，不足取法”，这也是他80年代初期思想的真实反映。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日后面对同一材料而发生的不同的思想转变。尤其是他带自传性的随笔《这家伙》，可以说是奠定了他日后行文风格的一篇典范之作，进而生发出他嬉笑针砭，自嘲他嘲的文章格局，并由此批判现实社会的荒诞可笑，表达自己的诗人之思。《这家伙》以第三人称述己事，不受第一人称行文记事时的羁绊约束，显得佻达跌宕，嬉笑甚至怒骂也就是顺乎自然的事了。“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乌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接下来便嬉笑地证明“说他是诗人，我表示怀疑”，“真他妈的见鬼！我相信年轻人决不愿意读他的诗。历史将淘汰他，无情地！”这样的文章，倘若以第一人称写来，就会变得滑稽与矫情，虚造之笔溢诸纸墨，扑人眉宇。但使用第三人称确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又有说部的善置悬念，还将自己从单一的主体中分裂出来，以客体的身份观照自己，此乃识人及为文之分身术：“这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

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好为吊诡之文，善创神秘之章，喜弄分身之术，乐玩叙事圈套，潜泳于古今玄妙之事，浸润于莫比乌斯圈的“自咬”。博氏喜读《庄子》，何尝没有庄周梦蝶的自我物化之感，因而有《博尔赫斯和我》、《另一个我》、《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诸文，既似小说亦像随笔，模糊了文体疆界，取得诙谐佻达而又让人深思的效果。流沙河的“我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也只有如此，“我”才能够看得见“他”，“我”并不完全是我，也有可能是“他”。如是观之，自嘲何尝不是他嘲，反之亦然，此乃笑天笑地，笑古今一切可笑之人，包括自己。古人乃至今之落后民族的临池一照，以及自此之后发明的镜子，均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进步。镜子的照鉴功能，正是人类得以窥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的工具，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免落入皮相的窠臼，但人类自此会减少些许黯昧与自大，认得自己的可怜渺小，“这家伙最怕我”，“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但如果有人据此断言流沙河的自我调侃取法乎西，那就未免太过草率，我们只是说文化上的不同之同，开人眼目而已。吾国历代幽默笑话、反讽自嘲甚夥，且不说东方朔、纪晓岚诸辈的诙谐冷趣，就是在许多古代文人骚客的自为墓志铭、自题小像里也不乏像《这家伙》的自我贬损和风趣，这就是说流沙河的“这家伙”不免受历史上诸多前辈“家伙”的直接沾溉。戏曲家钟嗣成曾夸张自己的丑是“有朝一日黄榜招收丑的，准拟夺魁”（《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画家徐渭自污是“龙耶猪耶”（《自书小

像》)；思想家李贽谓自己“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自赞》)；文学家张岱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诚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仅堪覆瓿。这人耶有没有用？”(《自题小像》)诗人流沙河说：“有喝倒彩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这家伙》)

这实足的自我贬损里，透露出非比寻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愤，以及无奈的自嘲，也可说是对社会变相的批判与宣战。鲠骨之言以嬉笑之语出之，更能获得出人意表的效果，让人铭记在心。正如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们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伪君子·序》)流沙河在“文革”时经历过无尽的污辱和被动的自骂：“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从这样的人间地狱活过来，还有什么不能嬉笑怒骂，调侃反讽的呢？自然能主动地看到自我的渺小，进而调侃戏谑，非心理健康，历尽沧桑，看透世相，洞察人生，佻达善谑者莫办，如此才知道自己原系一“家伙”耳。

二

林语堂先生说：“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

之虚空、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吾国与吾民·幽默》）流沙河亦是在识得我们人类自身渺小愚拙和现实社会的可笑后，才以幽默讥刺的文章讽世的，亦系一幽默大家也。沐改革开放之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来，众多主义加入社会对文学的大合唱，批判反省及理性的启蒙，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声音相对多元，一时蔚为大观。稍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的声音愈加萎缩，社会批判的锋芒收敛，空洞霉腐的说教泛滥起来，在我们这个法制尚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国度，知识分子又不能对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弊端作正面的肉搏，但是知识分子又必须发出自己独特而理性的声音，找准自己批判社会不公的支点。流沙河先生选择了“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的庄子来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针砭讥刺。“拖古人到现代来讲话”，于是《庄子现代版》便应时而生，继而《Y先生语录》也就势出笼。从他由诗贾祸到新时期复出以来，他自述均以歌颂为己任，“若有使命在焉”，后来终于醒了，将歌颂视为“此或一厢情愿之态，今已矣，不说了”。但要看流沙河思想之突变，我们怎样分析，都不如他的“自供状”来得真实：“洎乎八十年代末期，经济改革独足跳踔之弊，渐渐凸显出来，怵目惊心。吏治之不谨也，袖风之不清也，世道之不靖也，社会之不平也，政策之不定也，民主之不行也，文明之不振也，公德之不兴也，使我觉得自己没脸，不好再去歌功颂德。”（《Y先生与我》）

好一则“自供状”，真是一篇声讨社会不公的檄文，虽然社会之腐败不能因此传檄而定，但深得民心是不言自明的。流沙河深知不能用豪言壮语来改世，便用《庄子现代版》来曲线讽世，“著述过程亦即角色改换过程。秃笔一枝，不能改革现实，却能变革自身。古今文人皆享有此种蛹蜕之方便，这样他才活得出来，使斯文一脉不至于断绝。要说软弱，也是。”（《Y先生与我》）其实这并不是软弱不软弱，而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找准自己应对现实社会的支点，不然下面的话你就不好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躲避的权利。软弱者怕自己一身弄脏，他只好躲避了。”这比任何惊天动地的对社会的批判更生猛，更锐利，更可笑，非说真话的真汉子能出此热血之言和大幽默吗？若以笑话看这污浊之世的话，我相信流沙河先生以上的言论与画家黄永玉先生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老汉我因为胆小，遇到好笑的事情总是采取一种战术：‘笑得赢就笑，笑不赢就跑。’倒是很少吃眼前亏的。”（《吴世茫论坛》）自然，方巾跬步之徒，内心霉腐之辈，佻达不雅他们是不敢的，但卖友事仇的能耐却是大大的有。所以爱嘲讽讥世之人，遇到这种人就只好“笑不赢就跑”，实施那最后剩下的唯一挡箭牌“躲避的权利”，好在现今要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确实不那么容易，地球村毕竟是大家的啊。

杜牧有诗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插得满头归。”现实你不能改革，你就只有笑笑而已，否则就只有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苦命。何况你跟别人讲正规的道理，他未必领情接纳，这一点流沙

河在《Y先生语录》第43则就有披露，应看做是他写作《Y先生语录》时总的创作心态的显现：

会场气氛严肃。Y先生打个吼响的呵欠，惊动四座。

有同志问："你在干啥？"

Y先生答："演正经戏，容易疲劳。打呵欠发出放肆的声音，觉得全身舒服。"

开会仿佛成了有些人的必修课，但像现在这样文山会海，无度地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从古至今，确是闻所未闻。成天开会的人，演这种正经戏，很少容易疲劳的，他们是越开越欢，说白了就是利益驱使人。就像一位猝死在会场的官员，他如果死而复生，Y先生揣度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他会跳起来，挺起肚皮吼，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了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第331则）毕竟是Y先生，就像吾蜀已故作家贺星寒所创造的方脑壳一样，爱说大实话。贺星寒在《从庄子到Y先生》一文里，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流沙河从《庄子现代版》到《Y先生语录》写作时的心路历程。惜乎该文刊布时，被删其大要，否则更能见出流沙河先生在非常时期的铮铮铁骨和忧时伤世之心。

"庄子不官不僚，也不运动社会"，"布衣草鞋，糁汤野菜，物质贫困，精神自由"，既像Y先生，也是沙河先生的化身，尤其是"他只躲在陋巷著书，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更是他著

书讽世的真实写照。流沙河实在是庄子的异代知己，思接千载，此之谓也。“我是漆园一树苦李，皈依自然，礼拜庄周，所以痒志早已销磨，遇事退让三分，总觉得眼前的都是梦。”（《读〈文革大笑话〉》）我们看出《庄子现代版》对《Y先生语录》施以的影响，更可看到后者承接着前者的余绪遗泽而来，也就是批判社会，幽默讽世，在书中珠联璧合。兹举三例，以窥一斑：

标本一：汲收民间的营养，反映民意。一个诗人，宁愿做一个劝世讽时的采诗官，也不写那些不痛不痒，歌功颂德的诗句。关键是愈从民间的角度愈能看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Y先生说：‘你从高处俯视，他们戴着堂皇的冠冕。你从矮处仰望，他们未穿遮羞的裤衩。地位愈低，愈能看清真相。’”（第235则）时间相隔千年，社会同样的腐朽，怎不让人太息久之。

“所以古人留下格言：‘政策向下传达，不要层层加码。百姓负担已重，不要变相逼他。’”（《庄》P52）

Y先生说：“商怕赔，贩怕税。吃请不怕伤胃。女怕肥，男怕退。懒鬼不怕开会。”（第55则）

标本二：人生如梦，其实很多自称高尚的东西又何尝不是南柯一梦。博尔赫斯在《圆形废墟》里描写一个人创造了一个儿子，但他哪知自己只是别人的幻影呢，而这幻影还是别人做的梦，博氏将其

写出来，他何尝又不觉得是自己在做梦呢？《Y先生语录》里第176则Y先生想起自己的中年忧患，遂唱起《列宁山》到《语录歌》，说巴不得自己唱的是“一串梦”。其实关于下面长梧子这段话，流沙河早已在另文里作过详述：“我的憬悟也许只是梦见自己醒了，而不是晓得自身仍蜷卧黑甜乡，‘大梦’还长着呢，真醒还早着呢。如果真是这样，过去我写的小笑话，现在我写的这篇序，以及刘济昆写的这本大笑话，岂不都是成了蠢人的梦话？天啊，不能是这样，不应是这样，不愿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使人寒心了。”（《读〈文革大笑话〉》）其实老庄的思想又何尝没被圣人其表大盗其里的人尽情利用呢？使人寒心而栗的事，又岂止是“‘大梦’还长着呢”这一端！

长梧子说：“人生无常。有一夜，梦饮酒，好快活，哪知早晨醒来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哪知早晨醒来出门打猎，快活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中梦是凶呢还是吉。后来梦中梦醒了，才晓得那是梦啊。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蠢人醒了，自以为真醒了，得意洋洋，说长道短，谈什么君王尊贵啦牧夫卑贱啦那一套，真是不可救药的顽固哟。”（《庄》P34—35）

Y先生睡醒，猛想苏联就这样亡了，不免悲悼，乃躺在床上双脚蹬拍子，高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唱得热泪盈眶。唱完爬起

来，双脚探鞋子，仰天叹息说："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第16则）

瞻仰先烈墓园，发现园左开起豪华夜舞厅，园右筑起超级洋酒楼，Y先生说："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既然如此，只好如此。如此如此，终于如此。"（第68则）

标本三：支离疏是残疾人，按庄子的思想是不成材，反而容易长寿。"Y先生忠告普天下女郎说：'矮身材，低智商，相貌平常，嫁人多半美满，终身可望吉祥。'"（第84则）但支离疏的举动还是有点像某些号召别人捐躯当烈士的人，因为那是不费什么油盐的，分明上不了战场，还要鼓动别人去当炮灰，既可高喊爱国口号，赚得极好的名声，还可获得实际利益的褒奖。庄子据此还另有表述：庙祝给猪仔做思想工作，劝猪光荣牺牲，不要悲伤，猛起吃食，"我要用，精饲料，款待你们，整整，三个月呀！不仅此也，为了配合你们，届时，我将，十天不睡女人！三天不吃肉荤！这样总，对得起，你们啦！还有，请允许我，预先通知各位，一个，特大喜讯！你们光荣之后，肩部，臀部，要分别放入，彩绘的祭器！还要铺垫白茅！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我想，各位一定，非常满意，是不是呢？好了，谢谢大家！"（《庄》P253—254）。连断句都像一个无耻老政客的口吻，"杀身成仁"啦，天下还有比这更幽默更煽情的演讲吗？圣人是强盗的响箭，信然。的确，许多人是假爱国之名而行狭隘民族主义之实，大言不惭地喊"中国可以说不"的人应作如是观。就像Y先生

“要办《丰满报》，提倡兴肥灭瘦，推广日本相扑”一样，他的目的是，“以弘扬我民族固有之富泰形象，要为中华添膘，压扁洋人。”（第259则）更像“两家打架放大就是两国交兵”一样可笑。

庄子用一批歪瓜劣枣——跛子、独脚驼背、啮缺、支离疏等残疾人——来批评显贵的儒家，就把孔子给耍弄了。因为在庄子看来，就连这些并不算健全的人，即下人之质都能知道儒家宣扬的空洞大道理的可笑，独独像“至圣”孔子这样的人要装样子，不明白其间的道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流沙河先生也认为，社会的腐化堕落、虚套无聊，人人都知道而不愿说出真相，得一Y先生（贺星寒的“方脑壳”亦应作如是观）而天下大白也。脑壳方，说明微有残疾，无论是智商还是身体；先生Y，表明不像正统的“正”，来路不正，伪劣产品，或发Y言，就是身体（语录里有一则透露他身高只有1.44米）智商上均不是上上之选，独独他能披露出这些人间非常可笑之事。《庄子现代版》到《Y先生语录》不只是有一条能通达的暗河，而且一脉相承。“Y先生举左手，展开五指，说：‘长长短短，世界多元。’又举右手，展开五指，说：‘重复一遍，历史循环。’”（第65则）两千年前至今日，看似漫长，变化极大，生龙活虎，但其间的堕落霉腐，何尝不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循环！

庄子嘲笑儒家亦自嘲，Y先生嘲笑社会亦自污，关键在于他能把几千年的历史搞懂：“Y先生大街上看河南人耍猴戏，笑够了，对三只可怜的猴子说：‘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我笑你们，也笑我们自己。’”沙河先生好像不是在研究进化论。

三

从《庄子现代版》到《Y先生语录》，其间新释过几十则《阅微草堂笔记》，还写过三篇短文。其一为《尴尬二十四》，其二为《可怕的曾国藩》。前者可视为《Y先生语录》的前奏曲，描述了吾人生活之普遍情状，于今有几人能免尴尬？后者可看作是《庄子现代版》的余绪，因为曾国藩的那套正是庄子猛烈批判的。曾国藩对下属和家人的训诫，洗脑手段，被后来那些"独服曾文正公"的人学着，并发扬光大了曾文正公整人的伎俩和花样，其酷烈之程度，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倘若庄子在世，肯定与流沙河先生有同样的感受，他最终也会忍不住说："啊，多么可怕的老师啊。"

庄子不愧是嘲讽取笑儒家之老手，"鸡有正德，天下无敌"。依我的理解便是，越是瓜娃子，越能在装神弄鬼的表演中修成正果，因此也就"有好多人在表演倒挂金钩"。楚国的一位养德之士温伯雪，讽刺虚伪的儒家："他批评我时，眼泪汪汪的，一心孝敬，就像他是我的儿。他教导我时，装模作样的，满脸正经，就像他是我的爸。"（《庄》P279）猛起灌粪，不管民众需不需要他那可恶的大粪，这样的人要遇到一点这样的尴尬："沿街讲演文明礼貌，忽被舞女揪住不放，追讨夜合钱。"（《尴尬二十四》）当面拿下他伪装的面子，才有可能闭起他那大话假话一大套的鸟嘴。"庄子论道，道在屎尿"，"庄子借粮，被人戏弄"，这样的说法，岂止有趣

得紧，自嘲得要命，简直可让人笑掉大牙。自然，Y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嘲笑那种死活不肯退休的“四化”干部时曾说：“一是头脑僵化，二是品质腐化，三是脾气恶化，四是等待火化。”该同志大怒，“向上级诬告Y先生动乱。Y先生说：‘再加你一化，整人公式化。’”如此不可救药的“五化”干部又岂止是个别的某同志，简直成了以整人为要务者的思维路径和肖像写照。

流沙河先生的幽默讽刺自然除了承接庄子的滋养外，还与我们有比较发达的笑话基础有关。所谓笑话基础，并不是指我们的民族比他国民众更具幽默讽刺的细胞和笑的神经。古语云，蓄势既久，其势必猛。推而言之，就是被专制统治压制得越久，民众的声音得不到释放，不能上达天听，即便有幸上达了，也是充耳不闻。于是吾国历来盛行政治笑话，被压抑得过分灾难深重的民众要找一个出气筒，再也没有比民谣和政治笑话更合适的了。复次，性压抑，促使黄色笑话的蓬蓬勃勃，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无不会贩卖几个生动的黄段子。继之，文人笑话，汲得民间笑话的营养，或者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可笑之处，颇具批判讥讽色彩。总之，关注弱势群体，间或嘲弄民众自己的可笑之处，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笑话，更高一层次的幽默，乃至讥刺反讽，都是我们压抑无聊生活的一种心理上的补偿，也就是寻得一种活下去的平衡和依据，对专制制度无法正面对抗的逃避，即所谓“逃避的权利”。

研究笑话的学者余德泉对笑话的艺术手法作了详尽的分类，计有诗诮、露底、学样、对偶、谐音、夸张、替代、袭改、飞白、层进、

矛盾诸法，共42种之多，而且他还说远未穷尽（详见《笑话里外观》）。我们没必要在本文内详尽流沙河先生所用的有关笑话的艺术手法，仅略作举证，以尝鼎一脔。

标本一：看事物之大处，画龙点睛，且趣味盎然；所谓的诗亦近乎打油，顺口捏凑而成，谓之曰诗诮法。此则对五四运动后科学民主之不继，用反五四精神的“封神榜艺术园”来纪念五四，用敌人来纪念自己的生日，因矛盾而生笑，由笑而生慨叹。

纪念五四运动，Y先生游览了封神榜艺术园，题歪诗于留言簿云：“新文化最终熄灭，新青年总算死绝。科学与民主，镜花里难折。白，白，白。”（第222则）

标本二：于生活中无意或有意将事物的本来面目在最后暴露出来，且极具可笑性，颇类相声的“抖包袱”，此之谓“露底法”。此则将桑拿这种前几年才新兴的行业，用通俗的语言道出，而又不触及该职业的名称，使不知者疑窦丛丛。看谜面类似一折磨，而水落石出，才知道是最新之高档享受，且去者腐败分子居多，令人喷饭。

Y先生招我过去，认真说：“这世道，真他妈不像话，我有一个老同学，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引入密室，全身脱光，挨一顿打，被捶

被擂，被搓被推，被扇被掐，被捏被搂，还被那女人骑，还被那女人踩，到头来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还要倒贴一大笔钱，够你吃三个月的伙食。你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当然不明白。Y先生大笑说：“桑拿浴按摩呀！”（第239则）

标本三：一个人有意无意模仿另一人的言行动作，由此而产生笑料，谓之学样法。此法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子打子，借力发力。后者对付前者的逻辑或办法，就是直接从前者那里学来的。这则便是此中典范，吏治之臃肿腐败，人浮于事，甚于言情小说中的所谓“滥女人”之拥有七个男人。而官府中人愚不自知，正在侍候这个若“滥女人”的“滥官位”，甘之如饴。

有老战友在教育局当第五副局长，读了一部言情小说，在茶座上大骂：“一个滥女人，有七个男人，太不成体统啦！”

Y先生说：“一个名誉男人，一个正男人，五个副男人，（其中一个常务副男人），加拢来七个。”（第245则）

流沙河不只是笑话让人笑倒，而且他对笑话的阐述亦深见功力，这在《序〈高级笑话〉》一短文里有非常精到的议论。他幽默地说，大家公推他作序（因为此集系包括流沙河笑话作品在内的多人合集），是因为他“可笑性很高”。文章之始，开篇即说：“一群有聊文人，爱讲高级笑话，这是为什么也？四十年来，他们目睹种种可笑

之事，默记在心，当时不讲，亦装瓜卖傻也。混到今日，笔舌痒痒，不讲不快，亦不晓得为什么也。”当时不讲，装瓜卖傻，诚实情也，因为这是活命之方。此文与《读〈文革大笑话〉》均作于1989年愚人节，国产的。肝胆与热血兼备的人岂能一笑而了之耶？实乃“笑可笑，非常笑”也。他戏谑地说到笑话的用途：“今后遇事，若不顺心，一笑置之可也。闭嘴目笑，掉头暗笑，拈花微笑，拍桌大笑，岂但可以治病，兼可强身，诸君不妨一试也。”关键是“何况愚妄之徒，到处表演，不能不惹人笑也。‘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竟代代而不绝也”。

创作《尴尬二十四》和《Y先生语录》之前，已对笑话有如此高妙的见地，因而流沙河后来创作的笑话，在谐谑、嗤嘲及与人为善方面类似淳于髡、东方朔；在“烧腐朽，烛黑暗，笑声点燃一把火”方面则相同于果戈理、谢德林；既有卓别林、侯宝林的亦庄亦谐、有泪有笑；亦有吾蜀前辈文人刘师亮的辛辣。刘氏系成都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善谐联谑文，出过《师亮随刊》，著有《师亮谐稿》。如他讽刺军阀杨森强奸民意，强行拆民房修路的对联，就极尽讽刺唾骂、诙谑双关之能事：“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民房将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总之，“根本是人道主义也”。而且《序〈高级笑话〉》一文最后更是以排比之势，迭出其笑料，固有洒脱与超然，亦深蕴沧桑与无奈：“继往开来，便是正路，不管你反对不反对也。笑愚哂妄，便是启蒙，不管你小看不小

看也。文人有聊，便是君子，不管你尊重不尊重也。笑话高级，便是文学，不管你承不承认也。读者嘉纳，便是金奖，不管你来不来钱也。”他其实在笑世的同时，更是少不了救世之心，尽管他深感自己的渺小。

“好笑”的黄永玉先生说，讲笑话最怕碰到老实听众。自然像我这样对流沙河先生的笑话刨根究底的人，也可称得上迂阔之老实听众，偏要将那生动活泼的笑话说出个严肃的道道来，即便不是佛头著粪，也算不得个会心的解人。倘若真要怪罪的话，还是要怪沙河先生自己，因为他的笑话实在是“笑可笑，非常笑”。“恐怖”的黄永玉先生又说：“听笑话最怕老实人讲听过的老笑话。……老汉我心里十分十分之着急和难过，不知道他讲完这个笑话之后老汉我如何笑法才好？老汉我实在笑不出来，但不能不笑……我多么希望到时候能笑得前仰后合，但怕不能。”（《吴世茫论坛》）《Y先生语录》里更多的固然是使我“笑得好”，而且让我“笑倒”的笑话。但偶亦有类似“老实人讲听过的老笑话”，小子不慧，笑不出来。好在这是面对书本，而非当面聆听，小子笑不笑得出，沙河先生也不知道，没有幽默得“恐怖”的“黄老汉”尴尬。

1998年8—9月于成都

谢泳的研究

我以为知识分子，都应该对谢泳近几年研究知识分子道路随手写下的学术随笔，其间所蕴含的做学问的研究方式及其成就表示出足够的关注和尊敬。应引起足够的关注，是因为他剖析20世纪以来许多大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分界线的变化基点和命运轨迹，而他们的蒙羞受辱和伤心衷曲又命中注定成了民族苦难的一份祭献，因为“民族的苦难最终是要体现现在生活在那里的一切人身上的，当然也就包括这些读书人。”（见长春出版社《学人今昔》序）而值得尊敬的理由则是，他对这些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并不是意气用事地为了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存在为某一人的遭遇打抱不平的乡愿，这是一种难得的理性与激情兼备的、具有超越性的人文性关怀。就像他所赞赏的哲学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申府1948年所写的《呼吁和平》一文一样，只管论其是非，不管其成败利害。不特如此，而且我认为，知识分子还可以从他的研究里受到鼓舞并获得教益。

说到他的研究方式，便不能不说到他切入问题的独特角度，他的研究总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小题大做，大题小做”。你别小看这种对研究对象的切入方式好像并不新鲜，但就是这点，不仅我们过去以论代史的余波并未止息，事实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套在“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先入为主的框架里出不来。谢泳的研究是建立在细微的分析和个案的解剖上，而不作没有根据的大言玄玄的悬揣。对此，我不能说目前谢泳的研究做到了上佳之境，学问的根底也未必有他的研究对象们深厚，但至少是追步（或许并非有意）于下列诸位先生的研究范式而精进的：美国的两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历史研究和黄宗智的经济史研究，前者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后者著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黄宗智还提出了著名的"规范认识危机"理论，以解决国内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面临的窘境）。而国内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就要算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了。尽管他们所做学问不甚相同，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小题大做，境界奇宽；大题小做，锥心深入。而谢泳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在他的文章《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里有非常清楚的说明，简而言之，这是指著名报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他在1946年至1948年创办了《观察》周刊，而周刊的作者中有不少人均与西南联合大学有这样或那样的瓜葛。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种研究仿佛是几何学中的点、线、面的结合，继而在此基础上扩张和搜索，进而联系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里中间力量的生存景观及学术演变的概貌，展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苦难的心路历程。

不过，直接导致谢泳研究知识分子命运的诱因，却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右派，而且在他未成年时就死了（这似乎也促使他撰写出

像《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等颇见功力的研究论文，见其所著《中国现代文学微观研究》，北岳文艺版），所以他"对右派的精神从小就有兴趣"，而这种兴趣导致的行动准则是，"我试图进入储安平的精神世界，我选择了《观察》研究；我曾想进入傅雷的内心世界，反复读过他写给孩子的书信；还有罗隆基，为了搞清他的整个内心世界的变化，我几乎收罗了他30年代、40年代的全部言论，对这些右派的兴趣使我选择了眼下的课题：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旧人旧事》P170，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确，谢泳思考的并不是那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的学术问题，他要思考的是，像两个物理学家"叶企孙饶毓泰的死"带给他的疑问，"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学人今昔》P18）这显然不是简单的死因探寻和追究，而是对某种造成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内在因由的思索，其追问已经直逼问题的核心，这是谢泳可贵的勇气和学术良知之所在。

越是研究自己的那些对象，谢泳越是从内心去体认和理解他们，因此他并不以事后诸葛的痛快和凌驾于当事人的得意来进行学问研讨，而是竭力去理解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对社会的不适应，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但这并不成为他对那些知识分子回护的理由，相反，"过去那些旧学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在50多年以后再看，我觉得他们是不糊涂的，但理论上不糊涂，不等于行为上不糊涂。"（《学人今昔·序》）显然，他对知识分子在特定境况下的一些言论举止还是持有某种保留态度的，比如"学习改造运动"、反右

和"文革"时期等。单看他对史学家"陈垣的转变"的评述，我们便不难明了谢泳鲜明的态度，"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岁（指陈垣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时的年龄——引者注），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学人今昔》P28）"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同上）像这样听话的人，最后依然免不了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郁郁而逝"，（《陈垣往来书信集·前言》，上海古籍版）恐怕不是归罪于万恶的"四人帮"就能一了百了的吧。知识分子从陈垣先生的命运中能自省到一些什么东西呢？我想这比我们单纯思考陈垣先生个人的命运更有意义。

这正是谢泳所著各书，包括他自费印刷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专著《禁锢下的呐喊》所给我们寻常读者的莫大启迪。我们期待着他的《储安平——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和《〈观察〉研究》二书早日出版。

1998年1月3—6日清晨于成都

噫吁嚱，李太白！

十几年过去了，读大学时，吴朝义先生给我们讲解李白《蜀道难》开篇之辞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起首之句，“噫吁嚱，危乎高哉！”他开始还说“噫吁”系古蜀地方言，蜀人见物兴叹声。继而他仿佛觉得这样循规蹈矩地讲解宏阔的李太白，会受到他暗中的哂笑，于是直白地说：“哎哟哟，高啊！实在是高啊！真是可怕！”固然这算不得正规的对作品的讲解方法，但这样的不拘一格却使我终身难忘。

倘若按吴先生的意见，我这标题也是不妨换作“哎哟哟，李太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李太白确有许多使人惊异、不同凡响之处。《新唐书》列传里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端的是可以得他风神面貌之大概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他这些热爱的端绪里，延展出他一生流离失意和曲折离奇的生活与艺术的轨迹来。好剑是古代文人共通的毛病，不必说在冷兵器的攻击力日益消退的今天，只存在一点纯粹运斤成风的美学意味，即便在唐朝的文人那里也是装饰多于实用。726年25岁的李白，怀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心情，出蜀东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之类沿途开阔浩大的景象，仿佛是他这种心情的同谋，使他很快便做起许多甜美的梦来。

好剑又通纵横术，李白似乎该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了，其实不然。好剑、通纵横术及轻财重施，都是他诙诡奇特、出人意表的诗歌写作的辅助性轶事而已，永远只能作陪衬之用，万不可将之拿来世俗生活中实践。我们不要忘记苏秦、张仪之徒虽然代不乏人，但后世的人却很少取得像他俩那样的业绩，并不是后代的说客才智不够，或骗术低下，实在是丧失了游说的天然本钱，即丧失了秦始皇统一之前的思想争辩和割据争霸的天然环境。

但需附带略作说明的是，我不同意诸子百家之争鸣是出于自由思想的结果，其实是因为彼时每一个国家都没有余力来对付这些思想上的大混战，否则就无法解释，像诸子百家这样的繁盛局面在文明越来越前进的中国，为什么没能再度出现，这就是思想家顾准为何要研究希腊城邦制与春秋小国林立之绝大区别的内在因由。结果李白将所怀的纵横术，贩卖（在李白看来这是贱卖）给造反的永王李，最终是把自己给卖了——锒铛入狱，流徙夜郎。虽然李白不信这个邪，但现实哪容他那样嚣张兀傲地来铺排自己呢？他以为自己是个通才，如此幻觉真是害人不浅，没有多久，他便“拔剑四顾心茫然”了。但终其一生，像《与韩荆州书》那样的文章，像“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之类的诗，还是在不懈地作。

辛弃疾从“壮岁旌旗拥万夫”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悲壮与无奈，李白一生没能亲身体验过，或许在九泉之下，他对后于他的辛弃疾的苍凉也很羡慕吧，因为他连真正尝试自

己抱负的机会也没有。在李白内心深处一定想，即便是尝试失败了，于心也甘啊。因此，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豪情万丈，免不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牢骚。

倘若我们将李白诗歌与为人中的矛盾状态完全“归罪”于他个人，这种不公是显而易见的。李白的诗歌作品里混杂着儒、释、道家的思想，而这三家的思想并不像那些抽象而静止的研究者们所言的那样互相抵牾，相反倒有许多可能相通的暗河。不然，古代中国那么多出入于儒、道、释的文人，如同进出自家菜园子那般容易就无法解释。说白了，与其说这是集三家思想于一身，毋宁说是人生态度的变化无常罢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种典型的滑头思想，浸润着中国文人的骨髓，无非就是所谓的狡兔三窟。

但话说回来，对于在经济和政治上没有独立地位的文人来讲，只有科举考试一座独木桥（李白不肯去挤，却偏抱着安邦救国之志），而且从拥挤的桥上摔下来，淹死在水中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何况即便过了这桥，也并非万事大吉，还有无数的险滩恶浪在等着你，生存之艰辛，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残酷而铁板一块的封建独裁统治，将文人们生存的幸福和发达的指望捆绑于其上，除此之外，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求生，要想脱离它的煎逼和诱惑就并不那么容易。一个专制政府给人的生存条件和空间是有限的，它正是要利用这种有限性让大家互相争斗，告密攻讦，其统治的目的才能达到。再是狡兔，亦不过一猎物而已。

后世就李白与杜甫诗歌的高下纷争不已，其实很有些文人是借李杜之争报一己之私仇，或排斥文化上的异己，或为自己所宗奉的诗歌流派张目，暗藏着许多诗歌之外的目的。在这些纷争中，我们看到了唐代以来各路文人的多样嘴脸，模糊了李杜诗歌的面貌。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当然，他不知道从理论上说，文化应该多种中心，诗歌需要各种流派，而不是抑谁扬谁。郭沫若先生是位好做翻案文章、异举以鸣高的人，他不能容忍千百年来扬杜抑李（顶多是将李杜平起平坐）较多的情形，于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新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那里获得了异样的青睐。这样的青睐并非完全出于诗艺的需要，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诗人，而郭沫若正是主张在太阳里熔化自己的人。郭沫若可以说是千百年来文人里因表面浪漫而得志的典型；而李白则是因骨子里浪漫而倒霉的代表，哪怕他晚岁已发现“何意百炼钢，竟成绕指柔”，也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买主。

在有关李白的众多传说中，无论是诗人还是民间，都附会出一个李白乘醉捉月而死的故事，金代诗人李俊民曾说：“不因采石江头月，哪得骑鲸去上天？”（《李太白图》）这里面固然有对同行的赞美，但我看也不无皮里阳秋；同样民间之流传李白乘醉捉月而死，恐怕并非完全出于对一个天才的赞美。不要忘了，我们这里缺少爱护天才的传统，这样的势利，怎能不影响到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民间呢？李白乘醉捉月的故事广为流布，这里面是否暗藏着猴子

水中捞月故事的效果，是不是对浪漫主义的粉碎性调侃，我不敢断然说出，我真的怕李白泉下有知伤心不已。

1997年12月13—15日于成都

《新文学散札》发微

如果我们认同英国现代主义研究专家马·布雷德伯里对文化地震学的阐释——记载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情感变化和突变性的价值迁移——那么我们便会对1949年作为终止新文学发展进程的刻度，不仅表示欣然的赞同，也表示出足够程度的理解。但文化思想变迁的漫长历程和浸入骨血的传承，使其并不存在自然地理上的刀劈斧削的形状，相反，它倒呈现出犬牙交错的面貌，于是改造和洗澡就有几分诡辩式的逻辑必然。但新文学研究界一些习惯的定势业已成为障蔽眼目的误区，要么孤悬于背景材料之外，作大言玄玄的所谓文本分析，而他所分析的版本早已是作家修改得与初版本面目全非的百衲本，而且对材料不加考订地乱用，其实正得南辕北辙的效果；要么只信作家作品的初版，而对以后历次的修改视若无睹，忽略其间的风云变幻、人世沧桑，失去对作品讨源溯流、见作者心路历程的意义。诚如流沙河先生所说："从文字的改动看文心的改变，可加深对作者的了解，为名著研究新踩一条路。"龚明德先生的《新文学散札》不仅在这两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即令在对新文学的史料、年代、校勘、辨伪、辑佚诸方面都做出了特殊的努力，堪称对新文学研究具有范形式的意义，此中正蕴含了新文学研究中一些学术规范的原则。

一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说："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批评总结清代学术的纲绳原则，也正可为当今学术界的浮华作风下一针砭。当今学界，好作大言，一点可怜的见解淹没在一大堆夸张得不着边际的形容词里,况且过往的"以论代史"的余波并未完全止息，故尔终其篇章，受益甚少，乏善可陈。而明德的新文学研究走的则是刊落浮华的求实道路，细大不捐，穷搜遍讨，仔细别择，使大众狐疑之事，涣然冰释；但单文孤证，绝不妄下断语，正所谓"刀锋过处，脓血出焉"。

史料搜讨　1993年张若英在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时就曾感叹道："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较充实地看到一些当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的片断，同样的是难而又难。"古人以30年为一世，于今也未过去几世，但对想要搜集资料的人来说，却大有三代以上的渺茫之感，何况还"有那么多人为的混乱亟须去细心梳理"呢?

不客气地说，文学史泰半是一部令人感慨的势利的历史，一位作家的成就本有大小之分，这是不必隐讳的。但明德却于那些曾经对新文学的发展做过贡献而至今湮没不闻的人，倾注了更多的关

切，在其史料学研究中加入了令人感动的人性关怀，如对诗人何植三、作家蓼子、女诗人梅痕等均不惜篇幅。与胡适一样对新诗有开创之功的叶伯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聚诸多专家集体之智慧写成的各种文学史均不见此等不争之事实，与在史实上不加梳理别择和深入考索的互相沿袭有关，正是“被国家养起来的专门研究人员大多忙于‘高深学问’，不屑于这些琐碎的学科基建工程”所留下的弊端。而明德将其间的史料搜剔出来，从诸多证据中考出叶伯和的《诗歌集》初版于1920年的5月4日，只比胡适的《尝试集》晚一个多月，而早于郭沫若的《女神》一年多出版；并且由于叶氏的“不禁转载”的开明原则，使得叶圣陶等主编的《诗》于1923年4月第二卷第一号转载叶伯和四首诗，叶圣陶在回信中也是盛赞叶伯和的这些诗的。故此叶伯和的诗歌应该“和《尝试集》、《女神》一样，是中国白话新诗的最早之重要收获”。

集中对史料重视的篇章，真是不胜枚举。明德在《关于〈围城〉汇校本答记者问》里曾郑重地说：“我主张出版家在出版有文献价值的图书时，一定要捍卫其文献性。”我们姑且不论《〈围城〉汇校本》引起的官司之是非，单说在保存史料价值上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也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捍卫其文献价值”的诺言。因此对于那种删削其文献价值的出版物，他的批评是严厉的，如1988年12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章克标著的《文坛登龙术》，不仅错误百出，而且“史实被讹”、“毫无文献价值”，“没有关于所据版本的介绍；对作者提供的手抄本之删改重写情况没交代：出版社对手抄本

加以删节和调整变动，并不经作者校阅”等等，而“略具版本常识的编辑，都知道重印旧籍的要点是维护其史料价值。”据我粗略统计，文集中呼吁出版家重视史实出版和文献书籍的有十数处之多，纠正了《鲁迅全集》注释中和各种有关新文学工具书的一些史实错误，并且非常注重史料的辑佚，如《〈文学救国法〉写于何时》一文中所辑载的章衣萍《感叹符号与新诗》一文的片断；校勘辨正工作，如一套抗战文学选，就可作为对《陈劭先纪念文集》一书后面所附的《文化供应社图书目录》的错误做补正，由此亦可看出他对新文学研究中事实真相之重视的一斑。

年代与辨伪 史学家陈垣先生对年代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著有两部关于年代学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而且在《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等文章中直接运用年代学的原理和知识，考索出其史源的错误。明德固然并不是照搬陈垣先生考察古籍所得的年代学原理，但他对年代学的重视并运用在新文学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细心的读者不难察觉，本书篇目的排列次序及它的时间跨度本身就是一部新文学发展的简史，而且在这部充满干货的考索中，处处都闪现出他对“时间和年代”这个硬指标的重视，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考索文字最终会变成不刊之论。如《“不禁转载”的〈诗歌集〉》、《章衣萍早于鲁迅“反击”胡梦华》、《〈文学救国法〉写于何时》、《圹朋友T是谁？》、《丁玲一封家书的月份》等均是用此法考订所得的上乘之作。但也不无遗憾的是，明德在结集出版自己文章时，却没有留下写作日

期，使我们对其新文学做工的历程，失去了一个参照的基点。

辨伪本系清代阎若璩、姚际恒、崔东壁诸位学者肇启其端，而顾颉刚先生用于古史研究中的方法，明德将其用于新文学研究中颇有快人心智的发现。他对某些文坛前辈在垂暮之年树碑立传，篡改历史，制造人为混乱的伪史料，痛加揭露。此正系钱钟书先生所谓回忆是靠不住的，因为回忆时的想象总是离奇得惊人。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写文章“弟冠兄戴”地提到鲁迅给他修改《蕙的风》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忆现在已无法取证的冯雪峰50年代在行车途中向汪转述的鲁迅赞扬他的话，这里固然包含着时代对人的扭曲，但汪静之的目的恐怕是众所皆知的吧。鲁迅并未于任何文章中讽刺章衣萍的《情书一束》，但李霁野先生却在《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一文中，说鲁迅戏言其准备编《情书一捆》是讽刺《情书一束》，经明德层层剥释，纯系子虚乌有。有研究家仅以茅盾的复信就来断定事实的真伪，明德认为这并不全然可信：“因为茅盾曾有过将他1960年1月17日的日记所载‘看电视转播《林则徐》，此剧甚好’中‘甚好’随日后政治情势改为‘其坏’的行为，能够无条件地相信‘茅盾复信’所‘云’吗？当然不能。”明德的辨伪求真将其史从问难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

二

学者对书籍版本的追索，其目的无非是观察时代际会、文化风

尚及其传承的血脉线路，并探及文网的疏密。明德对书籍版本的热爱，几同于一生丹黄不辍的古代藏书家黄丕烈，他固然不以藏书家自居，且非佞于宋版元椠，而是穷搜有关新文学的民国版本，每每于旧书摊和文物市场相遇，见他因寻到一本好书而乐不可支的神态，且列举个中掌故兼其流变沿革，真是让人心追神往的。他之搜旧书版本，并非是为附庸风雅而束之高阁，亦不作书贾增值之想，而是为了于版本的变迁中看出作家的修改，所显露的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他们的主动迎合或违心的不由自主，从而更加立体化地观照一位作家每一阶段不同的心路历程，以使我们不蔽于作家的一时表态而做出武断的结论。此正是梁启超先生所谓，不蔽于己，不蔽于人。

新文学之有版本研究，非只是学步于乾嘉考据之故；而是确有必要。因为大多数新文学作品按习常的认识，虽完成于民国时代，却有不少的作品在共和国时代有不同程度的修改，诚如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所言，“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明德就已经注意到版本的迁衍对研究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并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的专著，于新文学研究中引进了实证主义精神，并基于弄清材料真相的前提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关于丁玲书籍的版本变迁除了收入本书的几篇以外，还有未辑入本集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版本录》等，可见他对丁玲研究的贡献和心血。又如他考证出孙犁之修改《荷花淀》中水生的年龄，“是为了适应新颁婚姻

法有关条文”，“作品是改过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早婚史实却无法抹去”。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的两种版本，一个最主要的改动便是把华威先生身边的人员所属，从“工人抗敌协会”改为“文抗”，“把仅在口头抗日者说成文化人，当然比说成是工人要不担风险些。”同样，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40年代初和50年代初两个版本，因此，“科学地说，40年代初的《讲话》是影响40年代文学的经典文献，50年代初的《讲话》是社会主义阶段文学的经典文献。我们翻找一下王瑶、唐弢等名家论著，他们谈40年代的文学，引述《讲话》所注明的出处都是50年代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在史的意义上是说不过去的。不读原版《讲话》，王实味事件、萧军事件乃至延安时期对丁玲的批评以及1942年下半年后新创作和修订了的文学作品中出现那么多嘲讽知识分子的描述如刚才说的对《华威先生》的修改，就无法解释，此种精当之论，确有穿穴贯通之感，并非为考证版本而重视版本的人所能道出。所以我也不避“文抄公”之讥，照录如上，以供读者明鉴。

有的研究者动辄言称，丁玲《阿毛姑娘》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受法国作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影响。但明德通过对福楼拜的小说翻译过来先后的历程，考得丁、李二人的小说受的是李劼人1925年的译本《马丹波娃利》的影响。因为丁玲的《阿毛姑娘》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其发表的时间分别比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早20年和12年，这样一来，把那些自以为是的比较文学研究剥离出

其无根无据的本来面目。当然可补充一点的是，这其间还有1927年李青崖先生的译本《波华荔夫人》。总之说他们的小说受《包法利夫人》的影响是不大站得住脚的。并且由此对新文学研究界浮嚣的学风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新文学研究界最大的弊端是匆匆过客太多，而且这些过客大都气吞山河，长于夸张自己的‘发现’；结局是把扎扎实实的卓有实绩者遮盖得几乎不为人知。”书中透露的沈从文先生批改过的三本书，因其系从文先生在蜕嬗之际，留存自己心声且自用的批改本，自然有那些公开出版的各种版本不能比拟的价值，故此弥足珍贵。因此明德从版本学的角度急切地呼吁，“中国新文学已自成一门大可钻研的学科，形形色色的作者批改自存本（尤其是像《湘行散记》和《边城》这类名著）尤为研究这门学科所急需”。

明德不仅注意版本的变迁和作家自己对作品的屡次修改，就是自己的文章在出集子时也经过了再三的推敲，欲达其考察上更加缜密。我曾就《〈家〉的版本变迁》和《〈情书一束〉的书名》、《鲁迅与〈情书一束〉》诸文的初发刊物，与现在收入集子时的定稿作过逐字逐句的比较，发现从题目到内容均有不小的改动。《〈家〉》文不仅修改得更加简练恰当，而且增添了文章刊发以后新发现的资料，有些段落几乎为重写，足见其认真细密的态度；而《〈情〉》《鲁》两文我们只略举一端，便可窥其为学之谨严：《〈情〉》文中原有“更名为《情书一束》后第一次出书时间可以判定为1926年5月上旬”一句，后将“上旬”改为“头半个月”，稍有考

证经验的读者就不难明确其更改的用心，考证时间范围，宁宽泛而得其大致正确，毋失于过逼仄而显武断。《鲁》文原刊中有两处误植，一是《莽原》半月刊第11期的出版日期1926年6月10日，原将6月误为5月，虽属时间上的小小误差，但有涉一些史实和人物活动场景；还有一处将本文的关键人物李霁野误为“李野霁”，但收入本书均作了更正，而且词句上更为顺畅雅洁。从中可见其心细若发。

有关鲁迅先生的研究无疑是当今的朝市显学，以鲁迅先生不朽的文化业绩本是担得起众多人来研究学习的。但一人的成绩一旦成了大众趋迎之显学，则必有良莠不齐之辈居间混饭吃；无研究所应具备的绝大功夫，却只有寻章摘句的利用风气。鲁迅生前被人利用，死后亦复被人利用。举其荦荦大者，一为吃饭；二为在他大树底下得荫凉；三为用他来攻击自己的论敌，以报私仇。此虽系鲁迅的悲哀，亦复系文人之无耻。以鲁迅的卓识远见对此不会没有预见，“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哪里是在纪念韦素园先生，简直就是鲁迅先生自伤之辞。

明德的鲁迅研究并不空言高论，这种朴实的作风，从他早年所写《一曲稚野美和文雅美的赞歌》一文就有切实的体现。他一反彼时人人动辄说“战斗”的鲁迅的风气。他在分析了《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后说，“如果把一个本来很丰富的鲁迅，扭曲得那么单调，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连回忆孩提时代的乐趣也在战斗，这似乎无法令人接受”。但“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在鲁迅研究中又岂止这一桩？在《鲁迅与〈情书一束〉》一文里，明德用他绵密的考索来证明李霁野所言鲁迅曾经讽刺过章衣萍的《情书一束》，是道听途说的耳食之言，而且批驳了《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对自序的注，“是一条情感倾向很偏颇的不合格”产品，因此，“至于李霁野的回忆，恐怕只能和川岛的议论（指其“给鲁迅的信有拨弄是非之嫌”——引者注）并为一类，那是对他们自己的看法，与鲁迅无关。”可以说这是不慎地将自己的好恶加于鲁迅先生头上的一种做法。当然明德此文中所说的“不知何因，他（指鲁迅——引者注）认定了高长虹是他的情敌”，我认为江南秀一先生发表在《书城》创刊号上的《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的恋爱纠纷》一文，是可以聊备一说的。不仅如此，明德还对有亲聆謦欬的“鲁迅弟子”在某些细小的事情如《语丝》刊名的由来上，都绝对“尊重”鲁迅的做法，提出质疑，“当事人的回忆，都是一种揣度口气，是否为了与鲁迅保持一致？”

至于汪静之既不提“章衣萍早于鲁迅‘反击’胡梦华”为《蕙的风》张目的事实，又于闻一多先生骂他的诗集只配擦屁股，仿佛充耳不闻，却有意抹去周作人为其修改《蕙的风》的事实，千方百计“弟冠兄戴”地说鲁迅为其修改作品，明眼人都知道靠鲁迅而隐去周作人的目的是什么。像这样自封为鲁迅“私淑弟子”的人恐怕还有些数目吧！我们也知道，不因人废言，只不过是一个悬拟在那里

的美好标准罢了，汪静之先生要极力抹去周作人为其修改诗作这一“不光彩”的事实，其情可悯。何况这样的事情又在《艾青全集》中出现，早已有一位高明的清洁工将周作人早期的业绩，从艾青当年写的一首关于周氏的诗中“清洁”掉了，以至诗歌的主人艾青也不知个中原由，干得真是高妙不已。当然必须明告的是，我们丝毫没有为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行为回护的意思。不过事实如此，但有的人硬是能拿事实开刀，令人佩服！

如果对周作人是有意隐去的扭曲的话，那么对鲁迅先生却是明目张胆地“谬托知己”，且必以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为最权威之阐释，谋得一不可更易之学阀位置。明德在《鲁诗研究的奠基之书》一文中，揭露了很有些人对文怀沙（司空无忌）所著的《鲁迅旧诗新诠》不进行仔细的学术上的讨论，而专注于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非学术行径，此实乃吾国所固有，亦系现代中国文化界迅猛发展之高招。其实司空无忌在《鲁迅旧诗新诠》一书的《引》和其它地方早已未卜先知似的说了一段以堵人口的话，而那些自以为是的攻击者却视而不见：“‘新诠’不免有蛇足之识”，“这书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必多”；“予之所见，乃就诗抒意，不明细曲、或咸以吾意为然也。甚矣，诠事之不易也。”明白人都知晓，诠释当代旧诗，所谓“不明细曲”，其实最难得的还不是古书中有案可查的古典，而是那些言人人殊的今典，是因为今典所涉及人事，颇有阻碍，反而不易、不能或不敢明察，只有等待所谓“水落而石出”者，哪怕彼时之石已经面目模糊，总还是比不见石头的好，故学人常以著当代旧体

诗为苦事，此理之必然。而且最终容易导致的往往是“或咸以吾意为然也”的尴尬结局。看到这样的说明，真正的学者便以对注释的学术争鸣研讨为务，虽然这样的人不多，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编者张梦阳的评骘还是较为公允的：“这本书对鲁迅旧诗的诠释虽然不够详尽全面，但是注释者有感则发、无感则止、有言则长、无言则短的精神还是有可取之处，这样做总比强不知以为知、搪塞成篇、任意拉长的作风为佳。”

去岁是鲁迅九尘逝世60周年，我们不管是赶时髦的生意经，还是真正的纪念，岁杪出了两种有关鲁迅及其论敌的资料——《一个都不宽恕》和《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尽管这其间的资料搜罗不只是挂一漏万的问题，于读者来讲，还是可感谢的。至少可以再现当年争论情境之一斑，这正符合西方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对“情境逻辑”之阐释，即详尽地分析人们行动时的情境，从而从情境中解释行动。把鲁迅及其论敌的文献罗列开来，从论战情境中让人们自己增加判断力，而不是被动地接受那些自以为是的、类似于神话学的鲁迅研究的灌输，从而真正让人们认识鲁迅的丰富性。事实上当今一些人对鲁迅产生的非议（学术研讨不在此列），其中固然不乏异举以鸣高的好事者，但诸多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就是，与那些不学无术的类似圣人箴言录式的鲁迅研究甚有关系。同样为当今显学研究的钱钟书，经常对他的研究者回信所说的“感惭交并”，人们一律视为钱先生的谦谨之辞，其实并非全然如此。以钱先生之明“世故

惊涛”，“人海易波”，“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崇拜是使偶像自动倒塌的方法；没有一个大师不是败坏在弟子们手里的。”那么鲁迅研究中这种无端的吹捧，实足以割裂鲁迅，是另一种对鲁迅先生的伤害。所以我倒是赞成如明德一样，将其真相弄清楚，然后再议论是非吧。

1997年2月4—14日新春于成都

庄子使我上瘾的几个理由

——《庄子我说》自序

这个人的书使两千多年来的许多人上瘾，我自然是其中之一；不过还有许多自命为研究他的人，无条件地成了他的俘虏，这不包括我。你可以说，我没有读懂他的奥义，所以没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态度。你若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高看了我。退一万步说，即便我真的如你所说读懂了他的奥义，我也不会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态度，那是因为我是个现代人且在精神上有太多的反骨。自然，上瘾也并不是大家寻常所理解的完全是赞赏的代名词。

1. 可爱的矛盾

扪心自问，说庄子是矛盾的，并不是我有着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故意贬低他，从而在精神上弑父。像庄子这样的庞然大物，即便我有幸能准确地叮咬他几口，也只不过是蚊子对大象的叮咬而已，对他哪有什么弑伤作用？按照我的本意，我经常把一个人在精神上的矛盾看作是一个人活力无穷、魅力四射的象征。生活在大量产生道德警察的国度，马上就会遭致剧烈的反击，说我这是在提倡一个人思想观念的朝秦暮楚，转若飞蓬，捷如影响，好比川

剧变脸一般，立场不坚定。

服不服膺真理，尊不尊重事实，在不少人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要坚定——并不是自有立场，而是强权（权威）者强加的立场——这成了许多人变成精神奴才的不二法门。不过，这对庄子来说并不重要。庄子齐万物，主相对，等生死，谴是非，立环中，没有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这当然是极而言之，为了言说自以为是的思想，哪能没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想法和立场呢？因此庄子思想的立场，即便不是一以贯之，矛盾交错，也能大致寻绎出个脉络来。当然，能寻出个脉络来，需在庄子思想的矛盾丛林中披荆斩棘。

庄子处在诸子百家纷起之中，思想观点时相靡荡，互有影响，自当不免，这可作为对庄子思想变化而矛盾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批评者由于对被批评的学说浸淫日久，难免不受被批评者的影响，在思想史上也不乏其例，本身就充满着矛盾的吊诡。庄子抨击儒家之剧烈，堪称无以复加，但依然有后世学者认为其学出于儒门的，有出于子夏之门之说（韩愈、章学诚、姚鼐），有出于颜渊之门之说（章太炎、郭沫若）。除了他们拘于文义、没用足够的游戏精神来理解庄子外，至少可以反过来证明，庄子思想的矛盾的确是存在的。至于《庄子》一书之编成的技术性难题，给《庄子》所带来的矛盾，已是众人皆知，不劳多言。当然《庄子》一书如果被确定是庄子及其后继者合撰的书籍，因而产生了矛盾，也就没有对其矛盾争论的必要，只要指出其矛盾之所在即可。但《庄子》一书中哪些是庄子的文章，哪些不是他的文章，我是颇费踌躇的，不大分辨得出

来。如果《庄子》只是因他一生阶段之不同致使作品产生矛盾，就更是情有可原。总之，我不如苏东坡以降的许多识家那般聪明，火眼金睛，能将庄与非庄断然区分。其实说穿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思想上十分统一的庄子存在，替庄子阉割掉他们自以为是的非庄的“骈拇”，就成了他们不虚此生的伟大使命。这种对待庄子的“原教旨主义”态度，就像张承志前几年所提倡的“清洁精神”，让我想起汉武帝大概是为了司马迁的精神和身体都很清洁，才去掉他的大势的吧。

如果我说庄子的魅力与世界之存在一样永恒，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与世界同样矛盾的话，希望你不要大惊小怪。矛盾所带来的纠结与活力，是那些将自己的思想修补得所谓天衣无缝的理论体系——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存在的假设而已——不可比拟的。正好可以反过来证明，对庄子的阐释为何意见纷陈，莫衷一是；换言之，《庄子》的文本是开放而非自足的，就像一个社会允许试错机制，而非事先被一些自认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构想得完美无缺，更具活力与民主一样。当然这不是说在一本书中，作者故意布设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而是说有些错误是作者本人的学殖及诸多因素无可避免的，可以得到我们更为丰富多样的阐释。

2. 无处不在的游戏精神

庄子忧愤伤世，同道者寡。自知天下不可语庄语，而以谐语出

之，开后世佯狂反讽之先路。而谐语多半以不稽的人事，小说家的笔法，兼以重言、寓言、卮言迭出，实在启我覆盆，令人喷饭。确如宋代黄震在《黄氏日钞》中所言："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渺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

西人论述艺术起源于游戏，未必是的论，但人在童蒙时代，最喜欢做的，莫过于玩游戏，这说明游戏是人类的天性。成人后，人们也做游戏，只不过大多数时候的游戏，都只是为了获取功利目的，互相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博弈，所做出的利益妥协罢了。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成人才在游戏中不带或者少带功利目的，而此种游戏带来的愉悦，其佳境可至终身难忘。无论是席勒的《美育书简》还是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其中心意思无非是游戏着的人，是丰富而有趣、健康而人性的。因此席勒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美育书简》）

《庄子》诸多篇章，很多故事，幽默潇洒，反讽自嘲，嬉笑怒骂，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异数，这也是与儒家那种貌似恭谨的做人行文态度大唱反调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游戏笔调中，行文诡谲，汪洋恣肆，想像奇特，千古之下，无出其右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子是先秦时代乃至中国文化中少见的"完整的人"。

3. 路径依赖：向后转

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几乎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是中国文化大厦的础石。对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进行必要的观察，可以窥看至今影响我们文化及现实生活的诸多层面。因为文化及现实生活的衍进，虽然相隔千年之遥，依然可以凭着像一条流淌的河流那样，从河源感知其对下游的影响。

庄子身处剧变的时代，诸侯纷起，是非淆乱，代表各种利益的学说迭出，以适应彼时急剧变化的社会需要。庄子为了反抗社会上普遍兴起的利欲熏心，对抗现存社会对个人的约束挤压，便构筑一个“至德之世”的理想乐园，来标示当下现实的丑陋及其存在的不合理。庄子向壁虚造的这个社会，并非他所独创，其他学派在彼时也以此相标榜。尽管他们虚构的社会在提法上不尽相同，但纷纷向后寻找治理当下社会疾患的药方，几乎成了彼时知识精英的共同诊断，更成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大同社会，《老子》所谓的“小国寡民”，《冠子》中的“民犹赤子”等等，无一不是对当下现实的不满。汉学家葛瑞汉曾说：“对一切有组织的政府的失望，对圣贤君主的嘲笑，对黄帝开战以前的时代的怀想，凡此一切，都成了尚古思想的背景”（《冠子：一部被忽略的汉前哲学著作》）。这好比一个人行走在路上，前方的道路朦胧不可见，这个人当下身处的路段也险象环生，

便疯狂地想逃回他所认为的原住地，而原住地只存于他的幻想之中，已经邈不可追。因此失望与追忆，便成那个时代许多知识精英的集体选择，至于说未来，因不可预期而成本太高，冒险精神自然就几近于无。

既然至世已衰，父子相图，兄弟相疑，这就为法家的“不期修古”，只图眼前的酷政打通了道路，这也是秦国之所以统一六国形成中央集权暴政的思想背景。而秦国的暴政更是增添了后世知识精英对上古三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不懈热情，直至近代康有为为了变法，依然向后去找寻支撑自己变革的理由和思想资源。流风所及，当下流行之所谓“新左派”观察事物的思路几乎与我们传统的文化平台如出一辙，他们“往往用的不是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流露出浓郁的怀古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想象中的古代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与悠闲，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一味推崇精神，否定物质，鄙弃大众但又以大众的导师和代言人自居，表现出十足的贵族和精英倾向。又如，他们想把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相伴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徐友渔《自由的言说》）。这说明吾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真正的未来，而那些遥不可及的“主义”乌托邦所代表的未来与邈不可追的至世三代，可以说是两极相通，本质上没有区别。在要么无政府，要么完美政府的诱惑下，我们吃尽了苦头。

庄子在政体上虚造三代至世，得道方法是坐忘心斋的减法，得道之人大多是与常人相异的——亦是身体上的减法——残疾之

士，几乎都是同一思考路径，尽量减少，随时向后看，最终以至于“无”。

4. 思维方式：非此即彼

庄子认为万物齐于一，于是谴是非，泯对立，等生死，主相对，消彼此。我曾说《庄子》四处暗藏矛盾，充满吊诡。譬如他用语言来超越语言，通过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完成他所要达到的消彼此，泯是非。

庄子行文中常常是高下对举，是非立判，愚智连譬，文章里有诸多段落开后世骈文赋体之先河。顺带说一句，吾国文化表现形态中，较为发达的赋文、骈文、对联等诸多形式，自然有感人篇章，韵律之美，文辞灿烂，在在不可多得。但这种文学表现形式未必不是我们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外在反映，已经左右我们的思维方式而大家习焉不察。庄子的思维习惯也未能幸免。我们可以说，庄子主张泯是非，消彼此，但主张是一回事，自己能不能够做到是另一回事，真正能逍遥自在地处在环中，何其难哉！因为泯是非，消彼此，本来就是个极端行为，只有悬拟一个所谓的“道”在那里来统辖。是与非、彼与此是相对的，因此应该无是非，没彼此，从而统合于绝对之大道，即用绝对的相对，来达到绝对的“绝对”亦即道，“这种对‘道’的超越性理解和普遍性解释，正好为权势主义者所强调的君主权势至高无上而又广大普施，提供了宇宙依据”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换言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我们文化传统中惯用的思维模式，这才使得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有了我们习焉不察的真正温床。非此即彼，最终达到的是对思想的绝对统一，只要手中有权（强权和话语权），我便是绝对真理。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加上没有真正的宽容，以自己的是强加于人，有极强的征服欲，他人没有不做什么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先秦诸子的普遍招式。即便强调不应该互相争论的庄子，何尝又没落入这种圈套之中。以此观诸今日，更是令人感慨万端。

2001年8月12日于成都

我所认识的余杰

1

如果按世俗标准来察看，余杰并不算一个有趣的人，他不苟言笑，不是个谈笑风生的人；为人谨严，不是个机锋迭出的人，偶尔严肃得让你感觉到有一点呆板。交谈一久，除了思想的激烈碰撞外，没有多少可供调剂的花絮。他很少说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爱说的黄色段子以及讽刺入骨的政治笑话，包括流行于市井的属于“国风”的民谣，自然使人略感沉闷。要言之，余杰不是个佚闻性质的人物，附着在他身上的趣事并不多，这是我与他交往多次所得的直接感受和理性判断。这或许与他对幽默的态度异于常人，且不那么喜好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他对王小波与钱钟书的幽默之评价中显示出来，尽管王小波与钱钟书的区别甚大。那种在纸上飘忽犀利、直捣黄龙的风景，那股长途奔袭的少年英气，在他的谈话中全然不见。这说明他是一个深得“讷于言而敏于行”之正传的人，他在演讲中略有口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他将某些事情讲得流畅，但也避免了浪漫滔滔，一泻千里，没有边际的胡说。这样一来，反倒成全了他，可以使他对某一问题停顿下来，有时间加以深思熟虑，从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有时不免偏颇，但确乎是自己领悟而来，非那

些蹈袭稗贩者可比。

余杰在与朋友的交往中，除了自己的思想以外，并没有多少外表的特立独行之处，相反倒是很合群的，仿佛“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既不大块吃肉，亦非大碗喝酒，更说不上放浪形骸，这和传统意义上称为才子的人相去甚远，尽管他也诞生于所谓巴蜀自古多才子的蜀地。不过，他自己的思想，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却是与众不同的，尽管他强调的许多问题也不过就是常识而已。由于他性格比较内向，而又要想做点不同于常人的事，别看他的读者众多，但其孤独的命运便是前定的，而不少人对其自以为正确的解读，或多或少都有些谬托知己。

2

几年前曾读过《钱钟书散文》中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先生21岁那年写的。写的什么内容我早已忘记，但我忘不掉其间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深藏若虚的机巧，近乎全身远祸的韬晦，使我吃惊不小。这篇文章并不算钱先生的得力之作，但一个21岁的年轻人，居然能如此洞悉世事，并懂得巧妙地规避，使我在暗服之余，产生不可名状的悲哀。这就像我研读先秦诸子时，看到先哲们在两千多年前令人惊异的表现，他们的著作中固然有不少至今仍然闪光的思想，但更多的却是充溢着努力苟活下去的技巧及其相关智慧，这使我对一个民族处于少年时期，就生产出一些过于苍老而世故的“思

想”而悲凉。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过早世故，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这正好说明我们的文化及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缺陷，使得个人选择变成某种对现存制度的曲意迎合。其实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在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下，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并不靠世故去获得，要活命就更用不着世故在其间来帮忙，人们只须努力创造、发挥自己的特长便可。但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却将最大的智慧花在怎样苟活上，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好在尚有例外，还有不过早就世故的人，27岁的余杰便是如此。余杰和人们印象中的书生一样，都是白面而文弱的，如说他也是一个才子的话，就是一个有思想锐气的才子。因此他的文章笔夹风雷，字带利刃，对专制制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梁简帝所倡导的，为人宜当严谨，为文且须放荡。余杰在与梁简帝的旨意并不相同的层次实现着这一点。自然，这并不是说余杰的文章机锋迭出，暗伏杀机，更不似一些人的文章那般云山雾罩，终其篇而不知所云，而是自然明朗，直来直去，一目了然。但这样的鲜明直接，并不是说其行文遣句时，不深具用心。余杰文章的“放荡”，在于其心态比很多文人正常而坚定，猛锐而不躲闪，即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要明了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制度的批评，对文明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余杰所著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文明的痛创》、《想飞的翅膀》等书，无不浸透着作为一个公民、一个青年思想者对社会生活、制度及文明的真知灼见。

谢泳兄在评余杰参与策划的“新青年文丛”中杨竞的《林中响箭》一书时，曾一语中的说过像杨竞、余杰他们这种写作是“青春写作”。“‘青春写作’是这样一个意思，它主要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充满激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又缺乏理性；它有鲜明的立场，但那个立场又是不稳定的；它的文字风格是那种初看非常有才气，但细读又不是很有回味余地；它对现实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但它的力度又是感情的一时宣泄。”（《青春写作》，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日）余杰的一些写作也是可以归入此列的，比如对王小波文章的批评，在我看来，做出了不太合理的评价，这里存在对幽默以及对自由主义态度的误解。哲学家穆勒曾说过，专制使人冷嘲。而王小波一些文字真得冷嘲之精髓；虽然我对余秋雨的一些文章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表演”，尤其是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持批评的态度，但我对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长文中，用“文革妖孽”、“文化流氓”来评价余秋雨，我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这是余杰锋芒有余、理性不足所导致的。如不加清理，余杰就会进入自己所批评的怪圈之中，形成思想理念上的矛盾。这样看来，余杰所写的书也可以部分归于谢泳兄所说的“青春写作”一路。

但余杰在其中的不同还是有目共睹的。譬如对专制制度持续而越来越理性的抨击，对张承志泛道德主义的强有力的解剖，以及《想飞的翅膀》一书中所附录的关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讨论，他与各位师友的交流，对自己理性的审视，并不惮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这就并不是“青春写作”所能概括的，也是青年人包括许多中

国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保持我自己的乐观，余杰将来的批评在破坏的同时，会有更多的建设，必将在锋芒之中蕴含着越来越多的理性。因为这样的话他早在批评张承志的泛道德主义的文章里就已经说过了："当下社会的失序状况，固然是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只有通过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才能克服。这是当下知识分子发言时，必须首先具备的一个认识标准。只有这样，他的思考才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他的态度才是宽容的而不是狭隘的，他的建议才是可以操作实施的而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皇帝的新衣》）

与其让我看那些过于世故的写作，不如让我看青春写作；与其让我看青春写作，不如让我看尖锐而有理性、锋芒而又表达着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写作。唯其如此，才与我们所倡导和认同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相符。

3

我曾经强调过，余杰所提倡和强调的，平实地看，不过就是常识而已。但不幸的是，这些常识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所缺乏的。也正因如此，余杰遭到不少人的误解和批评，说他的书中没有思想的原创性，不注重学术质量，更没有自成的体系。其实这种说法，只看到思想原创性和自成体系的重要，而放弃了对中国现实生活环

境的关注。且不要说，当今中国没有几人的思考有原创性且自成体系，就算有，面对当下中国人之生存境况，像余杰这样努力倡明一般读者所不知道，即便知道但不甚了了的常识，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譬如对人的尊重，对个性的张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个人利益的完全维护等等，都是寻常读者所应当知晓的，可以说在中国，像这样的常识，据我保守估计，再倡导200年都不过时。

鲁迅曾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自己服膺的思想前驱，余杰在这一点也堪称得鲁迅之“嫡传”。在这个视爱情、友情为多余的时代，犀利猛锐的余杰，却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分外看重，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与亲戚朋友的交往中，更体现在他对真挚爱情之不遗余力的追寻里。像关于他初恋的长文《那段岁月，那段爱情》，就写得极为真挚深情，这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关于爱情故事里，令我感动的少数篇章之一。每次我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仿佛与余杰一起经历一次那种无望的爱情。他初恋的女友我也见过几面，是个不错的女孩子，以我的观察，可能做一般朋友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虽然我这种说法，要被人唾骂为事后诸葛亮。如果余杰只有犀利猛锐的一面，而没有真挚深情之衬里，那么余杰是残缺而令人遗憾的。而且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即便活在世上，也让我感到他不曾真正活过。好在这一切并不曾在余杰身上发生。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的社会，因为只有真正开放的社会才允许制度上的试错，并不是梦游一样去

夸大制度的完美，而在于制度逐步向着更合理更人性的方向改进；一个有着不懈活力的人，只能是一个心胸及思想开放的人，对自己的错误不停地修正，甚至忏悔，使自己成为自己所倡导的多元价值观的实践者。正如一句著名英国格言所示：最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的敌人。作为余杰的朋友，我希望余杰更多地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以及相应的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不是为了向别人标榜自己谦虚，而是自己进步之必需。我们应以此共勉。

2000年1月31日—2月1日于成都

五步追魂：我对余秋雨的批评

1.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我，除非我委托他。但我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动辄代表全国人民或者全某某人民，动辄说全国人民又掀起了什么高潮，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其中当然的一分子，我没有掀起或者参与掀起什么高潮啊，或许那阵我正沮丧得要命，差点就想去自杀呢。但千里之遥的人却像我肚子里的蛔虫，在电视里借助强势群体向我发出不可更改的声音，说我正在掀起什么高潮，真使我怒火中烧。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参与掀起什么高潮，也不能使用“全国人民又怎么样怎么样”的全称判断，这是一个逻辑常识。想一想我并没有委托谁来代我说话，这又不是议会中的代议制；而且恕我孤陋，我还不曾听说过自由而独特的思想可以搞代议制，这种主观强加经常使我愤怒莫名。因此我反对用专制的方式来要求某一个人某一群人忏悔。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他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看法，只要不代表某种强势群体或官方意志来向对方施压，或者发出最后通牒，如不忏悔，你就等着看你的下场之类，那么我认为建议或要求一些公众人物来忏悔，并不是不可以的。

“二余之争”中余杰之所以要求（说不上强制）余秋雨要意识到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事情，并对此进行必要的忏悔，完全

是余杰的个人见解，并不代表某种自以为“政治上正确”的强势群体或者官方意志，给余秋雨下最后通牒。所以将他的个人看法，与“文革”中那种通过专政机器来强行要求人承认错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宪法明确规定，个人有言论自由。只要不是不可辩驳的“最后审判”，那么余秋雨及那些不支持余秋雨忏悔的人，大可不必惊慌，自可讲事实，摆道理，对余杰进行有理有节的反驳。如果余杰说他代表全国人民要求余秋雨忏悔，借助某种强硬势力要求余秋雨必须忏悔甚至交代，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来批评余杰。譬如他用“文革余孽”、“文化流氓”来称呼余秋雨，我就曾著文加以批评。而将余杰的个人意见当作“文革”那时动用专政机器的“交心”或者忏悔，这既是混淆视听，也是大用诛心之法，误导读者，招数几近置人于死地。这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的确是我们的传统，但并不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传统。

2.从个体上讲，我承认余秋雨有不忏悔的自由；但同理，他人有批评余秋雨，并建议或者要求其对他所做的错事，进行忏悔的自由。唯一的前提是，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搞大批判，或者变向借强势群体之刀杀人。自然，法律不会强行介入一个人忏悔不忏悔的事，这属于道德范畴。因为如果触犯法律，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但对于“文革”中的暴行，除了万恶的“四人帮”外，又有多少人是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的呢？因此不能纳入法律范畴来审视并介入的事，参与者或者旁观者，都有一定的必要来做一定的忏悔，这才是对自己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尤其像余秋雨这样在“文革”中参与

的，在今日又受到读者广泛喜爱的文化人，更应该理所当然地反思“文革”那段苦难的历史，并为自己在其中所做的事，做出负责任的、尊重事实的解释。众所周知，法不责众，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更成为许多人借此逃脱自己罪责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同时也成为参与者对自己所犯错误不自责不忏悔的潜在文化心理支持。

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复次，我们缺乏基督教的原罪观，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外国人说sorry，而我们却不大擅长于说抱歉的深层原因。相反，我们倒是有死不认错的传统。

如前不久我刚做完一本名为《中美中学生创新作文对话》评点工作，就发觉中国的老师绝大多数分明知道错了，学生指出来，也不承认有错，更不会向学生道歉。我在评点中说，一个死不认错的老师，就会培养千百个死不认错的学生，这就是我们没有忏悔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心理根基。正是这种教育的恶性循环，导致不认错、不忏悔成了我们民族的时尚标志。大抵除了日本人以外，我们在死不认错死不忏悔方面，大概可算得上是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喜欢去争各种冠军，这个冠军我们倒有可能不争自得。

3.我承认制度的缺陷和几千年来的专制传统一拍即合，是造成“文革”及我们生活中的诸多灾难的根本原因，但每一个个体甚至包括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是否也就此毫无干系呢？大概不能这么说，否则鲁迅写华老栓吃人血馒头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完全

就事实来说，华老栓只知道人血馒头可以医好儿子的病，他哪管你是烈士的鲜血还是刽子手，还是其他什么人的鲜血？只要能救好他儿子的病就成。似乎没有对此做道德评价及价值判断的必要。本来就属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华老栓，鲁迅为什么还要将其刻画为典型人物来加以鞭笞呢？这就联系到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专制制度与国民劣根性是互相作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大抵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但如果硬要分出个高下，我更愿意承认制度对人的作用及影响，是非常大的。

人真是环境的动物，更是制度所制约的人。但制度也不是海市蜃楼，自有许多是人自我适应的结果，正如奴才是专制制度的典型产物，也是专制制度的催生物一样。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赞赏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谈及纳粹在德国盛行的原因，专门有人研究“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基础”，也才理解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将其研究群众心理的社会学著作名之为“乌合之众”。既是如此，每个人都不可推掉自已那一份罪，甚至连看客都有。当我读到2000年第5期《书屋》杂志所刊发的邵建先生《跪之忏悔、无辜负疚和我是同谋》的长文时，我的感动和尊意，如同我当初编辑摩罗的《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一样，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少数有思想、说人话的佳构。无辜尚且负疚，并且认为“我是同谋”，那么像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石一歌写作组并且作为《朝霞》杂志的负责人之一，如果有人建议他就此做出负责任的说明，从良心道义上为此事做出与事实相符的忏悔，又有何不可呢？

4.虽然政府已承认“文革”是一场灾难，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在实际行动中并不彻底，“文革”的许多历史事实，至今仍然讳莫如深，有不少的禁区。这既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剥夺，也对我们理智分析并且彻底弄清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避免“文革”灾难的再次发生十分不利。同时也导致许多人不愿意正视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对此进行必要的忏悔。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日本政府不承认战争侵略，便要挖空心思去掩盖历史真相，不少民众便要跟着去否认其侵略战争一样；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勇于承认侵略战争（请看勃兰特在受害者面前著名的一跪吧）的事实，而德国的民众大多也都乐于从自己忏悔反思开始。

我们不要过于相信“文革”永远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革命乐观主义，这种不加分析没有怀疑精神的做法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只要制度尚不能建立避免“文革”再次发生的制约机制，我们就没有理由对此过于乐观。而我们现在之所以反思“文革”，像我们这些没有参与过“文革”的人，和参与过“文革”的人，来共同反思“文革”的灾难，并承认个人在其中的过失，并不是要揪哪一个人的辫子，也不是为了据此获得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因为在无所逃避的污泥之中，没有谁真正能出污泥而不染。

要余秋雨个人来承担制度错误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公平的，所以对余秋雨不忏悔所作的批评与反思，最终应该落脚到对制度的反思和批评，才能根本上达到反思与批评的目的，才不至于背离“二余争论”的初衷，也才不至于使讨论落得“播下的是龙种，收

获的却是跳蚤”的下场。正如摩罗先生所说："无论从血缘上、从文化上、从精神结构上、还是从民族生活的运行机制上，我跟我的前人都是一个整体。我不但无可选择地接受了他们所加给我的外部规定性，而且也必定无可选择地接受他们所加给我的内部规定性，包括那些他们没有来得及忏悔和消化的罪恶。”（《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这也正是邵建先生所强调的“无辜负疚”在吾国之具体体现。

5.我曾读过联合国环保组织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印象最深的是一句："气候无国界”。我也就理解那些国外的普通人不远千里来认养熊猫、种树，参与中国的环保工作，是为了什么。我记得美国人申明自己的道义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泼向你的污水，明天会泼向我，因此我不能坐视不理。

英国宗教诗人约翰·邓恩的布道辞——“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敲响”——被海明威意味深长冠于他的战争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一书之扉页。

我之所以不惮烦难地引述上面这些让我震撼的话，是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有法不责众、死不认错的传统，还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刀没有架到自己脖子上，就乐于去看被杀者的笑话，或者无动于衷。等到刀架到自己脖子上，需要别人

救助的时候，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是，文化建设包括反思忏悔也应该有自己的共生环境，他人之痛即是自己之痛，民族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而且要从中看到忏悔不只是个人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超越，对他人和社会都是一种拯救，对社会进步有功于己有利，忏悔又何乐而不为呢？

2000年6月4日凌晨4时，女儿4岁生日时作

向王朔同志学习

如果我还算有精神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精神生活有点古怪，就像你看家谱上某个贞节牌坊的获得者，或者突然断后者那样“异峰突起”或者“突然消失”，甚至干脆如太监看宫女的意淫神态，还能找出他没去势时的活力，似乎不太有来由，却不乏蛛丝马迹。因为打小是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下成长起来的，号召得我们已经有点“瓜儿离不开阳”，苗儿离不开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日不餐，饥渴难耐；一日不学习，便面目可憎。已成不折不扣的、地道的四川“瓜儿”。我已年届35周岁，一生不知还向伟大人物学习多少回，真是麻木得可以用鲁迅砍瓜切菜之利斧来隆重修理了。这不，没有具体的人号召我们向王朔同志学习，但我已经忍不住要向大家宣布我的独家学习心得，成为法国大众心理研究专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的一员欢呼起来：向王朔同志学习已经成为我们时代刻不容缓的重要事件——按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报道方式——是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理应成为时代进步的风向标。

王朔同志，固然不是雷锋同志，他好钱好名，肯定也好女色——这点是根据他不坏的身体以及他写的小说搞的“有罪推定”——但王朔同志生得是时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向王朔同志

学习，不是哪位伟人的急切号召，而是当今主宰我们时代生活的英雄——媒体向我们发出的无可选择的命令。因为各种媒体貌似有竞争，但给民众的选择权、知情权依然是很少的，不只是政策上全国人民一致欢呼，就是那些市场化了的搞笑娱乐，连抽筋起哄的方式都是如出一辙。似乎大家喜欢从众，就懒得去培养民众的怀疑精神。

你看，王朔写了小说，不管小说写得如何的有才尽之感，媒体娱记的火眼金睛立马观察到问题的实质——娱记肯定说，你他妈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要说这真是伟大、正确、光荣的言论，娱记立马变成了心理学的私生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老虎也比活狗有余威。王朔往娱乐圈里扎，马上就有人出来说，某某是他女友，绯闻到处传，流言满天飞。王朔开始骂人了，娱记便比王朔更热情高涨，真是皇帝急太监更急，于是炒作满天飞，好让我们整版整版学习他的精神。关于他的骂有无依据，倒是次要的，因此当有个别娱记问他的批评有无依据，王朔倒也老实，说没读完，或者没有依据，这种勇敢正如他的新著"无知者无畏"。过两天还不奏效，便找幌子自我开骂，像江湖跑滩者一样自抽耳光，以便博得看客的回眸注目，还不奏效，便与媒体演双簧戏，说自己满身的食色之性，立刻拿掉，要去与和尚过招，还偷偷去观察，自己的煽情功夫，能否将隔壁的尼姑煽晕而得手。

王朔作为市场时代的媒体宠儿之一，他惯用的几招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概括专制领袖煽动信众的三

件法宝："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断言法，他说话的武断，俯拾即是，不必费心；传染法，最典型的说法是"煽晕一个算一个"、"哭死一个算一个"，文字尽得貌似幽默实则油滑的最高境界。他常常使用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种自损式重复法，他惯于从底限上玩他的花招，把自己先拿来垫底，就像杂技中的底座，他一抽底，便全盘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稀里哗啦。换言之，"我是流氓我怕谁"，拿流氓作为社会的底坐，那么这个社会的伪道德固然有轰然坍塌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最大的却是泼出脏水的同时，连婴儿也一同倒掉了。

在我们这伪道德盛行的国度，他的这种自损式重复法，既可以达到醒人耳目之效，也可以起着消解泛道德和伪道德的功能，其努力不应完全否定。但这样的毛病，就像国人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一样，总之，不善于有话好好说。这种耸人听闻的谈话或者写作方式，除了立异以鸣高以外，成为读者所热衷和接受的方式，这是深谙受众心理的王朔同志给出的妙招，他知道民众服哪包药，尽管他给的药可能有时免不了像胡万林开的硭硝。

如果说余秋雨还在扮演传统精英的话，那么王朔便走的是反传统精英的路子，更为讨巧；余秋雨的世故和煽情的民族主义情结很能讨得那些书没读通的"两脚书橱"的喝彩捧场，而王朔的扮酷，却可以获得造传统之反的小青年的青睐。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他们却尽得在商业社会进行自我炒作的奥妙，在利用主宰现代生活的传媒上，招数却是相同的，第一不得罪传媒，第二不

得罪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不得罪传媒，是因为传媒是现代商业和文化造神运动的策源地。与传媒过不去，就像专门跟金钱过不去一样可笑可怕，那是傻瓜都明白的道理。心想宁愿自绝于人民，也千万别自绝于传媒呀。巴不得直接跳将出来抒情：传媒啊，我的亲爹呀。至于说批评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余秋雨和王朔都没有什么激情，因为这一批评不管正确与否，都要丧失银两，这点算度和世故他们都是有的。他们宁愿批评那些不痛不痒的小人物或者日常琐事，即便批评著名人物，也是小骂大帮忙，王朔的骂大多如此。余秋雨和王朔自然不愿引火烧身或触雷遇礁。

像朱学勤、秦晖、徐友渔等学人那样用说理的方式，去批评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不仅不可能招致众多民众的围观和叫好，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而且会遭遇不按牌理出牌的强势群体的打压，金钱大哥就会离他们远远的，这是余秋雨和王朔断不认可的。古人是聪明的，先在《战国策》里就说过了“焦头烂额者”为上客，“曲突徙薪者”无人理睬的局面，两千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这方面，又何曾有丝毫改变呢？简言之，有些人，要么不说话，保持沉默，这样便于做一个奴才，而且特别幻想有一个包医百病的美好社会和完美政府；要么在多事之秋，说话不负责任，或者干脆起来做一暴民，幻想向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因为我们已经不习惯于、或者不能争取做一个现代公民，由此选择一个公正公平有效率的小政府。这就是造就余秋雨和王朔的土壤。余秋雨或许会说，我是到处造桥的，文化的四座桥——至于说是不是彩虹桥就另当别论了——不屑给你

们那些浅薄之徒脱光裤子，让你看我“文革”时的作为，那样的话我被人追捧的商业卖点往哪里找？王朔可能会说，丫的，你好歹毒，你把我往火海中推，你为什么不去呢？笑话，又风光又保命，你丫的还得向我学两招。

几年前，读陈村先生的《开导王朔》，至今认为仍是调侃王朔的妙文。我无力做到，只好给人说王朔赖以活着的土壤。据说他曾到美国找过感觉，好像并不妙，因为在美国人人都说得比他还大胆，反而大家都必须说得更理性，我相信他无法在那里脱颖而出，钻回我们这里的土壤才更适合他。没有谁有权剥夺王朔说话以及在哪里生活的权利，不管是一本正经或者是异举以鸣高，我们都得尊重。我想说的是，不能接受传媒的号召，因为民众的知情权极为有限，没有多少精神资源的选择余地，别把自己建立在枯萎的精神领地里所取得的武大郎式的胜利，看得太重要。

王朔是自嘲大师，在自嘲上余秋雨可能是王朔一个不及格的学生。但王朔这个老师招数太过怪异，也弄得许多人真的学习无方。一个好端端的老师给糟蹋了，实在可惜。朋友给我说了个故事，有人跳进粪坑里跳舞煽情，以求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当然有许多人鼓掌喝彩，这其中也有个别人士打了119或110报警，说有个人在粪坑里又跳又闹，又唱又笑，不像是神经有问题，你们赶快来救救他吧。消防队员和巡警都及时赶到，劝他赶快上来，他死活不肯上来，因为旁边围观鼓掌的人很多，鼓励他呆在粪坑里，说不定可闹个吉尼斯记录也未可知。警察说，围观者再鼓掌嘛，要是出了人命，

谁鼓掌，谁负责。听这故事时，我真的一点不觉得幽默，就像没有感觉就勃不起一样，责任在对方。

2000年3月21—22日于成都

唐诗江山里的五个提要

——《像唐诗一样生活》自序

一、朝代

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好比你做谁家的子女，由不得自己。等你知道是谁家的子女时，已经无法选择。因此选择你愿意生活的朝代，只是臆想的游戏。把戏虚妄，但也不乏臆想者。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喜欢生活在9世纪唐代的新疆北部，而写了《蒙元人侵前夜中国日常生活》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愿投生在900多年前的南宋临安城。汤因比的理由不明，不好妄揣；而谢和耐说他喜欢南宋临安日常生活的细节，看来他是把学问做到了热爱的程度，这也是西人，尤其是法国人的不少史学著作有趣好看的原因吧。

美国汉学家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是部专写唐代外来文明的书，指涉到不少稀奇古怪的动物、器皿、香料、药物、宝石、食物，包括各色外国人等，应有尽有。唐代的有容乃大，开放杂芜，各路人马杀向中土，纷集长安，或啸聚酩酊，或赏月细品，诗人们当然不会闲着。从李白的胡姬劝酒，到李贺想像奇特的琥珀，天下物事，山川河流，秦楼楚馆，怨妇征夫，宫禁重帏，迎来送往，春花秋月，家国之痛等，没有不可以拿来当作唐诗的材料。唐诗多彩妙曼的基础

由此而来。

漫长的中国，苦难无边，十几个朝代下来，我真还没挑中哪个朝代值得活。少数有趣的人物，掩覆不住大多数市井细民的苦痛，所以我还是寄望于将来吧。如果不得不选，那么唐朝还是个不坏的选择。因为在我看来，与其说唐朝是个好的朝代，还不如说它是个有点意思的朝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不幸国度，人民几千年来的铁幕生活，于精神之猛锐，生活之精致，固有绝大之伤。幸好上天不弃吾土吾民，在瓦砾石缝中，不独在心灵上有宋词的人心、元曲的安身，更有唐诗的长久慰藉，来帮我们寻得生趣，真算老天有眼。

二、人物

诵《诗经》，愿替胆小者猛翻女墙；看《庄子》，乐观庄惠濠梁之辩；读《史记》，独恨未能去汉武大势；习《古诗十九首》，始知无名者亦能创造不朽；能与陶潜赏菊小饮，有否猛志，无甚要紧；能踵武步随，听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真是福气；与金圣叹同点水浒，不亦快哉；和张岱湖心亭看雪，就是骎骎然披发如山，亦是幸福；给顾炎武当背包客，何惮于与卖主老仆一斗；向钱大昕请益，大乐事不过看与妻兄王鸣盛补罅。凡此种种，经典旧籍，先辈风流，良师益友，如沐春风，似聆謦欬。精髓得其一，若有神助，岂能得十数朝人物典籍齐聚一时，非幻化不能成此佳事。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明目张胆地省却了唐朝的人物，这是专为诗人们留下的雅座。诸多雅间里坐着的人物，是一份大家熟知的近乎累赘的漫长名单。大多数人将唐代诗歌分为初、盛、中、晚唐四个雅间，法学家吴经熊先生在《唐诗四季》一书里将其分为春、夏、秋、冬四章，给各位安排了包间，并没硬性规定坐在哪个位置。设若搞一个排名榜，恐怕诗人们要在阴间扭打起来。生时“旗亭壁画”之雅斗，到死后如板桥般厉鬼以击，次第上演，怎一个乱字了得？王无功之着唐诗先鞭，陈子昂的揭朽启新，杜甫的忧国忧民，李太白的斗酒疯玩，王摩诘的淡远无碍，孟浩然的仕进不遂，高、岑的豪壮超迈，王龙标之独发清幽，韦苏州之力宗王、孟，刘禹锡之吊古伤怀，韩愈以文拗诗，白居易为老妪能解，元稹千古悼妻，李贺锦囊“捉鬼”，小杜之搞活扬州，李义山之窈渺深谜，等等。一路下来，如行山阴道，目不暇接，真是卓绝风发。

默想一下，能与这些人物打堆同座，不管在哪个包间，都是荣幸。前述这些人的地位久已得到了确认。另外一帮人要么是大流派的小余绪，成为大流派的送葬者，要么是被“数字化”套在一起的——如“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等——二流诗人，要么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要么是消息于天壤间，被后人发掘的追认者。总之，这些人能够入坐雅间，是别有趣味的事，大大丰富了唐诗的路数。《像唐诗一样生活》给了一些不幸遭遗忘者以恰当的注意。

三、反读

正看，是我们常常采取的方式。这方式正确到无以复加，无可挑剔，但往往容易堕入别人走过的老路，不能自拔。我是个爱唱“反经”的人，喜看别人翻案，逆潮流而动，想从中看出各如其面的人之所以相通的暗道。诚然，你可说我是阴暗心理作祟，或许是猎艳尚奇的习性使然，我都欣然领受。但如此一来，中学语文课本，包括常规文学史里描绘的诗人，都得重新仔细思量一番。

熟读太白飘逸豪壮的诗句，再读“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个可爱世俗的李白向人民群众扑来。进而吟味“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和我隔壁遭上等亲戚白眼冷看的下岗老大爷，何其相似乃尔！我是个重常识的人，喜看人的立体，乐观人的丰富。看到了立体的太白，依旧热爱他的诗歌，更加深挚地体味他为何如此狂放不羁，悲愤行世。虽然他免不了把自己应对社会、治理国家的才能看得太高。但当社会太注重这种评价标准，而且往往只有这种评价标准时，你忍心只怨他们吗？

其实，早在李白之前几百年，《盐铁论》里有一段话，就已经告诫过做官的文人，足以成为后世文人之箴，可惜大家都装作没看见。“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传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其实在我看来，国家乃一家之私产，在糟糕的

制度下治得好才是怪事。像陶渊明、郑板桥一样挂冠而去，并非全是意气用事。

《像唐诗一样生活》便充满着观察李白一样的解读思路。“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均是些道德上有瑕疵的人，这可让读者体味他们诗歌中不少欲言又止的微妙之处。大家都知道杜甫“穷年忧黎元”，我反而最爱看他的“应须美酒送生涯”；不少人知晓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等日常生活的诗章，解读起来真是别有风致。贫穷多难而爱心不泯的父亲，更让我们喜爱到无以复加。孟浩然写田园诗，偏偏我们可以看到他求官之心的猛烈。王维的淡远，有大官的生活背景做衬里，否则诗风难免不变。元稹、白居易以反映现实生活著称，我们偏偏注意到元稹千古悼妻之作，尽管频传他风流成性，看来风流成性和对妻子的挚爱在元稹身上并没有导致二元对立。白居易和元稹一样，官当得不小，风流遍地，却喜欢写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外一些倒霉的诗人则喜写上层人士锦绣奢华的生活，这样的错位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少见。

四、放胆

写诗作文，并不只是没有代价的风雅好玩之事，把脑袋写掉了的并非绝无仅有。而脑袋绝非南瓜，更非韭菜，越割长得越快。中国历来放胆作文写诗的极少，不计后果的写作成为心追慕影的假设

目标。稍有反骨的人如李贽，便死得难看。打破了表面温情、骨子里残酷的秩序，对强权者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秩序的制定者和拥有者岂肯善罢甘休？秩序是强者的博弈，弱者的遵守。诗歌的秩序，也不例外。

唐朝夺得天下，但天下并非刀劈斧削般与隋朝断了干系。因为不少事可谓藕断丝连，譬如文脉就有不可避免的承袭，诗歌自是未能例外。不过，一旦新朝百事稳定，武功削平了天下异己，文治自要使海内晏然，显示一股别样的朝气。稍作比附，王绩、初唐四杰、陈子昂便可被认作是唐诗江山的勋臣。诗歌的内容，谁都知道很重要，但累百上千的历代诗话之评骘，多是从文章学乃至八股时文的起承转合上着眼。从常规上看，内容或没有讨论之必要，要么状写七情六欲、感时伤世，所有习文做诗者都心知肚明；要么是不可讨论，社会之不公，统治者之黑心，闭嘴是惟一的选择。探讨诗歌形式便成为探讨诗歌包括内容的替代品。韵律、平仄等形式于唐代发端，诗人们玩得风车斗转，英气勃郁。而后世的诗人们却把形式拿来自铸牢笼，搞成一个逼仄湫隘的诗歌监狱。

律诗、绝句都是唐代对中国文学的卓越贡献，前者如杜甫、后者如王昌龄，都可谓秀绝峰端。乐府在唐代有了不起的翻新如李太白，他的杰出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了不起的发展如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素为史家吟者所重。这些人在内容的抒发上未必能率性而为，一吐为快，大抵身上的紧箍咒太多之故。不过，他们在形式上却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不像后世那些苦吟

者乐于自骗。李太白的“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因为“一为”与“万里”词性之不工对，而被宋人视为犯了“偏枯”之病；白居易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王维的“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都被认作是上下句意思重叠，而得有“合掌”之疵。这些都是把技巧当作写诗之牢房的典型例子。难怪宋人及后代写诗者，越来越做不来好诗，根由在于戴起脚镣跳舞都不过瘾，还得枷上手铐，才全身通泰舒服。对技巧崇奉到嗜痂成癖的程度，或许是古诗越来越不济的原由之一吧。没有鲜活的个性，不羁的创造，要想有卓越之文艺，好比找自宫的太监谈床第之欢，这样拿人取乐，也忒损了点吧。

五、选择

胡适先生常把明朝哲学家吕坤的一句话当做他写文章、做学问的原始动力：“为民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因此他不惜用后半生的闲余精力来考证《水经注》，为乡先贤戴震辩诬。辩诬固是人之美德，然启埋没者于尘湮土覆之下，搜不得意者于孤魂野鬼之间，向常人目光不易抵达处，施以青睐，自有赏格，何尝不是人间一大快事？我对用一首诗来征服历代读者的人，固有不少关注，然我更关注的是实有好诗，而相对较被忽略者。如戴叔伦、张祜、王驾诸人。

我曾在一篇长文《选本的沧桑》中梳理过所谓自孔子“选”诗

而删以来，选家与选本之微妙关系。此处囿于篇幅，只举一端，以使略知大概。譬如选此即非彼，选“阶级”而弃“人性”——名家如钱钟书先生之《宋诗选注》就囿于彼时的择诗标准，注释博洽而选诗并不漂亮——系名捧实杀之惯技。不才研究20世纪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有年，深感1949年后各级语文课本，是此等惯技之集大成者。使学生知白居易有《长恨歌》、《琵琶行》而未知有《答刘十九》，知杜甫有“三吏”、“三别”而不知有《月夜》。仿佛他们天天“人民”而不近人情，成天心忧天下而断无人生趣味，可爱之处尽失。知苦难生活而不知有人生趣味，其心也冷，其志也卑，其量也褊，其趣也无，其情也枯，其生也苦。如斯而学者，心生痛恨而未知悲悯，常怀敌意而少仁爱之心，多非难而不审宽容，知挫中激勇而不知缓中求晋，多暴戾之气少放达胸襟。纵观当今习文断句者，如斯毛病蜂聚，多如过江之鲫。选家之责，教育之过，岂能逃脱？要言之，意识形态、识见眼光、诗路流派均是选家障碍，是为选而不存。况乎不选之遗珠，沉渊暗蔽者多矣。

不管“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在新文化的大纛下，多么响遏行云，但选家却代不乏人。唐诗选家就更是寻常体裁选本的数倍之多，学者孙琴安曾撰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自唐人孙季良之《正声集》始，止于清末。而民国、1949年以后的大陆及港台选本，则附录于后，其概数几逼一千大关。选而成学，非謭陋如我所能实践。《像唐诗一样生活》只不过是一位偏见者的读本，一个稍有趣味之人撰写的小册子，不敢混迹选家之林而自矜。这是我

要开诚以周知诸位的。

《像唐诗一样生活》篇幅虽短，然写作断续在两年之间。码字已久，文不成器，陋习多有，诸如无感而不发。故尔稽延了交稿之期，在此要向期望速成的友人告罪。少时家贫，无以沾孙洙之溉，得家慈口授浅白唐诗数首，不明其意，但觉悦耳，上口好记。识文断字后，诵读唐诗数百首而不疲，成瘾至今。爱赏之余，每半月课小女唐诗一首。内人及小女绘该诗山川人物，风景历历。复参照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朝部分，于画幅之一角辅以地图，感性与理智俱有，艺术与科学同在，快何如哉！或许他日可有一本好玩之《绘图课女唐诗》出笼，亦未可知。

《像唐诗一样生活》中所选评者，多能背诵，端赖家慈教诲启悟之力。今家慈仙游上界，瞬忽半载。风木之悲，曷胜哀痛。谨以此菲薄小书，拜献于吾母在天之灵，愿她看到幼子不成器的努力和些微的进步而高兴。

2004年10月21—25日凌晨2点于成都

20世纪卓越的美国头脑：以《李普曼传》为中心

这是一个与20世纪的美国紧密相连到骨髓的知识分子，他一生刻录着美国所经历的诸多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迫害、60年反越战等——许多大事因他参与而得以完美解决，或者遭遇顽强的阻击——成为一名通过独立言论干预社会、影响政府、造福民众、成就自我的经典范例，以至于他的传记作者、同样优秀的政治评论家斯蒂尔将其所写的关于他的传记，直接命名为《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于此可见李普曼对20世纪美国非比寻常的特殊影响力。

一

西谚有云：要看一个人，先看他有什么样的朋友。中国学人注重导师传承、友朋往还、学侣辩难，所以明史研究专家谢国桢先生在研究大学者顾炎武时，别开生面地写了一本《顾宁人学谱》，其纲目如次：传略、学术述要、著述考、学侣考。在"学侣考"一节中，谢国桢开篇辟首便说："交游之广，无过宁人，故宁人之学，虽功力至

厚，然取于人者亦独多。宁人一生，奔走道路，来往大江南北，所更非一，故所交之友，亦非局于一地之人。”（商务印书馆1935年2月第二版）事实上，李普曼与顾宁人虽然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制度及文化背景下，且研习方向大有不同，但交游之广都是相当惊人的。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无数友，于一个人的成长及问学至为重要。

出生在富裕犹太家庭的李普曼，哈佛大学的受教背景，加以天资聪慧，故尔很早就脱颖而出。在哈佛问学时，他的同学与辩手有为了革命而客死苏联的著名左派记者约翰·里德（其成名作为《震撼世界的十天》），与后来开现代诗风气之先的诗歌大师T.S.艾略特系同门师兄弟，受教于著名美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知遇于著名哲学家亨利·詹姆斯，而彼时哈佛大学的校长则是推动美国大学读名著运动的著名教育家埃利奥特，好学的李普曼从韦尔斯、萧伯纳到尼采、叔本华，跨越多门学科，无所不窥，其阅读的宽泛和速度是惊人的。

仔细剖析李普曼所写社论及政论的思想渊源，其来源有二。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詹姆斯所倡导的人们今天必须“靠其所能获得的真理而生活，而又必须准备在明天称这个真理是谬误”，是李普曼一生都勤加实践的，其比经学大师廖平的一生凡六变还要灵活，但绝非丧失自己的独立判断和中心立场。詹姆斯推崇的怀疑主义是李普曼宗奉的哲学原则，实验、多元和行动，则近乎他的立世指南。而詹姆斯提出的社会虽不完美，但可以改得更好的向善论，以

及要勇于决断的实践论，从李普曼在几十年的社论及政论中所贯穿的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倾向，勇于对事件作前瞻性和结论性的判断，均不难清晰地看出来。不特如此，李普曼一生写作活动达60多年，其间有《先驱论坛报》，尤其是在《新闻周刊》所写的长达36年的《今日与明日》专栏——这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史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都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詹姆斯在青年时对他的教导：那就是一个作家每日至少要写一千字的东西，不管他是否愿意，甚至不管他有无东西可写（罗纳德·斯蒂尔著《李普曼传》P34，新华出版社1982年7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这也是李普曼在父教阙如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类似父亲一样的、影响深远的立自处世和心灵培育的双重指导，让他受用了一生。

李普曼思想的另一源头，来自于“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宗教，而不是把宗教作为道德指南的”自由思想家、美学家桑塔亚纳，桑塔亚纳严谨缜密的行事方式、敏锐练达的批判态度、傲岸不同流俗的见解及做人方式，都使李普曼在精神上紧追他的步伐。有趣的是，李普曼承袭二位导师的精神滋养，而二位导师之间则常常互相攻讦，极像中国古老的恶俗：文人相轻。但这并不妨碍李普曼从精神上各自得到他们的好处与营养，他似乎在他们的斗争之间如鱼得水，置身事外。但他们二者对李普曼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半斤八两、铢两悉称。与詹姆斯的赞颂直觉、反对教条和唯智论相比，桑塔亚纳超然物外的态度，以及相信“理智的功能是驾驭经验”的说法，并且由此延伸出来的过分的民主可能是大众的暴政的观点——

“这是所有统治中最残酷、最反进步的统治”——对李普曼一生的新闻及政论写作有着惊人的影响。对此，李普曼直白地说：“我所知的最伟大的人物中，我最热爱詹姆斯。但我越发感到，桑塔亚纳是我无法摆脱的。”(P40)只要我们对李普曼的行事态度及作文风格稍有了解，就不难解释青年李普曼的偏爱中，也暗藏着他一以贯之的老派作风：冷静客观、中正平稳。

但是且慢，任何一条大河都有一些杀偏锋的细小支流，不遵守固有的河道行走，却最终影响主要河流的流向。李普曼两位强大的精神教父，也没能管住他的精神稍微叛逆他们那种书斋和学院化的教养，转而向有改良主义实际行动的费边主义投怀送抱。工业革命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财富的聚集比此前所有世纪的总和还多，而财富的流向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使得社会的贫富悬殊进入空前的紧张状态，即便是在人类第一次互相残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前，人类浅薄的欢乐中，以及科学无所不能的假相下，也有些对社会的阴暗面空前敏锐的人忧心忡忡。且不说早有马克思空前尖锐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对现实贫富深渊的激烈反弹，即便后起之主张渐进改良的费边主义，也对社会正义有着高于自由、民主的强烈取向，这是20世纪初期至二战结束时，大批英法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有浓厚左倾的深刻根源。法国的左倾传统更为古老，他们的知识阶层向左转的步伐和庞大人数深得时代风气之先，以至其它诸国远难望其项背。阿拉贡、艾吕雅、巴比塞、罗曼·罗兰、纪德诸人对革命不分就里的同情，以及对社会公正的乌托邦幻想，使

得他们把这一不可能的理想寄托于惯唱高调的新起之铁幕国家，纷纷向大清洗之风盛行的苏联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社会不公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指南。纪德和罗曼·罗兰都要求身后才能发表他们关于苏联的观感和评判，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丑恶现实与自己热情理想所出现的反差，超过了他们智力的承受能力，更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的勃兴背道而驰，内心或许有某种意义上的羞愤难当。对一个相信自己的智力胜过相信金钱、权力的真正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比侮辱优雅的智力更大的伤害呢？

当然，也许知识分子有时亦有自己的智障，早在一贯浪漫的法国知识分子向左转之前，呆板的英国中就有知识分子前去赞美早期混乱而贫困的苏联了，这就是费边社成员、李普曼早期的阅读对象、著名作家G.H.韦尔斯，他卓越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我们耳熟能详，皇皇巨著《世界史纲》在民国就由中国的一流学者、作家吴文藻、谢冰心、梁思成等翻译出版，相反我们倒对他有本小册子《俄罗斯之秘》知之甚少，那里面记录着他两次对苏联的观察，尽管他毕竟来自有深厚怀疑论传统的英国，但仍然被自己的特殊身份——被官方邀请去的客人——所带来的对铁幕国家观察的天然蔽障，缺乏应有的警惕，在彼时，很多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被一种一探究竟的豪气所驱使，加以好下判断的天然特性，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唱对台戏所带来的成就感，故而对与民主社会大相径庭的铁幕国家轻率赞美，不乏异举以鸣高的心理特性。作为同班同学，《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里德与李普曼在新闻价值观念上越

走越远，其深层的观念殆源于此。

学者王国维翻译尼采时曾说，“凡文字中，余最爱以血书者。”用此来衡量，可以说李普曼基本上一生都没写过这样的文字。富裕的犹太家庭生活背景，令人歆羡的受教环境，使得李普曼与热血的底层有着一层天然的隔膜。即便在追逐费边主义、参加“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早年岁月，目睹一些下层生活的穷困，也写过“年轻时就‘正统’的人，有一辈子都会处在中年人状态的危险”(P47)，但与费边主义决裂的沃拉斯来哈佛讲学，使李普曼彻底终止了他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一星美好期望。因为沃拉斯来哈佛所讲的政治学，批评的正是政治学中不考虑人性，而宁可去审核数字的古老传统，这正切中了专制传统中，管理上盲目地对造假数字的崇拜，而这些在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有泛滥之趋势。所以青年李普曼在跟着当时以揭露黑暗著称的记者斯蒂芬斯混了一段时间后，就结束了一丝有可能朝向“愤青”的努力。因为在他看来，黑暗揭发者虽然对现实批评力度是够的，但解决问题却是肤浅的。更主要的是，他越接触民众，他越觉得民众就像后来的法国学者勒庞所写的社会学名著一样：乌合之众。这种论点肯定会激怒高唱民众为先（实则借民众以掩自己巧取豪夺之实）的政党（尤其是一党独裁），遭受来自民粹主义者声嘶力竭的讨伐，但李普曼不为所动。与其说是他秉性使然，不如说是桑塔亚纳有关“大众的暴政”的教导，加之对所谓民意的警惕，使得他对煽惑性言辞和说教，尤其是对某种主义有天然的审视态度。

自然，与斯蒂芬斯共事的新闻学习过程并非一无所获。斯蒂芬斯认为，一切言论必须基于事实，在动笔之前要成竹在胸，坚持写文章要清晰明了，开门见山。这一切都成了李普曼新闻评论文风的核心部分。更为要紧的是，像斯蒂芬斯这种接触社会黑暗的记者，天然地怀疑人性善以及社会制度的完美，这教会了李普曼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妨说，这一点比形成某种惹人注目的文风更为重要。事实上，李普曼在新闻评论的怀疑主义道路上是干得不错的，他的修养和才华早已没有问题，而他的性格更是命中注定适合干时政（新闻）评论一行："他总是置身于边缘，随时准备抽身引退。别人为之奋斗献身，他却在一旁观察分析。"（P91）

二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断言：报纸诞生于中国，产生于上古不可记忆之时代。好，这样的论断，无不让饱受歧视之苦的民族主义者如在汪洋大海上找到了救命稻草，在黑暗深处突遇一星灯火，简直使人欢忭若狂。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无不以此作为自己前往古代探寻新闻的动力，以此论证中国除了所谓的四大发明外，还有众多令世界称奇的辉煌，报纸诞生于中国就是又一例证。我同意我们的祖先真是伟大，但是不可能什么都伟大到第一，这应该是个基本常识。我的基本判断是，无论是唐代的进院奏状，还是宋明的邸报，都与现代意义上报纸的功能相去甚远，这一点连许多研究新闻

史的人都并不讳言。譬如邸报就相当于官方传达的文件，而且在传达过程中，因级别及个人喜爱而使消息越来越少，而现代西方的报纸是以商业为中心而诞生的，以更多的人获知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为目的。而要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必须建立在对商业欲望的增长、更为开明的社会制度之上方能获得，因为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是：信息是民主之源。

自从马礼逊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中文报纸诞生了。到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政《万国公报》时，他一个著名的革新便是，每日亲自撰写时政评论，条陈新政，鼓吹中国学习西方，实行新法，后结集为《时事新论》，使《万国公报》销量大增，李提摩太本人亦声誉日隆。这说明现代意义的报纸很早就有时政评论，以影响自己的读者群，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待事物，观察得更为久远和深邃。李普曼的不凡之处，在于把西方报纸重视时政评论这一传统，发挥到空前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举凡世界格局、国家大事、总统竞选、经济振兴，诸多事情，无不成为其笔下关注之对象。李普曼在给为他带来声誉的《新共和》杂志写稿伊始，就已经出版了《政治秩序论》一书，是书虽然并无振聋发聩之处，但它呼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扩大联邦政府，调整垄断企业以符合公众利益的基本观点，可以说贯穿他诸多时政评论的字里行间，这与他内心坚守的一定意义上的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观念相得益彰，从而奠定了他时政评论的深邃说理、尊重事实而又独立思考的一贯基调。

《新共和》时期的李普曼正在发育，虽有《政治秩序论》一书起航，再有《放任与驾驭》加码，后者更是一本从赞美经验、鼓吹直观、贬低理智的藩篱里脱身出来，向社会和当政者贡献一幅科学管理和合理组织的蓝图的书。但他早年的激进态度还存在于他的字里行间，远没达到他后来说自己写时政评论时所形容的惊人平静和理智观察："即使我写街上发生的一起火灾，我也要像写诗那样精雕细琢。"（P66）空前未有的人类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催生了李普曼，使其从战局变化中成熟起来。虽然他在早期的社论中与当时的美国政府主张中立、不插手交战双方事务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他同情以英国为中心的协约国的态度从一开始就空前明朗。正是因为李普曼超前的利害审度，使得《新共和》在英国的发行量节节攀升，他本人的声誉鹊起，由此开创了作者和报纸越来越好的双赢局面。李普曼的独立判断远不止此，还源于他务实的根基里有着深厚的洞察力。譬如他由1915年5月7日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被德国潜艇击沉，1100多人丧生，其中有128人是美国人这一事实，得出美国只有两种道路可走，要么与英国合作，要么像英国一样建立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因为中立不能使美国人民免于被炸，这说明美国海军力量弱小的尴尬现实。

有的读者或许会问，他无非把国家利益看得很重要嘛（这自然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每个人的族属问题最终要以地理的国家来解决其定居、聚集和繁衍），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的逻辑

推论是这样的，李普曼当然不会唱高论，说全世界人民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们要去解放那些全人类三分之二以上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但是自已的同胞有128人被炸（当然非同胞之死也令人同情，但不足以支撑他美国何以不能中立的立论），这足够让民选政府难堪，让选民震惊而愤怒，李普曼只不过是选民中手握言论之权，而又深具理性分析和透辟观察，并形诸纸笔的少数几人而已。所以李普曼为《新共和》起草的社论中虽然明确地表示厌恶战争，但他坚定地说美国不能无限期地观战，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代价的，只是要以较少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收益而已。这种观点在他二次世界大战中批评绥靖政策时也显得特别突出，他的时政评论灵活多变，善于在复杂多变的利益格局中梳理出一条擒贼先擒王的利益主线出来，以便使政府和社会节约运营成本，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以赢取个人和社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的最大收益。战争固应作如是观，即便是和平年代，如1929至1933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罗斯福主持新政后，李普曼一贯的威权思想（他从来不相信乌合之众能处理好事务，其实这是符合宪政必须要用民主的代议制，即由这方面有专长的人因我的授权来代表我的利益，使我的权利受到保护，以及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急于使个人获益、国家振兴的目的，他主张政府的极力介入，这与他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念一脉相承。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柄双刃剑，在非常时期或许能快速扭转颓势，但它的一个不可不防的潜在

弊端是，政府天然的扩张性，对个人领域的侵蚀，甚至对社会公正的伤害，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罗斯福的经济干预政策，最终使罗斯福政府走到欲干涉独立的高等法院的地步，这让李普曼大为恼怒，痛加反省，转而批评他曾经拥戴的罗斯福政府。

李普曼就是这样，一方面不依傍任何团体和组织，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另一方面，他有着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缺点，即对权力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欲望。这不是说他想当官，而是说在他看来，民选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受到像这样专业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以便为个人谋取更多的福祉。可以这样大胆地说，李普曼是20世纪少有的与政治家过从甚密、能影响和左右事态发展的时政（新闻）评论家，即便是像他的后继者赖斯顿这样操持《纽约时报》评论大柄的人，也远未达到他所应得的辉煌。这固然与李普曼所处的时代传媒竞争远不如今天这般激烈、信息获取远没有今日这般多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名播寰宇的李普曼有着常人少有的超前眼光，如他对戴高乐领导能力的判断，堪称经典范例，这在美国对法国的外交政策诸多失衡的情况下，起着不可估量的弥补作用。李普曼一生的成功，才华过人、敏锐干练自不必说，不可缺少的一点就是，他见各国政要如同赴一个不太正规的party一般容易，以至于他在笔记本上留下：见过某国首相，“不过尔尔”的轻蔑之辞。但是林登·约翰逊固执己见地坚持不从越战泥潭中撤军，为了讨好李普曼而欺骗他，使晚年的李普曼得出一个新闻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常识，即便你跟大人物亲密无间，你也最好要保持距离。一来便于你冷静观

察，二来不受到情感对理智的伤害。但要做到这点也是困难的，因为大人物一般是信息之源，是观察事件的焦点，与其有亲密的私谊，可保证对信息源的某种垄断和抢先发表，这对传媒经营至关重要，对任何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都有着极大的诱惑。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处就是容易丧失新闻的客观公正。李普曼的不凡之处在于，一生与诸多政要过从甚密，固然在某些新闻事件的评论处理上火候并不得当，但大体保持了一个新闻人的独立思考，对诸多大事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见。

三

现在我们看一看要完成李普曼这样的时政（新闻）评论和专栏写作的盛业，除了个人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外，究竟还需要什么？我们要过多久才能诞生自己的李普曼，来帮我们在公共传媒上来公正而客观地观察生活、判断事件走向、权衡得失利弊，以减少我们因知识的缺陷和专业准备的不足而带来的判断失误，于己于国减少所带来的损失。

如果我们在古代曾经有新闻的话，那么我们的新闻史是先天畸形的，无论进院奏状还是官方邸报，都只能算是文件传达和政治附庸而已。且不说那上面没有客观事实的陈述和多元意见的表达，更无论什么论敌辩难、异议者条陈自己的看法，就连今日之花边新闻、娱乐八卦、鸡毛蒜皮都没有。换言之，邸报只是官员阶层的游

戏，不存在上情下达，反之亦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信息互动和阅读的涟漪效果。由是观之，中国的新闻传递，先天是政治的附庸，没有真正独立过，也没有报人独立办报一说。

新闻学者秦志希、汪露在论及20世纪中美两大新闻人梁启超和李普曼时，已颇有洞见地指出他们二位之间的差别，所附靠的文化背景和新闻理念。择要说来，梁李二位分别有如下的不同：一为殉道者，一为观察者；一为颠覆，一为调控；一为实用理性，一为实用主义（《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的新闻传播观》，见“传媒观察”网络版）。梁氏全身投入，职业政治家而兼新闻人，把新闻当成开愚启智、鼓吹革命的工具，使新闻与政治成为不可割裂的双胞胎，而李普曼则是冷静地观察，平实地叙述，深入地解剖，把情感隐藏在文字的背后，有积极投入更有超然的精神。复次，梁氏既把新闻当作革命的工具，变法的喉舌，冲破封建藩篱的助推器，自然会注重新闻的政治及思想而非事实。而李普曼作为三权分立的美国民主社会的“第四种权力”的参与者，实施着自己作为新闻人的监督，以及在社会分工的情形下，某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只是社会之微调和修正，而非鼓吹革命、荡及社会的助推器。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时，李普曼在社论中相对激烈的言辞，也只是实际评述和利益衡度而已。最后梁氏将新闻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必然在追求其实用性的同时，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对客观陈述诸方面不甚重视，使得一方面欲开启民智，另一方面事实之歪曲，必然又带来另一层意义上的愚民效果。注重新闻鼓动所带来的

庸俗的实用主义，全然不顾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新闻本身的伤害。而李普曼的实用主义新闻观充分吸取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效用原理，以及黑暗新闻揭露者、他的同事斯蒂芬斯的新闻理念，尽量做到事实陈述及其产生的结果的均衡匹配。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作为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代表，梁启超和李普曼的新闻观念的差别，就像一个乞丐和一个已经吃惯大鱼大肉的人之间的差别，前者囫囵吞枣，但求其饱，而作为下站求生之接力；后者则食不厌精，精益求精，讲究营养和调配，尽量使其成为美好生活的一个注释。单是李普曼在越战中后期鲜明的反越战态度，就充分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新闻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不为情感所羁绊的襟怀，为了不伤害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尊重事实本身，他不惜与此前关系甚密的总统约翰逊交恶，对越战大加批评，但绝非泛泛的道德谴责。因为李普曼在他第一本书《政治秩序论》中早就说过："任何道德的判断都不能确定生活的价值，任何伦理理论都不能宣告内在的善良。"(P34)他受美国著名海军上将马汉地缘政治论的影响，以及大国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观念的影响，明确地提出，越南绝非美国的利益之所在，那种想到处充当扑灭共产主义的消防员的想法，是可笑而且不切实际的。与其说坚持"冷战"(此词由李普曼发明而流行全世界)的思维，不如实际地看到，大国之间的合作，比联合国之类的组织更为有效。我们可以说他坦白得近乎赤裸，但我们不能不明确地说，他所说的都是事实，至于作为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则是另题。

中国要想产生真正的李普曼，遥哉远矣。

四

犹太人这样一个标志和事实，我感到是李普曼一生的痛。这种痛，我在看完《李普曼传》后强烈而悲凉。李普曼所生活的世纪，是犹太人多灾多难的世纪。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李普曼竟然保持令人难堪甚至是令人耻辱的沉默，这对20世纪一个伟大的新闻人和卓越的专栏作家，对世界事务有如此深刻洞见的人来说，真是令我惊讶莫名。

按理讲，李普曼生在富裕的犹太家庭，已属第二代移民，内在的身份区别和角色敏感应稍有减弱才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亚赛·伯林（他与李普曼见过一面），在谈到自由的两种观念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族属问题，这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不免有些内在的紧张，因为族属问题涉及到近代以来最为敏感棘手的国家民族问题。伯林一方面帮助以色列复国，但他又不是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当国家成立，希望他能进入利益阶层时，他婉拒了，因为这会使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发生内在的紧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把自己自由主义信念以及民族国家问题，处理得如此好的学者，在20世纪可谓寥若晨星。而大多数犹太人，如同许多少数民族裔一样，也与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一样，要么太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而排他，要么自甘消泯自己的特性而成为主流社会的参与者，站稳

脚跟，甚至风光无限，成为公众新宠，使大家忘记自己族属上的过去。我觉得李普曼就是这样的人，当美国一些上流社会的排犹俱乐部终于接纳自己时，他的才华及学养包括固有矜持，都不会使他喜形于色，但一种被主流社会接纳后的内在欣悦，一种无上的归属感，使他乐此不疲。这说明李普曼由于主流社会接纳所得到的归属感压倒了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族属感，使得自己放弃了为同族人辩诬和伸张正义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李普曼唯一让人不能接受的巨大缺失。李普曼之所以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沉默无言，除了如上分析外，还有一个价值取向的歧路，即他作为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正义的忽略，因为他忌讳对社会正义的过分强调，会导致平均主义，由此诞生极权乌托邦，这是与李普曼的哲学理念和价值取向相悖的。

诚然，我承认李普曼是美国20世纪卓越的头脑，但他面对自己的民族所发生的灾难时，却沉默不语，这实在无法让我释怀，真可以使人抚膺痛哭。虽然他有沉默的权利，但是，当数百万同胞的生命遭受死亡的厄运时，难道自己的权利，以及作为上流社会参与者对自己族属的故意遗忘，就真的显得那么重要吗？这与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弗斯案件中所表现的“我控诉”，相去何啻霄壤！

2003年9—10月于成都

他是一粒金刚钻，从川东酉阳的深山里蹦跳起来，又被过境的龙卷风旋转成一只陀螺。要钻透的不是瓷器，而是中国。转速高，指向稳。吱吱响，冒火花。我正好在现场，被他惊呆了，低声叫喊："快来看啊，金刚陀螺钻！"

——流沙河（作家、诗人）

恣意，却不谵妄，因了博雅的底子；
尖锐，甚而激烈，却有现实的靶子。

——阿来（作家）

冉云飞的故乡酉阳有二酉洞，据传曾藏有幸免于秦火的典籍。生在曾有史上最早民间图书馆的偏僻山乡，也许是得山水之助，冉云飞的气质是草莽气、游侠气和书卷气的混合。冉云飞这些年的激扬文字，亦是理性、激情和愤怒糅在一起，锋芒直指大大小小的焚书者。

——十年砍柴（网友）





定价：21.00元